

黨的政策選集

中央黨校教務處編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印

黨的政略總綱

（一九三七年五月）

目 录

一、共產黨在抗戰中的政略總綱（一九三七年五月）

二、毛澤東同志在蘇聯熱河表大會上的政略報告及結論（一九三七年五月）

三、五月三日至七日中央黨校會議（一九三七年五月）

四、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洛川會議）（一九三七年八月）

五、上海東渡失陷以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與任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六、毛澤東同志在蘇聯熱河表大會上的政略報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七、毛澤東同志在六中全會結論之一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八、陝甘寧邊區黨綱（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黨校中央局會議）

九、中共中央政治綱領（一九三七年五月）

十、抗戰建國的政略（一九三七年五月）

十一、抗戰建國的政略（一九三七年五月）

十二、抗戰建國的政略（一九三七年五月）

十三、抗戰建國的政略（一九三七年五月）

十四、抗戰建國的政略（一九三七年五月）

中央政治局關於發展生產運動意見及實行六政實施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

(七四)

中央關於統戰政策與土地政策的決定(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

局通過)

(七九)

關於發展生產運動意見及實行六政實施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

(八九)

論合作社(毛澤東同志)(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在延安高幹會上的講話)

(一〇一)

組織起來(毛澤東同志)(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在招待區干部會上的講話)

(一〇五)

勞動英雄會上的講話

(一〇五)

兩三件向抗戰後方建國山存(毛澤東同志)(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在勞動

(一一一)

英雄模範工作者女會上的講話

(一一一)

肅清立三路線的遺毒(關門主義與階級路線)(劉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

(一二二)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同志)(論新階段之一部)

(一二二)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一三四)

中國共產黨黨章(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六大大會通過)

(一三五)

關於統一戰線政策的決定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一九四二年

(一七〇)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

(一七〇)

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一八〇）
一九四五年的任務（毛澤東同志，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在邊區參議會上的演說（一八六）

已有單行本的

-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同志，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
-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同志，一九三六年秋，第一、二、三章）
-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同志，一九三八年五月）
- 論持久戰（毛澤東同志，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
- 譚政同志在西北局高幹會上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一九四四年四月）
- 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毛澤東同志，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

「共產黨人」發刊詞

毛澤東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中央很早就計劃出版一個黨內的刊物，現在算是實現了。爲了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刊物是必要的。在當前的時機中，這種必要性更加明顯。當前時機中的特點：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日益發展着；又一方面，是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太黨。而黨的任務是動員羣衆克服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並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而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出乎意料的損失。在這種時機，這樣一個黨內刊物的出版，實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這個黨內刊物定名為「共產黨人」，它的任務是什麼呢？它將寫些什麼東西呢？它刊別的黨報有些什麼不同呢？

它的任務就是：幫助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我們現在也正在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觀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創作之中。爲了這件事，不是一般黨報所能勝任的，必須有專門的黨報，這就是共產黨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說來，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全國性的黨，也已經是一個羣衆性的黨，而且就其領導骨幹說來，就其黨員的某些成分說來，就其總路線說來，就其革命工作說來，也已經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黨。

那末，還有什麼新的任務呢？現在提出新的任務的理據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們現在有大批的新黨員，很多的新組織，對於它們，還不能說是廣大羣衆性的，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還不是布爾塞維克化的。同時，對於老党员、老組織，也發生了提高水平的問題，發生了在思想、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鞏固與進一步布爾塞維克化的問題。黨所處的環境，黨所負的任務，現在和過去內戰時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環境是複雜得多，現在的任務是艱巨得多了。

現在是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期，我們同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線；現在是抗日戰爭的時期，我們黨的武裝在前線上配合友軍同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現在是我們黨發展成爲全國黨的時期，已經不是從前的樣子了。如果把這些情況聯繫起來看，就懂得我們提出

「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有兩條綫寬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一個光榮而又嚴重的任務了。

我們現在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樣進行呢？我們現在一定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麼辦才能達到目的呢？解決這個問題，是同我們黨的歷史，是同我們黨的十八年鬥爭史，不能分離的。

我們黨的歷史，從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個時候起，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黨經歷了許多偉大的鬥爭。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在這些偉大鬥爭中，鍛鍊了自己。它們經歷過偉大的革命勝利，也經歷過嚴厲的革命失敗。經歷過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又經歷過這種統一戰綫遭受分裂，並同資產階級及其同盟者進行嚴重的武裝鬥爭。最近三年，則又處於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時期。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道路，是在這種同中國資產階級的複雜關聯中走過的。這是一個歷史的特點，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過程中的特點，而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再則，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佔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革命的動力基本的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等等這樣許多的東西；而且規定了：中國

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我們黨十八年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斯大林同志說過：「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說得非常之對的；這一特點，這一半殖民地中國的特點，也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沒有的或不相同的。這樣：（一）以資產階級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二）革命形式主要的是武裝鬥爭，就成了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兩個基本特點。這裏我們沒有把黨同農民階級與黨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關係作為基本特點，這是因為：第一，這種關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原則上都是一樣的；第二，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鬥爭，實際上即是農民戰爭，黨同農民戰爭的密切關係即是黨同農民的關係。

由於這兩個基本特點，恰是由於這些基本特點，使我們黨的建設過程，我們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處在特殊的情況中。它的失敗與勝利，它的發展與前進，它的縮小與擴大，它的發展與鞏固，都不能不聯系於黨同資產階級的關係與黨同武裝鬥爭的關係。當我們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處理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或被迫着分裂統一戰線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錯誤的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就會退進一步。同樣，當我們黨正確的處理革命武裝鬥爭問題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錯誤的處理這個問題時，那末，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也就會退進一步。

十八年來中國的建設過程，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是這樣同我的政治路線高橋聯系着。這是黨高橋對於俄國戰線問題、武裝鬥爭問題之正確處理或不正確處理高橋聯系着。這一論斷是很明顯的。它已經被十八年黨的歷史所說明了。倒轉來說，黨愈益趨於布爾塞維克化，黨就愈能、黨就愈能愈益正確的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愈益正確的處理關於統一戰線問題與武裝鬥爭問題。這就證明，也是得明顯的。被十八年來黨的歷史所說明了。

所以，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鬥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的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就等於正確的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而在十八年黨的歷史中，我們已經能夠做出正確的結論來了。就是說，我們已經能夠正確的處理統一戰線問題，是正確的處理武裝鬥爭問題，又正確的處理黨的建設問題。也就是說，十八年黨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偉大的成績。

在這裏，讓我們對於這三個法寶，三個問題，分別的大略的說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國無產階級同中國資產階級及其他階級的統一戰線，是在三種不同的情況、三種不同的階段中間發展着的，這就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階段，十年內戰的階段，今天抗日戰爭的階段。三個階段中，說明了下列的規律：（一）由於中國最大的壓迫是

民族壓迫，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軍閥的鬥爭的。因此，無產階級在這種一定的時期內，應該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綫，並盡可能的保持之。(二)又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下，它就會動搖變節。因此，中國革命統一戰綫的內容不能始終一致，而是要發生變化的。在某一時期有資產階級參加在內，而在另一時期則資產階級並不參加在內。(三)由於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就是在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參加統一戰綫並和無產階級一道向共同敵人進行鬥爭的時候，它們也把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發展，看做是不利於它們，而要加以限制，而要採取欺騙、誘惑、溶解與打擊等破壞政策，並即拿這個政策作為它們收買敵人與分裂統一戰綫的準備的。(四)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五)城市小資產階級是在三年的抗戰中也在證明着。因此，無產階級的政黨在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太資產階級)組織統一戰綫的問題上，必須實行堅決的、嚴肅的兩條戰綫鬥爭。一方面，反對對於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的革命可能性的忽視，把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看做一樣，因而忽視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綫並盡可能保持這統一戰綫的政策，這就是「左」傾國門主義。另一方面，則要反對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政策以及革命的綱領、政策、思想、實踐等等看做一樣的東西，忽視它們之間的差別。

別；忽視資產階級不但在極力影響小資產階級與農民，而且還在極力影響無產階級與農
產黨，力求消滅無產階級與其產黨在思想、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而把無產階級
與其產黨變成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實歸於資產階級的一黨一黨，而
一到革命對於它們一黨一黨的私利相衝突時，它們就實行叛變革命，如果我們忽視了這
一方面，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過去陳獨秀主義的特點，就是引導無產階級適合資產階
級一黨一黨的私利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中國資產階
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這種二重性，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的影響
是異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
與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向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
政治路線。中國共產黨的黨的建設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向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
中間黨派與組織出來的。這裏所謂聯合，就是統一戰綫。所謂鬥爭，就是在聯合時，在
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
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
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
嚴肅的「和平」鬥爭，黨在組織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
我們黨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武裝鬥爭，同樣黨
也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所有這些都是在過去十八年的歷史中證明了的。

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它的歷史，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參加資產階級的北伐戰爭。這時，我們黨雖已開始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但還沒有徹底了解其重要性，還沒有了解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第二階段，是十年內戰。我們黨已經建立了獨立的武裝隊伍，已經學會了獨立的戰爭藝術，已經建立了人民政權的根據地，並且已經能夠把武裝鬥爭這個主要鬥爭形式與其他許多的必要的鬥爭形式直接或間接的配合起來，就是說，同工人的鬥爭，同農民的鬥爭（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婦女的、一切人民的鬥爭，同政權的鬥爭，同經濟戰線上的鬥爭，同奸細線上的鬥爭，思想戰線上的鬥爭，等等鬥爭形式，都在全國範圍內或者直接的或者間接的配合起來。而這種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土地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武裝鬥爭史的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我們能夠運用過去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鬥爭的經驗，能夠運用武裝鬥爭形式與其他各種必要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這種鬥爭的總概念，就是游擊戰爭。游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不讓敵人佔領，因而是最後的鬥爭形式。十八年來，我們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組織，是這樣聯系於這一鬥爭形式的。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了解我們的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環就是武裝鬥爭。十八年來，我

們黨是已經學會了並堅持了武裝鬥爭這個路線。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九年來，我們黨的發展範圍與布爾塞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是與游擊戰爭不能分離的，沒有武裝鬥爭，沒有游擊戰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黨的建設的過程，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也同樣是有三個階段特點的。第一階段是幼年的黨。在這個階段的初期與中期，黨的路線是正確的，黨員羣衆與黨的幹部的革命積極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獲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勝利。然而這時的黨畢竟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綫、武裝鬥爭與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都不懂得或不豐富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因此，黨的領導機關中佔統治地位的成分，在這一階段的末期，在這一階段的緊要關頭中，沒有能夠領導全黨鞏固革命的勝利，接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而使革命遭受了失敗。在這一階段中，黨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是沒有鞏固，沒有能夠使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鞏固起來。新黨員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與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夠很好的總結起來。黨內混入了大批的投機份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敵人民同盟者都在陰謀陷害我們

的黨，但是沒有警覺性。黨內湧出了很多的活動分子，但是沒有來得及造就黨的中堅骨幹。黨的手裏有了一批革命武裝，但是不能靠得住。所有這些情形，都是由於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而來的。這就是黨的建設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即十年內戰的階段。由於有了第一階段的經驗，由於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的進一步的了解，由於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有了進一步的聯繫，就使得我們黨能夠進行了勝利的十年蘇維埃鬥爭。資產階級雖然叛變了，但是黨能夠緊緊的依靠着農民。黨的組織不但重新發展了，而且得到了鞏固。敵人雖然天天在陷害我們的黨，但是黨驅逐了暗害分子，黨內不但重新湧出了大批的幹部，而且使這些幹部變成了黨的骨幹。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所有這些，都是黨的重大進步與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黨員是在這個偉大鬥爭中跌下了或跌下過機會主義的泥坑，這仍然是因為他們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於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太缺乏，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因此，就使黨的領導機關的一部分人，沒有能夠在這一整個階段的一切時間中都完全的掌握住正確的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黨與黨會在一個時間中是遭受過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而在另一個時間中，又遭

變過革命戰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與白區工作中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然而這一切，是在黨的四中全會與黨的選舉會議這兩個歷史的會議中所先後戰勝了。及至選舉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義開會）以後，黨就澈底的走上了和爾塞維克的道路，奠定了變本戰勝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這就是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二個階段。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三個階段，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階段。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三年，這三年的鬥爭，是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的。黨憑藉着過去兩個革命階段中的經驗，憑藉着黨的組織力量與武裝力量，憑藉着黨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很高政治信仰，憑藉着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更加深入的更鞏固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進行了偉大的抗日戰爭。黨的組織已經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變成了全國的大黨。黨的武裝力量，也在同日寇的鬥爭中重新壯大起來與進一步堅強起來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更加擴大了。這些都是偉大的成功。然而，黨是發展了，但有大批的新黨員與很多的新組織並沒有鞏固，它們同老黨員與老組織之間，還存在着很大的區別。它們還沒有很多的革命經驗。它們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還不懂得或不豐富。它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完全的统一理解，還相距很遠。在過去發展黨的組織中間，雖然中央着重提出了「大大發展黨，但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的口號，但實際上是混進了許多投機分子與敵人的暗探分子在內。統一戰線確

總建立了並堅持了三年之久，可基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時時刻刻在企圖破壞我們的黨，大資產階級投降派與頑固派所指揮的嚴重的脫離鬥爭在全國進行着，反共之舉遍於各地，大資產階級投降派與頑固派並想以此作為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統一戰線和拉了中國向後倒退的準備。資產階級在思想上企圖瓦解共產主義，在政治上、組織上企圖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黨的武裝力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任務，無疑是克服這種投降、分裂與倒退的危險，盡可能的保持民族統一戰線，保持國共合作，而爭取繼續抗日、繼續團結與繼續進步；同時，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而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意外的損失。為達此目的，就要鞏固黨的組織，鞏固黨的武裝力量，並動員全國人民，進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堅決的鬥爭。這種任務的完成，依靠全黨的努力，依靠全體黨員、黨的幹部、黨的各地各級組織，實行不屈不撓地接再厲的鬥爭。而我們相信，在有了十八年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的有經驗的老黨員、老幹部和帶着新鮮血液富有朝氣的新黨員、新幹部相互協力之下，在它的經歷過風浪的有爾塞羅克的中央與地方組織相互協力之下，在它的堅強的武裝力量與進步的人員羣衆相互協力之下，這些目的是可能達到的。

這就是我們黨在十八個年頭與三個階段中的主要的經歷與主要的問題。

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與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與武裝鬥爭這兩個

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係。

我們今天要怎樣建設我們的黨，要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有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考察一下我們黨的歷史，就會懂得，把黨的建設問題同統一戰線問題、同武裝鬥爭問題聯系起來看一下，把黨的建設問題同聯合資產階級又和它作鬥爭的問題、同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抗日遊擊戰爭與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問題聯系起來看一下，就會懂得。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與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鐵」一樣的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毛澤東同志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及結論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

甲 報告——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目前階段的任務（提綱）

1 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

由於中日矛盾成爲主要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與服從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與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革命形勢的新發展階段。

(一) 中國很久以來就是處在兩種劇烈的基本的矛盾鬥爭中——帝國主義與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由於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出賣民族利益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造成了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尖銳對立及民族與民主革命任務不能不由共產黨單獨負擔的局面。

(二) 九一八事變及華北事變以來的形勢，使這些矛盾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A) 由一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變爲特別突出與對立的日本帝國主義與

中國的矛盾，即是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了和實行着完全變革地與獨佔中國的職能征服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排入次要的地位，而在這些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並且也在社會主義蘇聯與日本之間，則擴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世界的和平陣綫相結合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綫是抗日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中國與蘇聯應聯合起來。

(B) 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發生了他們的存亡問題，而逐漸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發展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與法國人民陣綫有區別的抗日的民族的統一戰綫的任務，並指出了這種任務有完成的可能，而且應速完成之。我們的統一戰綫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

(C) 中日矛盾變動了全國人民大眾（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情況與政策。人民是更大規模的起來為生存而鬥爭。共產黨繼續「八一」後在三個條件（停止進攻蘇區，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下與國民黨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把它提高到建立全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新政策。這就是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十二月決議，一九三六年春天開始放棄「反蔣」口號，八月致國民黨書，九月民主共和國決議，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及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等等我們的主張與積極努力之所由來。

(D) 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與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狀況而來的中國軍閥割據與軍閥內戰，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趨於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贊助這種割據與內戰，以便利其獨佔中國。若牙其他帝國主義站在它們自己的利益上，贊助中國的統一與和平。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則以極大的努力反對內戰與分裂，爭取和平與統一。

(E) 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與集團間矛盾的地位，使它變為次要與服從的東西。但國內階級矛盾與集團矛盾本身的內憂依然存在着，並沒有減少或消滅。中國與日本以外其他帝國主義之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務：適當的解決國內國際在現時可能與必須解決的矛盾，使之適合於團結抗敵的總任務。這就是和平統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與外國和平談判種種方針之所由來。

(三) 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階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中全會時，宣告結束了。此階段內的重大事變，是學生界、救國界、與論界的救亡運動、紅軍的進入西北、共產黨的抗對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黨宣傳與組織工作、上海與青島的反日罷工，英國對日政策趨向比較的強硬，兩廣事變，綏遠戰爭與綏綏運動，南京在中日談判中的較強硬態度，官場上起了承上啓下作用而成為時局轉變關鍵的西安事變，最後是南京偽三中全會。這些事變，統統都是圍繞着中國革命本對途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間接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顆歷史要索的。這第一階段的革命基

本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消除國內黨立，以備團結抗戰，共圖救國。黨在此階段內提出了正確的動員口號，即是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一任務是基本上完成了，這就構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際形成上的第一個必要條件。

(四) 國民黨的三中全會，由於他們內都有親日派與動搖派的存在，沒有表示他們政策的明確與澈底的轉變，沒有具體的解決問題。然而由於人民的逼迫與國民黨內部的變動，使國民黨不能不開始轉變他們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與不抵抗的政策，向和平、民主與抗戰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我們的，即全國人民迫切要求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也可以看出來。今後的問題是國民黨政策的澈底轉變。這就需要我們及全國人民更大的發展抗日與民主的運動，進一步的批評、推動與督促國民黨，團結國民黨內的和平民主抗戰派分子，推動動搖猶豫派分子，而排除親日派分子，才能達到目的。

(五) 目前的階段，即從國民黨三中全會到開始實現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之時的階段，是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二個階段。前一階段與後一階段都是走上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如果前一階段的任務主要的是爭取和平，則後一階段的任務主要的是爭取民主。如果前一階段裏和平的取得，得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則後一階段裏民主的取得，將構成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二個必要條件。在爲着抗日救亡的總目標而努力於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只有由於它，保衛祖國

的任務才能達到)的時候，必須知道沒有國內和平固然是不行的，沒有國內民主也就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與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而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實現與取得澈底的勝利以保衛中國與收復失地，也就將成爲不可能。

2 爲民主與自由而鬥爭

(六)對於中國本部的侵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準備着，日德意同盟條約的訂立，二十八萬萬元預算的通過，議會的解散，滿洲的增強，都是向着這一目的。同希特勒、莫索里尼在西方加緊準備的強盜戰爭相呼應，日本在東方正在用盡一切氣力在確定的步驟上準備一舉滅亡中國的條件——國內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條件，國際外交條件，中國親日勢力的扶植。所謂「中日提攜」與某些外交步驟的緩和，正足證明戰爭前夜侵略政策的戰術上的必要。中國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問題的關頭，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燃眉的急迫性與跑步的速度去準備。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無期準備論，反對文恬武嬉飽食終日的亡國現象，這些都是實際上幫助敵人的東西，必須迅速清除乾淨。

(七)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

可一則延緩對於它們的準備工作的。而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爲保證抗戰勝利的心一環。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踏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阿比西尼亞主要的是因爲內部封建制度的深刻矛盾，因此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不能發動人民的積極性，所以失敗了。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

(六) 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之下，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一黨一派一階級的獨裁專制政體，變爲各黨各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面，應從國民大會選舉與召集上述反民主的辦法，改變爲民主的選舉、與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製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爲止。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的鞏固國內和平，消除國內對立，增強國內團結，以便舉國一致抗禦外敵。會有這種情況發生，不待我們改革完畢，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就到來了。因此，爲隨時能夠抵抗日本的進攻並徹底戰勝之，我們必須迅速進行改革，並準備在抗戰的過程中達到徹底改革的程度。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與製定憲法問題上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着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與憲法運動，嚴厲的批判、推動與督促當權的國

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非民主的限制性，採取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而使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放在國民大會與憲法之民主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革命。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與收復失地的勝利。當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爭取這一任務上的某些最低限度之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與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綱領上的重要一部，同時也就是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獲得真正的堅實的建立之必需條件。

(九)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茨基派，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自由，與對日抗戰這一偉大的革命運動之每一步驟，都竭盡全力來破壞。當我們過去力爭和平統一的時候，他們就竭力進行內戰與分裂的運動。當我們現在與最近將來力爭民主自由的時候，他們無疑的又要來破壞。其總目標，就在使我們保衛祖國的抗戰任務不能成功，而使他們滅亡中國的侵略任務達到目的。今後爭取民主自由總鬥爭中，不但要向國民黨頑固派及人民落後成分做努力的宣傳鼓動與批評的工作，而且要針對着日本帝國主義，及充任日本侵略走狗的親日派與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作盡量的揭發與堅決的鬥爭，才能達到目的。

(十)爲了和平、民主與抗戰，爲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國共產黨會在致

國民黨三中全会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一）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二）在蘇區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四）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些保證，是必須的與許可的。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在根據於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變化而必須改變的國內兩個敵權對立狀態這一原則之下，得着新的基礎，以便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拿這種讓步去兌換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與抗戰。然而讓步是有限度的，在蘇區與紅軍問題上共產黨領導的保持，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共產黨獨立性與批評自由的保持，這就是讓步的限度，超過這種限度是不許可的。讓步是兩黨的讓步，國民黨拋棄內戰、獨裁與不抵抗政策，共產黨拋棄兩個敵權對立的政策，我們以後者換得前者，重新命作爲禦侮救亡而奮鬥。如果說這是共產黨的投降，那不是阿Q主義，就是惡意的污蔑。

（十一）共產黨是否同意三民主義？我們的答覆：是同意的。三民主義有它的歷史變化。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曾經因爲同共產黨合作與堅決執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發動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勝利的太革命。又曾經因爲排斥共產黨（清黨運動），實行相反的政策，而失去人民的信仰，招致革命的失敗，陷民族國家於危亡地位。現在則因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極端嚴重，國民黨已不能照舊不變的統治下去，全國人民與國民黨中愛國分子，因而有兩黨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頓三民主義的精神，在對

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與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之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的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求，而應爲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共產黨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階段。共產黨有自己的黨綱與政綱，其黨綱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與三民主義有區別的。其民主革命的政綱，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爲徹底，但對於國民黨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宣佈的三民主義的綱領，則是基本上不相衝突的。因此，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爲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十二)我們過去蘇維埃口號是否錯了？沒有錯的。資產階級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變爲人民的敵人，革命任務沒有完成而遭受了失敗，則革命的成分便只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革命的黨派，便只剩下了共產黨，革命的責任，便不得不落在共產黨單獨一個黨派的肩上了。僅僅共產黨高舉起革命的旗幟，保持了革命的傳統，提出蘇維埃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且爲此口號而艱苦奮鬥了許多年。蘇維埃工農民主共和國口號，不是違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而是堅決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我們在實際鬥爭中沒有一項政策不適合這種任務。我們的政策，包

括沒收地主土地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內，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範疇內私有財產制的界限以外，並沒有實行社會主義。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口號下，它所包括的成分是什麼呢？它是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與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這些階級的民族與民主革命的聯盟。這裏的特點，就是因為資產階級在今天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又有重新參加革命的可能，所以無產階級政黨應該不拒絕他們，而應該極力招致他們，與之恢復鬥爭的聯盟，利於中國革命的轉向前進。為消除國內的武裝對立，共產黨願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準備在民主共和國過程中，用立法的手段及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中國土地屬於日本帝國主義，還是屬於中國人，這是首先待解決的問題。在保衛中國的大前提之下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由暴動沒收方法過渡到新的適當方法上去是必要的。

蘇維埃口號，過去的提出與今天的放棄，都是正確的。

（十三）爲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共同對敵，國內的某些矛盾，必須給與適當的解決，其原則是有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之增強擴大，而不是削弱縮小。民主革命的階級內，國內階級間、黨派間、集團間的矛盾與鬥爭是無法避免的，但可以而且應該停止其不利於團結抗敵的部分（國內戰爭，黨派對立，地方割據，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壓迫與經濟壓迫，一方面暴動政策與不利於抗日救亡的經濟條件等等），而保存其有利於團結抗敵的部分（批評的自由，黨派的獨立性，人民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之改善等等）。

(十四) 在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任務之下，紅軍與蘇區的任務是：(一) 把紅軍提高到適合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新階段。爲此目的，紅軍即改組爲國民革命軍，並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到超過自己現狀及一切國內軍隊的水平之上，造成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模範兵團。(二) 蘇區改變爲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組成部分，實行新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搗亂分子，造成抗日與民主的模範區。(三) 在此區域內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恢復與增進人民的經濟生活狀況。(四) 以消滅文盲爲目的，實行有計劃的文化建設。

3 我們的領導責任

(十五) 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夠參加反帝與反封建制度之中國資產階級(正確點說，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它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會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因此，中國反帝與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達到目的。並且只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堅持性與徹底性的充分發揚，才能克服資產階級的那種先天的動搖性，與不徹底性，而使革命不至於流產。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之關鍵。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經驗，證明了當資產階級領導者無產階級的動搖領導

時，革命是如何的推向前進了，及至無產階級（由無產階級政黨負責）政治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時，革命又是如何的遭到了失敗，這種歷史是不宜於重複的。今天說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及其任務的完成，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就不能有任何成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在今天，資產階級還帶着更多的被動性與保守性，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發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在長久的時期中表示不敢慷慨接受，就是證據。因此，就更加重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責任，抗日救國的總動員部的職務，共產黨是責無旁貸與義不容辭的。

（十六）無產階級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於全國各階層的政治領導，是怎樣去進行的呢？首先是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與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與每一重大事變當中的動員口號。例如我們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基本的口號，又提出了「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的口號，作為全國行動的總目標與具體方針，沒有這種目標與這種方針，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是按照這種目標與具體方針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們的先鋒隊——共產黨員，應該提起自己無限的積極性與忠誠，成為執行這些方針的模範，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民主共和國的一切任務而奮鬥時，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得到羣衆的愛戴，依靠

羣衆的多數。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與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密性。共產黨對全國的政治領導，是由實現上述這些主要的條件去進行的。這些條件的增進與創造成功，是保證自己政治領導的基礎，是使革命進入澈底勝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動搖性所犧牲的前提。

(十七) 和平實現與兩黨合作成立之後，過去爲執行兩個政權對立路線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與工作方法，應全部轉變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民主共和國路線的方面去，從武裝的轉到和平的，非法的轉到合法的，祕密的轉到公開的，單獨的轉到與同盟者合作的。從這樣兩種基本上不相同的東西的中間執行全部工作的轉變是不容易的，是須要從新去認真學習的。從新訓練幹部，成爲主要的一環。

(十八) 關於民主共和國性質與前途的問題，從許多同志中提起來了。我們的答覆是：其階級性是各階級的聯盟，其前途可能走向非資本主義。因爲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在執行民族抗戰任務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國際新環境之下（蘇聯社會主義勝利，世界革命前夕）建立起來的。因此，按照社會條件，它雖一般沒有脫離資產階級國家性質，但按照具體的政治條件，應該是一個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因此，它的前途雖仍有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存在着健全轉變到非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是應該力爭這後一個前途的。

(十九) 向着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同時又向着尾巴主義作鬥爭，是執行黨的任務的必需條件。黨內在民衆運動中，由於中國社會條件的反映，存在着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歷史傳統，這是一個妨礙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與爭取羣衆多數的惡劣傾向。肅清這個傾向於每一具體任務的工作中是必要的。我們的口號，是依靠多數與照顧全局。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這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必然將引導革命趨於失敗。我們的口號是實行堅決的革命政策，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爲達到反對不良傾向的目的，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是必要的，只有這種理論，才是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之途的南針。

乙 結語——爲爭取千百萬羣衆

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

同志們！對於我的報告——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在目前階段的任務，經過幾天的討論之後，除了個別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之外，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這些不同意見，頗帶

重要性，因此我的結論，首先是答覆他們的問題，然後說到一些其他的問題。

1 和平問題

我們黨爲國內和平而鬥爭，差不多兩年的時間了。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我們說和平已經取得，「爭取和平」階段已經過去，新的任務是「鞏固和平」，並指出這是同一「爭取民主」相關聯的——從爭取民主去鞏固和平。我們的這種意見，按照幾個同志的說法却不能成立，他們的結論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動搖於兩者之間的。因爲他們說：「日本後退了，南京更動搖了，民族矛盾下降，國內矛盾上升。」根據這種估計，當然無所謂新階段與新任務，情況回到舊階段，或者還不如。這種意見，我以爲是不對的。

我們說和平取得，並不是說和平鞏固了，相反，我們說它是不鞏固的，和平取得與和平鞏固是兩件事。歷史暫時的走回頭路是可能的，和平發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於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親日派之存在。然而西安事變後和平是事實，這種情況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進攻的基本方針，蘇聯及英法之贊助和平，中國人民的逼迫，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和平方針及取消兩個政權對立的政策，資產階級的分化，國民黨的分化等等），不是蔣介石一個人所能決定與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須多方面勢力作戰，並且必須同日本帝國主義與親日派作鬥爭，才能成功。沒有問題，日本同親日派還在企圖中國的內戰，和平沒有鞏固，正是因爲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結論不是回到「停

止內戰」或「爭取和平」的口號與階級去，而是前進一步，指出「爭取民主」的口號與階段，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抗戰。爲什麼提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與「實現抗戰」這樣三位一體的口號？爲的是把我們的革命車輪推進一步。爲的是情況已經允許我們進一步了。如果否認新階段與新任務，否認國民黨的「開始轉變」，並且邏輯的結論也將不得不否認一年半以來一切爲爭取和平而鬥爭的各派勢力之努力的成績，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頓在舊位置，一步也沒有前進。

爲什麼作出這種不妥當的估計呢？原因在他們不但從根本之點（日本後退，南京更動搖，民族矛盾下降，國內矛盾上升）出發，而且也從許多局部與一時的現象（佐藤外交，蘇州審判，壓制罷工，東北軍東調，楊虎城出洋等等）出發，並把二者聯貫起來，形成一幅暗淡的畫圖。我們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轉變，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並沒有澈底轉變。國民黨的十年反動政策，要它澈底轉變而不用我們同人民新的更多與更大的努力，這是不能設想的事情。不少號稱「左」傾的人們，平日痛罵國民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殺蔣與「打出潼關去」，及至和平剛剛實現又發現蘇州審判等事，就用驚訝的口氣發問道：「爲什麼蔣介石又這樣幹？」這些人們須知：共產黨員同蔣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處於一個黨派，一個階級，一個民族裏頭分子。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的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乾淨。蔣介石或國民黨已經開始看見了他們的轉變，但沒有全國人民的更大努力，也決不會在一個早晨

把他們十年的污濁洗掉得乾淨。我們說運動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與抗戰，但不是說不經努力能夠把內戰獨裁與不抵抗的舊毒去掉乾淨。舊毒，污濁，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頭路，只有鬥爭與努力才能夠克服，而且需要長期的鬥爭與努力。

「他們是一心要破壞我們」。對的，他們總是在企圖破壞我們，我完全承認這種估計的正確，不估計這一點就等於睡覺。但問題在破壞的方式，否有了改變？我以為是有改變的，從戰爭與屠殺政策改變到改良與欺騙政策，從硬的政策改變到軟的政策，從消滅政策改變到爭取政策，從軍事政策改變到政治政策。為什麼有這種改變？資產階級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前不得不向無產階級找同盟軍，也和我們向資產階級找同盟軍一樣，觀察問題應從這一點出發。國際上，法蘇世仇變為盟友，同此道理。我們的任務，亦是從軍事的變到政治的。我們不需要陰謀詭計，我們的目的在團結資產階級及國民黨一切同情抗日分子，共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2 民主問題

「強調民主是錯誤的，僅僅應該強調抗日；沒有抗日的直接行動，就不能有民主運動；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來一個十二月九號才是對的。」

讓我首先發出一點問題：能夠在過去階段中（十二月九號到三中全會）說，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嗎？過去強調和平是錯了嗎？沒有抗戰而直接行動就不能有和平運動

（西安事變與三中全會正在續戰結束之後，現在也還沒有續戰或十二月九號）？誰人不知爲抗日而要和平，無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條件。前一階段一切直接間接的抗日行動（從十二月九號起到三中全會止）都圍繞着爭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階段中心一環，是抗日運動在前一階段中的最本質的東西。

對於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爲民主即是爲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爲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爲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與民主運動發展的有利條件。

新階段中，我們希望有也將會有許多直接的間接的反日鬥爭，這些將推動對日抗戰，也大有援助於民主運動。然而歷史給與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錯的嗎？我以爲是沒錯的。

「日本退後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動搖了」，只是一種不知歷史發展規律而發生的不適當的憂愁。日本如因國內革命而根本後退，這是有助於中國革命的，是我們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戰線崩潰的開始，爲什麼還憂愁？然而暫時還不是，佐藤外交是大戰的準備，大戰在我們面前。英國的動搖政策只能向着無結果，這是英國與侵略國的不同利害決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長期動搖，便變爲全國人民之敵，也爲南京的利益所不許。一時的後退現象，不能代替總的歷史規律。因此不能否認新階段，也不能否認民主任務的提出。況且無論什麼情況，民主的口號都能適應，民主對於中國人民是缺乏而不

是多餘，這是人人明白的。何況實際情況已經表現，指出新階段與提出民主任務，是向抗戰接近一步的東西。時局已經前進了，不要把它拉向後退。

「爲什麼強調國民大會？」因爲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爲它是從獨裁到民主的橋樑；因爲它帶着國防性，因爲它是合法的。收復冀東察北、反對走私、反對經濟提攜等等，如像同志們所提出的，都是很對的，但這絲毫也不與民主任務及國民大會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與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鬥爭與人民生鬥爭，要同民主運動相配合，這是完全對的，也沒有任何爭論的。但目前階段裏中心同本質的東西，是民主與自由。

3 革命前途問題

有幾個同志發出了這個問題，我的答覆只能是簡單的。

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的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爲着社會主義而鬥爭，這是與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今日的努力是朝着明日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將有幾個發展階段，應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下面，而不在蘇維埃口號下面。從資產階級領導到無

產階級佔優勢，這是一個鬥爭的長過程，爭取領導權的過程，依靠着共產黨對無產階級覺悟與組織程度的提高，對農民、對小資產階級覺悟與組織程度的提高。

無產階級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其次是小資產階級。同我們爭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

對資產階級的動搖與不徹底性的克服，依靠羣衆的力量與正確的政策，否則資產階級將反過來克服無產階級。

健全的轉變（不流血的）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該力爭這一着，結果將看羣衆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也不是半托洛茨基主義的修正主義。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與急性病。

因為資產階級的暫時性而不要資產階級，指聯合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在半殖民地）爲投降主義，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說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聯合資產階級革命派，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樑。

幹部問題

担负着指導偉大的革命任務，要有偉大的黨，要有偉大的領袖與幹部。在一個四萬

萬五千萬人的中國裏面，進行歷史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班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與幹部也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與幹部，但是還不夠。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的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數百個最好的羣衆領袖。這些幹部同樣補償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並拿出全部忠心爲民族爲階級爲黨而工作。黨的路綫依靠着這些人而聯系到黨員與羣衆，依靠着這些人對於羣衆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與風頭主義，不要懶惰與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與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與作風。我們死去的若干萬數的黨員，若干千數的幹部與數十個最好的領袖遺留給我們的精神，也就是這些東西。我們應該學習這些東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是無疑地需要的。但是還不夠，還要作爲一種任務，向全黨與全國找尋許多新的幹部與領袖。我們的革命依靠幹部，好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話，「幹部是決定一切的一」。

黨內民主問題

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就要實行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去

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與內戰時期，集中制表現的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系於民主制。從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從發揮全黨的積極性，創造出大批的幹部與領袖，肅清派別觀念的殘餘，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

6 大會的團結與全黨的團結

大會中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經過說明已經歸於一致了，過去中央路線與個別同志領導的邊却路線之間的分歧，也已經沒有了，表示了我們的黨已經團結得很堅固的。這種團結是當前民族與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礎，因為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與全民族的團結，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實現民族與民主革命的任務。

7 爲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與堅固的團結，唯一的是向着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目的。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羣衆，有待於我們宣傳、鼓動與組織的工作，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進入和我們的同盟，也還有我們的進一步工作。把黨的方針變爲羣衆的方針，還須要我們長期堅持的、百折不撓的、艱苦卓絕的、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沒有這一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羣衆或

其任務的完成，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實現，絲毫也不能離開這一爭取羣衆的努力。如果經過這種努力而得到千百萬羣衆在我們領導之下的話，那我們的全部革命任務就能迅速的实现。資本帝國主義什麼也不怕我們，但它害怕我們的這種努力。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

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务的決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洛川會議——

(一) 蘆溝橋的撻戰與平津的佔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整個計劃的開始。日寇已經開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他們一切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進攻的烟幕彈。

(二) 南京政府在日寇進攻與人心憤激的壓迫下，已經開始定下了抗戰的決心。整個的國防部署與各地的實際抗戰，也已經開始。中日大戰不可避免。七月七日蘆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

(三) 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在這一新階段內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過去階段中，由於國民黨的不願意與民衆的動員不夠，因而沒有完成爭取民衆的任務，這必須在今後爭取抗戰勝利過程中去完成。

(四) 在這一新階段內，我們同國民黨及其他抗日派別的區別與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

(五) 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是在使國民黨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勝利。本黨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即是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具體的道路。

(六) 今天所發動的抗戰，中間包含着極大的危險性。這主要的是由於國民黨還不同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戰。相反的，企圖把抗戰看成只是政府的事，處處懼怕與限制人民的參戰運動，阻礙政府軍隊與民眾結合起來，不給人民以抗日救國的民主權利，不去澈底改革政治機構，使政府成為全民族的國防政府。這種抗戰可能取得局部的勝利，然而決不能取得最後勝利。相反的，這種抗戰存在着嚴重失敗的可能。

(七) 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着上述的嚴重弱點，所以在今後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與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平津的喪失就是東四省喪失後最嚴重的教訓。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與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的前進與發展。我們應該克服一切困難，為實現本黨所提出的爭取抗戰勝利的十大綱領而堅決奮鬥。堅決反對與此綱領相違背的一切錯誤方針，同時反對對觀望失望的民族失敗主義。

(八) 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衆與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的站在鬥爭的最前綫。

應該把自己成爲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力量發展抗日的羣衆運動。不放鬆一類工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只要其能組織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抗日戰爭的勝利是無疑義的。

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形勢與任務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同志在

延安共產黨活動分子大會上的報告提綱——

一 目前形勢是處在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

(一) 我們贊助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抗戰，即使是片面的抗戰。因為它比不抵抗主義進一步，因為它是帶着革命性的，因為它也是在爲着保衛祖國而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是需要保衛祖國的。

(二) 但是我們早就指出，四月的延安活動分子大會，五月的蘇區黨大會，八月的中央決議案：不要人民羣衆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因為它不是羣衆戰。

(三) 我們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全面抗戰。因為只有這

種抗戰，才是羣衆戰，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

(四) 國民黨主張的片面抗戰，雖然也是民族革命戰爭，雖然也帶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不完全，是一定要引導戰爭趨於失敗的，是決然不能保衛祖國的。

(五) 這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與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存在着原則分歧的地方。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就不能正確的指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他就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面性，把共產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就對於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與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

(六) 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全面抗戰，必須執行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必須有一個完全執行這個綱領的政府與軍隊。

(七) 上海太原失陷後的形勢是這樣的：

1. 一方面表現：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國民黨陣綫已被擊破，日寇正向南京及長江流域進攻。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已表現不能持久。

2. 英美法等國政府站在它們自己帝國主義利益上的援助中國，爲限制在口頭上的同情，還沒有什麼實力的援助。

3. 德意法西斯竭力援助日本帝國主義。

4. 國民黨用以支持片面抗戰的一黨專政及其對民衆的統制政策，還不願意作原則

上的改變。

這些是一方面的情形。另一方面則表現：

1 共產黨與八路軍的政治影響極大與極快的擴大，「民族救星」的聲浪在全國傳播着。共產黨與八路軍決心堅持華北的游擊戰爭，用以捍衛全國，箝制日寇向中原與西北的進攻。

2 民衆運動開展了一步。

3 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

4 國民黨中主張改革現狀的勢力正在增長。

5 世界人民反日及援助中國的運動正在發展。

6 蘇聯正在準備用實力援助中國。

這些是又一方面的情形。

(八) 因此，目前是處在從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片面抗戰已經無力持久，全面抗戰還沒有來到，一個青黃不接危機嚴重的過渡期。

(九) 在此期間，中國的片面抗戰可能向三個方向發展：

第一個方向，結束片面抗戰，代以全面抗戰。這是國內大多數人的要求，但國民黨還沒有下決心。

第二個方向，結束抗戰，代以投降。這是日寇漢奸親日派的要求，但遭到了中國大

多數人的反對。

第三個方向，抗戰與投降並存於中國。這將是日寇漢奸親貝漢無法達到第二個方向，因而實行其破裂抗日陣綫政策的結果，他們正在策動這一着，想個危險嚴重地存在。

(十) 依目前形勢看來，國內國際不許可投降主義得勢的因素，是佔着優勢。這些因素是：日本滅亡中國的總方針，共產黨與八路軍的存在，中國人民的要求，國民黨內多數黨員的要求，投降對於英美法的損失，蘇聯的存在及其準備援助中國的方針，中國人民對於蘇聯的深切希望（這種希望不是空的）等等。如果把這些因素好好地組織起來，不但將克服投降與分裂的因素，也將克服停頓於片面抗戰的因素。

(十一) 因此，爭取從片面抗戰轉變到全面抗戰的前途是存在的，這是一切中國共產黨員，一切中國國民黨先進黨員，與一切中國人民的共同的迫切任務。

(十二) 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現在是處在嚴重的危機中。危機存在的時間，也許將延長，但也許將較快的被克服。決定的因素，在中國內部是國共兩黨的合作及基於此合作之國民黨政策的轉變，是工農羣衆的力量，在中國外部是蘇聯的援助。

(十三) 國民黨有在其政治上、組織上加以改造的必要，也有這種可能，這主要是因爲日本的壓迫，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綫政策，中國人民的要求，國民黨內部新生力量增長。我們的任務是爭取其實現這一改造以便作爲改造政府與改造軍隊的基礎。這一

改造無須得到國民黨中央的同意，我們是站在建議的地位。

(十四) 改造政府。我們提出了召集臨時國民大會的方針，這也是必要與可能的。這一改造也無須得到國民黨的同意，並以它為主幹。

(十五) 改造軍隊的方向是建立新軍隊與改造舊軍隊。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內建立二、三五萬到三十萬具有新政治精神的軍隊，則抗日戰場上必能開始看到轉機。這種新軍隊影響並團結一切舊軍隊，這是抗日戰爭轉入戰略反攻的基礎。這一改造同樣沒有疑義，須得到國民黨的同意並以它的軍隊為主幹，八路軍應在這一改造過程中起着模範作用。八路軍本身也應該擴充。

二

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在黨內是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在全國是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

1 關於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

(十六) 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大革命歸於失敗了，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

(十七) 對於我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路線，在盧溝橋事變以前，黨內主要的危

階級向是「左」傾機會主義，即關門主義，這主要的是因為國民黨還沒有抗日的緣故。
 (十八) 在盧溝橋事變以後，黨內主要的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這主要的是因為國民黨已經抗日了的緣故。

(十九) 還在四月延安活動分子會，又在五月蘇黨大會，特別在八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洛川會議）時，我們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統一戰綫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在當前具體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說：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及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主張的並實行它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及片面抗戰？

(二十) 爲什麼要這樣尖銳的提出問題呢？這是因為：

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國民黨三中全會宣言及決議上面洩露及侮辱共產黨的決議與所謂「停止階級鬥爭」的「理論」，國民黨關於共產黨投降的真心企圖與到處宣傳，蔣介石企圖統制共產黨，國民黨對於紅軍的限制與削弱政策，國民黨對於蘇區的限制與削弱政策，國民黨七月廬山訓練班提出「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一」的陰謀，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剝誘，某些革命小資產分子政治上的投降舉動（章乃器爲代表），等等情況。

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均，許多黨員缺乏大革命時期階級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十年艱苦生活不願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綫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紅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共產黨參加政權問題的發生，蘇區中的遷就傾向，等等情況。

由於上述兩方面的嚴重的情況，必須尖銳的提出這個問題，必須堅決的反對投降主義。

（三十一）幾個月以來，主要的是抗戰以來，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組織，同這種已經發生的及可能發生的投降主義傾向作了明確而堅決的鬥爭及必要的防止，並且收到了成績。

在參加政權問題上，中央發出了一個決議案的草案。

在紅軍中，開始向新軍閥主義作鬥爭，這種傾向表現在紅軍改編後某些個別分子不願意嚴格受共產黨的領導，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以做官為榮耀）等等問題上面。這個新軍閥主義傾向雖然和表現在打人罵人破壞紀律等現象止面的老的軍閥主義同其根源：把無產階級降低到農民，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同其結果：脫離羣衆。然而它是在國共兩黨統一戰綫時期發生的，它特別帶着危險性，所以特別值得注意。因受國民黨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及下級政治部改名為政訓處，現在也提出把它恢復了。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個新的戰略原則並堅持地執行之。基本上採

除了紅軍作戰上與工作上的勝利。拒絕了國民黨派遣他們的黨員來當紅軍的幹部，堅持了共產黨對領導紅軍的原則。在蘇區，同樣提出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糾正了「議會主義」傾向（當然並不是第二國際的議會主義，這種議會主義在中國黨內是沒有的），堅持了反對土匪敵探及破壞者的鬥爭。

在西安，糾正了兩黨關係上的無原則傾向（遷就傾向），重新開展了羣衆鬥爭。在關東情況與西安大體相同。

在上海，對「少數名多建議」的拿乃器主義給了批評，開始糾正了救亡工作中的遷就傾向。

在南方各游擊區，這是我們同國民黨十年血戰的結果，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在南方各省的戰略支點，是國民黨在西安事變後還用圍剿政策企圖消滅在盧溝橋事變後則改用調虎離山政策企圖削弱的力量。在這個關頭上，我們的注意力是集中在：（1）無條件集中傾向（適應國民黨拔去這些支點的要求）的防止；（2）國民黨派人的拒絕；（3）何鳴危險（閩粵邊游擊隊千餘被繳械）的警戒。

在解放報，嚴正批評態度的堅持。

（二十二）爲了堅持抗戰及爭取最後勝利，爲了變片面抗戰爲全面抗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綫，必須擴大與鞏固統一戰線，任何破裂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的主張，是不許可的，「左」傾關門主義仍然要防止。但同時，在一切統一戰線工作中必

須密切聯系到獨立自主的原則。我們同國民黨及其他任何派別的統一戰綫，是在實行一定綱領上面的統一戰綫，離開一定綱領的實行就沒有任何的統一戰綫，就變成無原則的舉動了，這就是投降主義的傾向。因此，「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與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二十三) 我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在於保持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這是我們的「戰略出發地」，喪失了這種陣地就一切無從說起了。但主要的目的還在於另一方面，這就是為了發展陣地，為了實現「動員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積極的目的。保持陣地與發展陣地是不可分離的。幾個月來，小資產階級的左翼羣衆是在我們的影響下更大地團結起來了，國民黨營壘中的新生力量是在增長中，山西的羣衆鬥爭是發展了，黨的組織在許多地方也發展了。

(二十四) 但是必須清楚的懂得，黨在全國的組織力量，一般說起來還在微弱的狀態中，全國的羣衆力量也還很薄弱，主要的是全國工農基本羣衆還沒有組織起來。所有這些，一方面由於國民黨的控制與壓迫政策，一方面則是由於我們自己的沒有工作或工作不足，這是我黨在現時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最基本的弱點。不克服這個弱點，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但要達到此目的，一定要實行「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要克服無原則的投降主義或遷就主義。

(二十五) 上面說的是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它引導無產階級去適合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與不澈底性，不克服此傾向，就不能執行勝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就不能變片面抗戰爲全面抗戰，就不能保衛祖國。

但是還有一種投降主義，這就是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它引導中國去適合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使中國變爲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中華民族變爲亡國奴。這個傾向在現時是發生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中。

(二十六)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左翼集團是共產黨率領的羣衆，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及小資產階級。我們的任務，是用一切努力去擴大與鞏固這個集團。這一任務的進步、發展與完成，是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約民主共和國建立起來的基本條件，是變片面抗戰爲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條件。

(二十七)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央集團，是民族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由上海各大報所代表的成分是左傾了，復興社的一部分是開始左傾了，CC團也有一部分在動搖中，抗戰的軍隊是得到了嚴重的教訓，其中其變成分是開始了或準備着改造軍隊，國民黨的報紙也有了某些進步現象，我們的任務，是爭取中央集團的進步與轉變，

這一步驟如果不做到，轉變時期是不可能的。

(二十八)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是大地主與大資產階級，這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一方面戰爭對於他們的破壞，一方面民衆對於他們的威脅，他們的投降傾向是必然的。他們中間許多人已經是壞好，許多人已經是親日派，許多人是準備作親日派，許多人在動搖中，僅僅個別有特殊情況的分子是堅決的。他們中間有些人之暫時加入民族統一戰線是被迫着勉強做的。一般說來，他們之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分裂出去是不遠的前途。目前大地主與大資產階級中的許多最壞的分子，正在策動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是謠言的製造廠，「共產黨暴動」、「八路軍退却」一類的謠言，今後將要與日俱增。我們的任務是堅決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在這鬥爭中擴大與鞏固左翼集團，爭取中央集團的進步與轉變。

3 階級投降主義與民族投降主義的關係

(二十九) 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援助右翼集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爲了爭取中華民族與勞動羣衆的解放，爲了使反對民族投降主義的鬥爭表現得堅決有力，必須反對共產黨內部與無產階級內部的階級投降傾向，要使這一鬥爭開展於各方面的工作中。

戰爭與戰略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六中全會結論之一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一 中國特點與革命戰爭

革命的中心任務與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中國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但在同一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在資本主義各國，在沒有法西斯與沒有戰爭的時期內，那裏的條件是國家內部沒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壓迫別的民族。基於這些特點，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於經過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準備最後推翻資本主義。在那裏，是長期的合法鬥爭，是利用議會講壇，是經濟的與政治的罷工，是組織工會與教育工人。那裏的

組織形式是合法的，鬥爭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戰爭的），戰爭對於那裏的共產黨，是反對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了，黨的政策是使自己國家敗北。自己所要的戰爭只是準備中的國內戰爭。但是這種戰爭，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與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羣衆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起義與戰爭是不應該舉行的。到了起義與戰爭時，又是首先佔領城市，然後進攻鄉村，而決不能相反。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曾經這樣做而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證實了的。

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對內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對外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產黨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的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暴動與戰爭，也不是先佔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的相反的道路。

對於中國共產黨，在帝國主義沒有武裝進攻之時，或者是援助資產階級，進行反對軍閥（帝國主義走狗）的國內戰爭，例如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廣東戰爭與北伐戰爭。或者是聯合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進行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同樣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國內戰爭，例如十年的蘇維埃戰爭。在帝國主義舉行武裝進攻時，則是聯合國內一切階層，同時也就是援助資產階級，進行對外的民族戰爭，例如現在的抗戰。

所有這些，表示了中國與資本主義外國的不同。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他一切，例如民衆組織與民衆鬥爭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但都是爲着戰爭的。在戰爭爆發以前的一切組織與鬥爭，都是爲了準備戰爭的，例如五四運動（一九一九）至五卅運動（一九二五）那一時期。在戰爭爆發以後的一切組織與鬥爭，都是直接間接地配合戰爭的，例如北伐戰爭時期，革命軍後方的一切組織與鬥爭是直接地配合戰爭的，北洋軍閥區域內的一切組織與鬥爭，是間接地配合戰爭的。又如蘇維埃戰爭時期，蘇區內部的一切組織與鬥爭都是直接地配合戰爭的，蘇區外部的一切組織與鬥爭都是間接地配合戰爭的。再如現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日軍後方的與敵軍佔領地的一切組織與鬥爭，也同樣是直接或間接的配合作用。

「中國革命的特點同時又是優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斯大林同志的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確的。無論是對於北伐戰爭說來，對於十年蘇維埃戰爭說來，對於今天的抗日戰爭說來，都是正確的，因爲這些戰爭都是革命戰爭，戰爭反對的對象都是反革命，參加戰爭的主要成分都是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國內戰爭，或者是民族戰爭，或者是共產黨單獨進行的戰爭，或者是國共兩黨聯合進行的戰爭。當然，這些區別是重要的。這些表示了戰爭主體有廣狹的區別（工農聯合或工農資產階級聯合），戰爭對象有內外的區別（反對國內敵人或反對國外敵人，國內敵人又有反對北洋軍閥或反對

國民黨），表示了中國革命戰爭在其歷史進程中有各個時期的不同內容。然而都是武裝人民反對武裝反革命，都是革命戰爭，表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與優點。「革命戰爭是中國的特點與優點」，這一論斷，完全適合於中國的情況，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之主要的與差不多開始即是任務，是聯合盡可能多的同盟軍，組織武裝鬥爭，依其情況，反對內部的外部的武裝反革命，為爭取民族的與社會的解放而鬥爭。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任務。

在這一點上，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黨直至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戰爭的五六年內，是認識不足的，那時不懂得武裝鬥爭在中國的極端重要性，不去認真的準備戰爭與組織軍隊，不去注重軍事的戰略戰術之研究。在北伐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的着重於民衆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什麼民衆運動也場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後一個長時期中，黨的中心任務仍舊放在準備城市暴動與白區工作上面。根本的轉變，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對三次圍剿勝利之後，這也是得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而轉變的。但也還沒有全黨的轉變，許多同志仍舊沒有如同現在我們這樣想。

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認識這一點，對於今後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是有利益的。抗日戰爭中全民武裝反抗的具體事實，將教育全黨進一步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每個黨員都要時刻準備武裝上前綫。我們這次會議又決定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戰區與敵後，更給了一個明確的方針。這對於有些黨員願做黨的工作，願做

民衆運動，而不願研究戰爭與參加戰爭，有些學校沒有注意鼓勵學生並前線的現象，還有一種對總的良藥。大部分中國領土內黨的工作與民衆運動是直接聯系於武裝鬥爭的，沒有也不能有單獨的孤立的黨的工作或民衆運動。一部分距離戰區較遠的後方（如雲、貴、川）與一部分敵人控制的地區（如平、津、京、滬），黨的工作與民衆運動也是配合戰爭的，具體也只應服從前線的要求。一句話，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

二 中國國民黨的戰爭史

我們來看看國民黨的歷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重於戰爭，是有益處的。

從孫中山在廣東組織革命的小團體起，他就進行了幾次反滿的武裝起義。及至同盟會時期，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蹟。直至辛亥成功，武裝推翻了滿清。中華革命黨時期，進行了武裝的反袁運動。海軍南下，桂林北伐，與創設黃埔，都是孫中山的戰爭事業。

蔣介石代替孫中山，創造了國民黨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命，經歷了北伐、內戰與抗日的三時期。過去十年蔣介石是反革命的，但軍中他注重軍事一點來說，他所創造的龐大的中央軍，至今還是抗戰的主力。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

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點，我們應該向之學習。對這點上，孫中山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自承為學生。

辛亥革命後，北湖軍閥，都愛兵如命，他們也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

譚延闓是一個聰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幾起幾覆，從來不做單獨的省長，要做督軍兼省長，他後來做了廣東與武漢的國民政府主席，還是兼了第二軍軍長。這些軍閥也懂得中國的特點。

中國只有一個不要軍隊的政黨，就是進步黨，但他們也懂得必須靠一個軍閥才有官做，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附蔣的是進步黨的一部轉變而成的政學系），就成了他們的靠山。

歷史不長的幾個小黨，如青年黨等，沒有軍隊，因此也鬧不出什麼明堂來。

外國的資產階級政黨沒有直接的軍隊，因為那裏有選舉制度。中國不同，地主資產階級均靠槍桿子吃飯，地主或資產階級的任何個人，或集團，或政黨，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應在這樣環境中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看清問題的中心。

共產黨不爭個人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

人民的兵權。現在是國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功病，必定得不了一點東西。勞動人民幾千年來建立了精治階級專制與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倍得槍桿子的重寶。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臺，共產

黨更應該成爲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衆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戰爭改變一切。有人笑我們是「戰爭萬能論」。對，我們是革命戰爭萬能論，這不是壞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整個世界也要用槍桿子再造過。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

三 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史

我們黨雖然在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準備戰爭與組織軍隊的重要性；一九二四至二七年，乃至其以後一時期，對此也還認識的不足；但從一九二四年參加黃埔開始，已達到了新的階段，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了。經過援助國民黨的廣東戰爭與北伐戰爭，黨已掌握了小小一部分軍隊。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暴動，秋收暴動，與廣州暴動，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澈底認識軍隊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候。

期。沒有這一時期的紅軍及其戰爭，即是說，假如共產黨採取了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的話，今天長期支持的抗日戰爭是不能設想的。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會議與一九三〇年的四中全會，反對了政治上的右的與左的機會主義，使黨大大進步了。但沒有着意涉及戰爭與戰略問題，這是當時黨的重心還沒有放在戰爭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黨的中央遷至蘇區以後，情形有了根本的改變，但對於戰爭問題（以及一切主要問題）又犯了原贖錯誤，致使蘇維埃戰爭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一九三五年的選義會議，則主要的是反對戰爭中的機會主義，把戰爭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是戰爭環境的結果。到今天為止，我們可以自信的說，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年的鬥爭中，不但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而且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我們不但會使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政治問題，而且會使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戰爭問題。不但造就了一大批會治黨會治國的有力骨幹，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會治軍的有力骨幹。這是無數先烈的熱血澆灌出來的革命之鮮花，不但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光榮，而且是世界共產黨與世界人民的榮光。在世界範圍內，還只有蘇聯、中國、西班牙三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三個軍隊，是屬於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國黨都還沒有軍事經驗。所以特別值得寶貴。

爲了勝利地進行今天的抗戰戰爭，擴大與鞏固八路軍新四軍及一切黨領導的游擊隊，是異常重要的。在敵後戰爭中，黨應深遠地考察的場足夠數量的黨員與幹部上前線。

切爲了前綫的勝利，組織任務須服從於政治任務。

四 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中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

我們黨的軍事戰略的變化問題，值得着重地研究一番，分爲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兩個過程來說。

國內戰爭過程中大體可分爲前後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擊戰爭，在後期，主要的是正規戰爭。但所謂正規戰爭是中國型的，只表現在集中兵力打運動戰和指揮上與組織上某種程度的集中性與計劃性上面，其他則仍是游擊性的，低級的，不能和外國軍隊一概而論，也和國民黨軍隊有些不同。因此這種正規戰，在某種意義上，是提高了的游擊戰。

抗日戰爭過程中，就我們黨的軍事任務說來，也將大體上分爲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包括戰略防禦與戰略相持兩個階段），主要的是游擊戰爭，在後期（戰略反攻階段），主要的將是正規戰爭。但抗戰前期的游擊戰爭，和內戰前期的游擊戰爭有許多不同的內容，因爲是用正規性的（某種程度上）入路軍去分散執行游擊任務的。抗戰後期的正規戰爭也將不同於內戰後期的「正規戰爭」，這是設想在裝備了新式技術之後，軍隊與作戰起了一個大的變革而說的。這時的軍隊將獲得高慶的集中性與組織性，作戰將

獲得高度的正規性之大大減少其游擊性，低級的將變到高級的，中國型的將變到世界型的，這將是戰略反攻階段中的事業。

由此看來，國內的游擊與抗日戰爭兩個過程與四個戰略時期之間，共存在着三個戰略的轉變。第一個，國內游擊戰爭與國內正規戰爭之間的轉變。第二個，國內正規戰爭與抗日游擊戰爭之間的轉變。第三個，抗日游擊戰爭與抗日正規戰爭之間的轉變。

三個轉變中，第一個轉變曾發生了根本的困難，這裏的任務，在於一方面反對沉溺於游擊性而不顧向正規性轉變的右的地方主義與游擊主義傾向，這是由於幹部對已經變化的敵情與任務估計不足而發生的。這一方面，拿中央蘇區來說，曾經做了艱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漸轉變過來。又一方面，則要反對過分重視正規化的左的全國主義與冒險主義傾向，這是由於一部分領導幹部對敵情與任務估計過分，並且不講實情，機械地搬運外國經驗而發生的。這一方面，在中央蘇區，曾經在三年的長時間內（邊區會議以前）付與了極大的犧牲，然後才從血的教訓中糾正過來，這種糾正就是遵義會議的成績。第二個轉變是處於兩個不同的戰爭過程之間的，這是去年秋季（廣西橋事變後）的事情。這時，敵人是新的日本帝國主義，友軍是過去的敵人國民黨（他們對我們仍是懷着敵意的），戰場是大範圍的華北（暫時的我軍正區），但不久就會變為長期的敵人後方（）。我們的戰略轉變，是在這些特殊情況之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與運動戰，轉變成為游擊軍（謂其分散使用，不是謂其組

犧牲紀律性）與游擊戰，才能與敵情及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的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因此這個轉變應該是非常困難的。這時可能發生的，一方面是敵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這些在國民黨中都是發生了的。國民黨當它從國內戰爭的戰場向民族戰爭的戰場轉變時，主要由於輕敵，同時也存在着一種恐日病（以韓復榘劉峙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應有的損失，經過了半年以上的血的教訓，才逐漸地改正過來。然而我們却相當順利地執行了這個轉變，不但未遭挫敗，反而大大地勝利了，這是由於幹部適時地接受中央的正確指導與靈活地觀察情況而獲得的，雖然曾經在中央與一部分軍事幹部之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這一轉變關係於整個抗日戰爭堅持發展與勝利，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之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就其特殊的廣大性與長期性說來，不但在東方是空前的，在幾個人類歷史也是空前的。

至於由抗日游擊戰爭到抗日正規戰爭的第三個轉變，則屬之戰爭發展的將來，估計那時又將發生新的情況與新的困難，但現在可以不去說它。

五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

在整個抗日戰爭的全體上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

戰爭的最後命運，只有在正規戰爭才能解決。就全國來說，抗日戰爭全過程中的三個戰略階段（防禦、相持、反攻）中，首尾兩階段，都是正規戰爭為主，輔之以游擊戰爭。中間階段，由於敵人保守佔領地，我雖準備反攻但尚不能實行反攻之情況，游擊戰爭將出現為主要形態，而輔之以正規戰；但這在全戰爭中只是三階段中的一個階段，雖然其時間是最長的。故在全體上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不認識這一情況，不懂得正規戰爭是解決戰爭最後命運的關鍵，不注意正規軍之建設與正規戰之研究與指導，就不能戰勝日本。這是一方面。

但游擊戰爭是在全戰爭中佔着一個重要戰略地位的。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游擊軍之建設與游擊戰之研究與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原因是大半個中國變為敵人後方，如果沒有最廣大的與最堅持的游擊戰爭，而使敵人安穩坐佔，毫無後顧之憂，則我正面主力損傷必大，敵之進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難以出現，繼續抗戰可能動搖，反攻力量準備不足，反攻之時沒有響應，敵之消耗可能取顯著等不利情況，都要發生。假如這些情況出現，而不及時地發展廣大與堅持的游擊戰爭去克服它，那要戰勝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擊戰爭雖在戰爭全體上居於補助地位，但實佔據着重要的戰略地位，抗日而忽視游擊戰爭，無疑是非常錯誤的。這是又一方面。

游擊戰爭的可能，只要具備大國條件就存在的，因此古代也有游擊戰爭。但游擊戰爭的堅持，却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出現，故古代的游擊戰爭都是失敗的游擊戰

爭，只有現代有了共產黨的大國，如內戰時期的蘇聯與中國一類的國家，才有勝利的游擊戰爭。在戰爭問題上，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之分工，就目前及一般的條件說來，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乃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在共產黨協助之下，國民黨軍隊之一部保存於敵後作游擊戰，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由此可以獲得，我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內戰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戰初期的游擊戰爭，是何等重要與必要的了。綜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項：

- (一) 縮少數之佔領地；
- (二) 擴大我之根據地；
- (三) 防禦階段，配合正面作戰，拖住敵人；
- (四) 相持階段，堅持敵後根據地，利於正面整軍；
- (五) 反攻階段，配合正面，恢復失地；
- (六) 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
- (七) 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
- (八) 最普遍地發展民衆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根據地外，都可組織起來；
- (九) 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
- (十) 最普遍地發展抗日文化教育；
- (十一) 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生活；
- (十二) 最便利於瓦解敵人軍隊；
- (十三) 最普遍最持久的影響全國人心，振奮全國士氣；
- (十四) 最普遍的推動友軍友黨進步；
- (十五) 適合敵強我弱條件，使自己也少受損失，多打勝仗；
- (十六) 適合敵小我大的條件，使敵人多受損失，少打勝仗；
- (十七) 最迅速最有效的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
- (十八) 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

在長期奮鬥中，滯擊戰爭不停止於原來的地位，應向高級階段發展，逐漸地變為正規戰場或規戰爭，這也是沒有疑義的。我們將經過游擊戰爭，積蓄力量，把自己在實力上造成爲粉碎日本帝國主義決定因素之一。

六 注意研究軍事問題

一切問題依據戰爭解決，中國的存亡繫於戰爭的勝負，因此研究軍事理論，研究戰略戰術，研究政治工作，不可或緩。戰術的研究雖不足，但十年來從事軍事工作的同志則已有很多成績，已有很多根據中國條件而提出的新東西，缺點在於沒有總結起來。戰略問題與戰爭理論問題的研究，至今還只限於極少數人的工作，並沒有全般的系統化。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績，經驗之豐富，新創設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蘇聯就要算我們了，其中若干特殊的經驗連蘇聯也沒有，但缺點，也在綜合性與系統性之不足。新軍技術、新軍建設與新軍指揮的研究，還沒有開始。爲了全黨與全國的需要，軍事知識的通俗化，成爲迫切任務。所當注意，今後應注意，而戰爭與戰略的理論則是一切的骨幹。從事軍事理論的研究，引起興趣，喚起全黨注意於軍事問題的研究，我認爲是必要的。

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邊區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府批准——

爲着進一步鞏固邊區，發展抗日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以達堅持長期抗戰增進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見，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特於邊區第二屆參議會舉行選舉之際，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總理遺囑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原則，向我邊區二百萬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綱領，如共產黨員當選爲行政人員時，即將照此綱領堅決實施之。

(一) 團結邊區內部各社會階級，各抗日黨派，發揮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智力，爲保衛邊區、保衛西北、保衛中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戰。

(二) 堅持與邊區境外友黨友軍及全體人民的團結，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行爲。

(三) 提高邊區武裝部隊的戰鬥力，保障其物質供給，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後方勤勞的國民黨員，增進軍隊與人民的親密團結。同時加強抗日自衛軍少先隊的組織與訓練，健全其領導系統。

(四) 加強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工作，徹底實施優抗條例，務使八路軍及一切友軍在邊區的家屬得到物質上的保障與精神上的安慰。

(五) 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羣衆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爲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爲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獨行，把持包辦。

(六) 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除司法系統及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其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不得對任何人加以逮捕審問或處罰，而人民則有用無論何種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爲之權利。

(七) 改進司法制度，堅決廢止肉刑，重證據不重口供，對於漢奸分子，除絕對堅決不願改悔者外，不問其過去行爲如何，一律實行寬大政策，爭取或化轉變，給以政治上與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殺害、侮辱、強迫自首或強迫其寫悔過書。對於一切陰謀破壞邊區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處置辦法做此。

(八) 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爲，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爲，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同時實行俸以養廉原則，保障一切公務人員及其家屬

必需的物質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娛樂生活。

(九) 發展農業生產，實行春耕秋收的羣衆動員，解決貧苦農民耕牛農具肥料種子
的困難，今年開荒六十萬畝，增加糧食產量四十萬担，獎勵移民移殖。

(十) 在土地已經分配區域，保證一切取得土地的農民之享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經
分配區域（例如綏德、鄜縣、慶陽）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債主的債權，惟須減
低佃農租額及債務利息，佃農則向地主繳納一定的租額，債務人須向債主繳納一定的利
息，政府對東佃關係與債務關係加以合理的調劑。

(十一) 發展工業生產與商業流通，獎勵私人企業，保護私有財產，歡迎外地投
資，實行自由貿易，反對壟斷統制，同時發展人民的合作事業，扶助手工業的發展。

(十二) 調節勞資關係，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增強勞動生產率，適當的改善工人生
活。

(十三) 實行合理的稅收制度，居民中除極貧者應予免稅外，均須按照資產等項或
所得多寡，實施程度不同的累進稅制，使大多數人民均能負擔抗日經費。同時健全財政
機構，調劑金融關係，維護法幣，鞏固邊幣，以利經濟之發展與財政之充實。

(十四) 繼續推行清減文盲政策，推廣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規學制，普及國民教
育，改善小學教員生活，實施成年補習教育，加強幹部教育，推廣通俗書報，發揚自由
研究，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材，保護流亡學生與

失學青年，允許在學學生以爲自治權利，實施公務人員的兩小時學習制。

(十五) 推廣衛生行政，增進醫藥設備，歡迎醫務人材，以達減輕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時實行救濟外來的災民難民。

(十六) 依據男女平等原則，從政治經濟文化上提高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發揮婦女在經濟上的積極性，保護女工、產婦、兒童，堅持自願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 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對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

(十八) 歡迎海外華僑來邊區求學，參加抗日工作，或興辦實業。

(十九) 應社會遊民分子以耕種土地，取得職業與參加教育的機會，糾正公務人員及各業人民中對遊民分子加以歧視的不良習慣，對會門組織實行爭取團結教育的政策。

(二十) 對於在戰鬥中被俘之敵軍及偽軍官兵，不問其情況如何，一律實行寬大政策，其願參加抗戰者，收容並優待之，不願者釋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殺害、侮辱、強迫自首、或強迫其寫悔過書。其在釋放之後又連續被俘者，不問被俘之次數多少，一律照此辦理。國內如有對八路軍新四軍及任何抗日部隊舉行攻擊者，其處理辦法做此。

(二十一) 在尊重中國主權與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到邊區遊歷、參加抗日工作，或在邊區進行實業文化與宗教的活動。其有因革命行動被外國政府

壓迫而奉邊區者，不同其是宗主國人民或殖民地人民，邊區政府當一律予以懇切的保護。

（此處文字模糊，疑似為書名或章節標題）

（此處為正文內容，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具體字句，僅能依稀看出為多段落的敘述）

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解放日報」社論——

自黨中央提出精兵簡政政策以來，許多抗日根據地的黨，都依照中央指示，籌劃和進行了這項工作。晉冀魯豫邊的領導同志，對這項工作抓得很緊，做出了精兵簡政的模範例子。但是尚有若干根據地則因認識不夠，還沒有認真進行。這些地方的同志們尚不理解精兵簡政與當前形勢及黨的各項政策的關係，尚未把精兵簡政當作極其重要的一項政策看待。關於此事，本報曾迭次論列，今願更有所說明。

黨的一切政策，都是為着戰勝日寇。而第五年以後的抗戰形勢，實處於爭取勝利的最後階段。這個階段，不但比抗戰第一第二年不同，而且比抗戰第三第四年也不同。抗戰的第五第六年，實包含着這樣的性質，即接近着勝利，但又有着極端的困難，也就是所謂黎明前黑暗的性質。這種性質，整個反法西斯各國目前階段上都是具有的，整個中國都是具有的。不獨八路軍新四軍各根據地為然，但尤以我軍各根據地特別表現得突

說。我們要爭取兩年打敗日寇。依整個形勢看，這個要求不是空洞的，是有確實根據的，黨中央的七七宣言上已指出了這些根據。但是這兩年是極端困難的兩年，它與抗戰的開頭兩年及中間兩年都有很大的不同。這種特點，一個革命政黨，一個革命軍隊的領導人員必須事先看到。如果他們不能事先看到，那他們就只會跟着時間遷流，雖然在拼命努力，却不能取得勝利，反有使革命事業受到損害的危險。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困難形勢，截至今天為止，雖然已比過去增加了幾倍的困難，但還不是極端的困難，極端的困難還在後頭。普通的人，容易爲過去及當前的情況所迷惑，以爲今後也不過如此。他們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將要遇到暗礁的地點，不能用清醒的頭腦把握船舵，繞出暗礁。什麼是抗日航船今後的暗礁呢？就是抗戰最後階段中的極端的困難。我們中央指出了這個困難，叫我們提起注意繞出這個暗礁。我們的許多同志已經懂得了，但是尚有若干同志還不懂得，這就是必須首先克服的障礙。抗戰要有一個團結，在團結中有各種的困難，這個困難是政治上的困難，過去有過，今後還可能有，五年以來我黨用了極大力量逐步的克服這個困難，我們的口號是增強團結，今後還要增強它。但是還有一個困難，就是物質上的困難。這個困難，今後必愈來愈厲害。目前還有若干同志處之泰然，不大覺得，我們就有喚起這些同志提起注意之必要。各抗日根據地的全體同志必須認識，今後的物質困難必十倍於目前，我們必須克服這個困難，我們的口號就是精兵簡政。

精兵簡政何以是克服物質困難的重要政策呢？很顯然的，目前的尤其是今後的根據

地抗戰情況，不容許我們停留在過去的觀點上。我們的龐大的抗戰機構，是適應過去情況的，那時的情況容許我們如此，也應該如此。但是現在不同了，根據地已經縮小，今後還可能縮小，我們便決然不能還像過去那樣維持龐大的機構。前戰爭機構與戰爭情況之間已經發生了矛盾，我們必須克服這個矛盾。敵人的方針是擴大我們這個矛盾，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倘若我們還維持龐大機構，那就會正中敵人奸計。如若我們縮小自己的機構，使兵精政簡，我們的戰爭機構雖然小了，但仍是極有力的，而因為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使我們的戰爭機構與戰爭情況互相適合，就愈顯得我們的有力，我們就成為不可被敵人戰勝而要最後地戰勝我們的敵人。所以我們說，黨中央提出的精兵簡政政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但是現狀與習慣往往容易把人們的頭腦束縛得緊緊的，即在革命者有時亦不能免。龐大的機構是由自己親手創造起來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將他縮小，實行縮小時就感到很勉強，很困難。敵人以此龐大機構向我壓迫，難道我們還可以縮小嗎？實行縮小就感到兵少不足應敵。這些都是所謂為現狀與習慣所束縛。氣候變化了，衣服必須隨着變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與冬春之交，各要更換一次衣服。但是人們往往在那「之交」不會適時地變換，要圍出幾毛病來，這就是習慣的力量。目前根據地的情況已經要求我儘量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輕便快捷地同敵人搏鬥，我們却還是一身重服，頭重腳輕，很不適於作戰。若說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有孫行者對

付牛魔王為例。牛魔王不是龐然大物嗎？孫行者却化爲一個小蟲飛進牛魔王的心臟把他擊敗了。柳宗元曾經描寫過「黔之技」，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踏進貴州去，貴州的小老虎怕了他，但是後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咬死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牛魔王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實些，我們就會變成驢子了。

以上是中央提出精兵簡政政策的根本理由，它之所以成爲當前一個極重要政策，必須充分解與實施決實行的根本理由。

關於精兵簡政政策與其他各項政策之間的聯系，以及進行精兵簡政時所要注意的具體事項，當於另文說明之。

中央政治局關於減租生產

擁政愛民及宣傳十大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一) 秋收已到，各根據地須責成各級黨政檢查減租政策實行情形。凡未認真實行減租的，必須於今年一律減租；減而不澈底的，必須於今年澈底減租。黨部應即根據中央土地政策及當地情況發出指示，並親手檢查幾個鄉村，造出模範，推動他處，同時在報上發表社論及減租運動的模範消息。減租是農民的羣衆鬥爭，黨的指示與政府的法令是領導與幫助這個羣衆鬥爭，而不是給羣衆以恩賜。凡不發動羣衆自動積極性的恩賜減租，是不正確的，其結果是不鞏固的。在減租鬥爭中產生農民團體，或改造農民團體。政府應站在執行減租法令及調節各個利益的立場上。現在根據地已縮小，我黨在根據地上細心地認真地澈底地爭取羣衆、和羣衆共生死存亡的任務，較之過去六年有更加迫

的意義。今秋如能檢查減租政策實施程度，並實行徹底減租，就能發揚農民羣衆的積極性，加強明年的對敵鬥爭，推動明年的生產運動。

(二) 敵後各根據地的大多數幹部，還沒有學會推動黨政軍羣衆與人民羣衆（一切公私軍民男女老少，絕無例外）實行大規模的生產運動。黨部、政府及軍隊，必須於今年秋冬準備有闖明年全根據地實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除陝甘寧邊區外，暫不提豐衣足食口號）的大規模生產運動，包括公私農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及商業，而以農業爲主體。實行按家計劃，勞動互助（陝北稱變工隊，過去江西蘇區稱耕田隊或互助社），吳滿有運動（農業勞動英雄），趙占魁運動（工業勞動英雄），黃立德運動（機關學校種菜英雄），獎勵勞動英雄，舉行生產競賽，發展爲羣衆服務的合作社。縣區黨政工作人員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應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後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稅收；對前者用了苦工，對後者便輕而易舉。一切機關學校部隊，必須於戰爭條件下厲行種菜、養豬、打柴、燒炭、手工製造及部分種糧。除各大小單位應一律發展集體生產外，同時獎勵一切個人（軍隊除外）從事小部分農業手工業（禁止做生意）的個人業餘生產，以其收入歸個人所有。各地開辦七天至十天爲期的種菜訓練班、養豬訓練班及爲着改善伙食的大司父訓練班。在一切黨政軍機關中講究節省，反對浪費，禁止貪污。各級黨政軍機關學校一切領導人員均須學會領導羣衆生產的「全套本領」，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一切軍民均應凡不注意生產反而

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一切未脫離生產的農村黨員，無以發展家庭生產為自
 己充實羣衆模範的條件之一。在生產運動中，不注重發展經濟，只片面地注重節省開
 支的保守的單純財政觀點是錯誤的；不注重組織黨政軍羣衆與人民羣衆的廣大勞動力，
 以開風羣衆生產運動，只片面地注意少數政府人員忙於收稅收稅弄假弄真的觀點是錯誤
 的；不知用全力幫助羣衆發展生產，只知向羣衆要錢要款的觀點（國民黨觀點）是錯誤
 的；不注意全面地發動羣衆生產運動，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數經濟機關組織少數人從事生
 產的觀點是錯誤的；以為共產黨員爲着供給家庭生活（農村黨員）及改善自己生活（機
 關學校黨員），以利革命事業，而從事家庭生產及個人業餘生產，爲不光榮不道德的
 觀點，是錯誤的；在有根據地的條件下，不提倡發展生產爲改善物質生活而鬥爭，只片
 面地提倡艱苦奮鬥的觀點是錯誤的；不把各作社看作爲民衆服務的經濟團體，而把合作
 社看作爲少數工作人員賺錢牟利，或看作政府公營商店的觀點是錯誤的；不把吳滿有生
 產方法（勞動互助，多犁多鋤多放糞）推行於各地，而說吳滿有方法不應推行的觀點是
 錯誤的；不在生產運動中實行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相結合，一般
 骨幹與骨幹相結合，調查研究，分別緩急輕重，爭取男女老幼及遊民分子一律參加
 生產，培養幹部，教育羣衆的方針，只知把生產任務推給建設廳長，供給部長，總務處
 長的觀點是錯誤的。而發展生產的中心關節是組織勞動力，每一根據地組織幾萬黨政軍
 的勞動力與幾十萬人民的勞動力（取接家計劃，變工廠、運輸隊、互助社、合作社等類

式，在自願原則下，把一切全勞動力與半勞動力組織起來，以從事生產，即在現時戰爭情況下都是可能的與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勞動力的全部方針與方法。今年的全部一律澈底減租，將是明年大規模發展生產的一個刺激。而明年不論公私黨政軍民男女老幼全體一律實行偉大的生產運動，增加糧食與日用品，準備與災荒作鬥爭，將是繼續堅持抗日根據地的物質基礎，否則便將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

(三)爲了使黨政軍民打成一片，以利於開展明年的對敵鬥爭與生產運動，各根據地黨委及軍政領導機關，應準備於明年陰曆正月普遍地、無例外地舉行一次擁政愛民與擁軍的廣大規模的羣衆運動。軍隊方面，重新宣佈擁政愛民公約，自己開檢討會，召集居民開聯歡會（當地黨政參加），有損害羣衆利益者，實行賠償、道歉。民衆方面，由當地黨政及民衆團體領導，重新宣佈擁軍公約，舉行熱烈的勞軍運動。在擁政愛民與擁軍的運動中，澈底檢查軍隊方面與黨政民方面自己在一九四三年的缺點錯誤，而於一九四四年堅決改正之。以後應於每年正月普遍舉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傳擁政愛民公約與擁軍公約，再三再四地將各根據地曾經發生的軍隊騷擾民衆及黨政民圖心軍隊不足缺點錯誤，實行公開的羣衆性的自我批評（各方面批評自己，而不批評對方），而澈底改正之。

(四)此指示主要地說明今年減租、明年生產及明年舉行擁政愛民運動的重要性。其他各項政策，迭有指示，現不重述。但應知道：我黨在各根據地所實行的各項政策中，

舉其現時最切要的，共有十項。這十項政策就是：第一，對敵鬥爭；第二，精兵簡政；第三，統一領導；第四，擁政愛民；第五，發展生產；第六，鞏固三風；第七，奮發幹部；第八，時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減租減息。這十大政策是互相聯系不可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及地委，須對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總結（不須開很大很長的會議，只就十大政策舉以幾個條談）。同時必須將十大政策聯系一致的思想向黨內作普遍的宣傳，使全黨首先從幹部起，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殘缺不全的（如說某地不須實行擁政愛民及具滿有生產方法等），認真而並不是粗枝大葉的，實行這個聯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達到克服困難迎接光明的目的。但是只要全黨同志認真地實行了十大政策，我們就一定能夠遺棄許多有利條件，達到克服困難迎接光明的目的。我們是有一切把握克服困難的，我們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我們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

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過——

抗戰以來，我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減租減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這一政策，在各根據地實行以後，曾經獲得了廣大羣衆的擁護，團結了各階層的人員，支持了敵後的抗戰。凡在比較普遍、比較認真、比較澈底的實行了減租減息，同時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當地羣衆參加抗日鬥爭與民主建設的積極性就比較高，而且能夠保持工作的經常狀態，安定社會的生活秩序，那裏的根據地就比較鞏固。但是這一政策，在許多根據地內還沒有普遍的、認真的、澈底的實行。在有些根據地內，還只在一部分地方實行了減租減息，而在另一部分地方，或則還只把減租減息當作一種宣傳口號，既未發佈法令，更未動手實行，或則雖已由政府發佈了法令，形式上減租減息，實際並未認真去做，發生了明減暗不減的現象。在這些地方，羣衆的積極性不能發揚，也就不能真正將羣衆組織起來，造成熱烈

抗日的基礎。在這些地方，抗日根據地就無法鞏固，經不起敵人的「掃蕩」，變成軟弱無力的地區。但是在另外若干地方，則又犯了某些左的錯誤，雖然這種錯誤只發生在一部分地方，並且經過中央指示後已經天體上糾正了，但是還有引起各地同志加以注意之必要。當此抗戰進入更加艱苦的時期，要求各根據地更加發動廣大羣衆的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更加團結一切抗日階層來堅持敵後的長期鬥爭。中央在詳細研究各地經驗之後，特將我黨土地政策作一總結的決定。另有關於執行土地政策的具體辦法，作為附件，隨此決定一併發下，以供各地採用。務望各地同志加以研究，認真執行。

(一) 承認農民（僱農包括在內）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故黨的政策是扶助農民，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實行減租減息，保證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藉以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抗日的與生產的積極性。

(二) 承認地主的大多數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開明紳士並是贊成民主改革的。故黨的政策儘是扶助農羣減輕封建剝削，而不是消滅封建剝削，更不是打擊贊成民主改革的開明紳士。故於實行減租減息之後，又須實行交租交息，於保障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之後，又須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藉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只是對於絕對堅決不願改悔的漢奸分子，才採取消滅其封建剝削的政策。

(三) 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而資產階級、特別是最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社會成分與政治力量。富農的生

產方式是種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是農村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農階級、雇農階級與富農，不但有共同的要求，而且有其主要部分。故黨的政策，不但是削奪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不是剝奪富農階級與富農生產，而是在適當的改善工人生活條件之下，同時剝奪資本主義生產與資產階級，鼓勵富農生產與聯合富農。但富農有其一部分封建性剝削的剝削，為中農貧農所不滿，故在農村中實行減租減息時，對富農的租息必須照減。在對富農減租減息後，同時須實行交租交息，並保障富農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一部分用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土地的地主（所謂經營地主），其待遇與富農同。

(四) 上述三條基本原則，是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土地政策的出發點。四年以來的經驗證明，只有堅持這些原則，才能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正確的處理土地問題，才能聯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戰，而使日寇完全陷於孤立。一切過左過右的偏向，都是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的。

(五) 在農村統一戰線中，地主與農民間的矛盾，例如地租反對或妨礙農民關於民主民生諸要求等，必須按照上述原則作適當的處理。雙方合理的合理要求必須滿足，但雙方都應服從於整個民族抗戰的利益。在處理農村糾紛中，黨與政府的工作人員，不是站在農民或地主的某一方面，而是根據上述基本原則，採取調節雙方利益的方針。

(六) 三三制政權，就是調節各抗日階級內部關係的合理的政治形式。這一制度，

必須在參議會系統中與政府系統中堅決的、認真的、普遍的實行。認為這一制度不過是一種敷衍黨外人士的辦法的那種觀點，是不正確的。

(七) 政府法令應有兩方面的規定，不應畸輕畸重。一方面，要規定地主應該普遍的減租減息，不得抗不實行。另一方面，又要規定農民有交租交息的義務，不得抗不繳納。一方面要規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與財產所有權仍屬於地主，地主依法有對自己土地出賣、出典、抵押及作其他處置之權。另一方面，又要規定當地主作這些處置之時，必須顧及農民的生活。一切有關土地及債務的契約的締結，須使雙方自願，契約期滿，任何一方有解約之自由。

(八) 抗日經費，除赤貧者外，一切階級的人民均須按照累進的原則向政府交納，不得畸輕畸重，不得抗拒不交。

(九) 減租減息實行之後，給予了提高農業生產的必要的前提，而農業生產是抗日根據地的主要的生產，肅清政府的工作人員必須用最大力量推動發展之。政府應舉行大量的農業貸款，以解決農民借貸的困難。

(十) 農救會的任務，在減租減息之前，主要的是協助政府實行減租減息的法令。在減租減息之後，主要的是協助政府調解農村糾紛與發展農業生產，而不是以自己的決定代替政府的法令，不是以農救會代替政府。在調解農村糾紛的任務上，應取仲裁的方式，而不是專斷的方式。在發展農業生產的任務上，應動員所有農救會員起模範的領導

的作用。

(十一) 既然減租減息與保障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是我黨土地政策的第
一個方面，既然各根據地內尚有許多地方並未普遍的、認真的、徹底的執行減租減息，
而其原因，不是地主抗不實行，就是黨與政府的工作人員採取漠不關心與官僚主義的態
度。因此，各根據地內黨與政府的工作人員，必須對自己工作加以嚴格的檢查，派員下
鄉分途巡視各地實行的程度，加以周密的調查研究，全般的總結各地經驗，發揚正確實
行的例子，批評官僚主義的例子，須知發佈口號、發佈法令與實行口號、實行法令之
間，是常常存在着很大的距離的。如不嚴密官僚主義、反對右傾觀點，就無法使口號法
令見之實行。

(十二) 既然我租交與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是我黨土地政策的
第二個方面，既然各根據地內曾經發生過忽視這一方面的主觀錯誤，而其原因，不是
農民不了解我黨的土地政策，就是黨與政府的工作人員也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我黨的政
策。爲着防止今後重複這種錯誤，就必須在黨內、在農民羣衆中明確的解釋黨的政策，
使他們明白現在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土地政策，是與內戰時期的土地政策有根本
區別的，使他們不限制於眼前的狹隘的利益，而應把眼前利益與將來利益聯系起來，把
局部利益與全民族利益聯系起來，必須勸告農民在實行減租減息與保障農民的人權、
政權、地權、財權之後，同時實行交租交息與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正

如在減租減息與保障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的問題上，必須警告地主不應該限制於眼前的狹隘的利益，而要顧及將來與民族的利益，是一樣的。

附 件

由於各根據地情況不同及在一般環境內情況亦有不同者，故關於解決土地問題的具體辦法，不能統一施行。中央在關於土地政策決定內規定了統一施行的原則，而在本附件內則根據此種原則提出具體辦法，以供各地採用。本附件內所列各項，凡與各地實際情況相合者，均應堅決執行之。其有不合情況者，應予變通辦理者，各地得加以變通，惟須將變通之點報告中央，並取得中央之批准。

(一) 關於地租及佃權問題

(一) 一切尚未實行減租的地區，其租額以減低原租額百分之二十五(二五減租)為原則，即照抗戰前租額減低百分之二十五(抗戰前租額)者，佃權地、夥種地，也不論地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適用之。各種不同形式的夥種地，不宜一律規

定爲地主所得不超過十分之四，或十分之六，應依業佃雙方所出勞動力、牛力、農具、肥料、種子及食糧之多寡，按原產額比例，減低百分之二十五。在游擊區及敵佔點線附近，可比二五減租還少一點。只減二成、一成五或一成，以能相當發動農民抗日的積極性及團結各階層抗戰爲目標。

(二) 地租一律於產物收穫後交納，出租人不得向承租人預收地租。並不得索取額外報酬。

(三) 定租(減租)，因天災人禍，其收成之全部或大部被毀時，得停付或減付地租。

(四) 多年欠租，應予免交。

(五) 公糧公款，按累進原則，由業佃雙方負擔。土地稅，由土地所有者負擔之。

(六) 地租原約定以貨幣支付者，因紙幣跌價而發生爭議時，政府應召集業佃雙方協議調解，並得將貨幣地租之一部或全部，改爲實物地租。

(七) 如設有調租委員會等調解機關的地方，須有農民、地主、政府三方代表參加，但政府有最後決定權。

(八) 在租佃契約上及習慣上有永佃權者，應保留之。無永佃權者，不應強迫規定。但可獎勵雙方訂立較長期的契約，例如五年以上，俾農民得安心發展生產。

(九) 無永佃權之地及契約期滿之地，出租人有依約處置之自由，包括轉讓、出

典、出賣、自耕，及僱人耕種等項在內。但在抗戰期間，地主收地，應顧及農民生活，並須於收種前三個月通知承佃人。原承佃人太窮苦者，應由政府召請雙方加以調劑，或延長佃期，或只退佃一部。

(十) 出租人於契約期滿，招人承佃或出典、出賣時，原承租人依同等條件有承佃、承典、承買之優先權。

(十一) 出租人出賣有永佃權或契約期限未滿之地，原承租人有繼續佃耕之權，非原約期滿，新主不得另佃他人。

(十二) 承租人在二年內無故不耕，或力能耕種而故意不侍者，出租人有收回土地之權。

(二) 關於債務問題

(一) 減息是對於抗戰前成立的借貸關係，為適應債務人的要求，並為團結債權人一致抗日起見，而實行的一個必要政策，應以一分半為計息標準。如付息超過原本一倍者，停利還本，超過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至於抗戰後利息額，應以當地社會經濟關係，聽任民間自行處理，政府不應規定過低息額，致使借貸停滯，不利民生。

(二) 債權人不得因減息而解除借貸契約，債務人亦不得在減息後拒不交息，債權

人有依法訴追債務之權。

(三) 凡抗戰後新成立的借貸關係，債務人到期不能付息還本，債權人有依約處理抵押品之權。如有爭議，由政府判處。同一抵押品而担保數債權者，其賣得之價格，按各債權契約先後，依次並比例清償之。抵押品如爲土地（押地），照此辦理。

(四) 凡典地尙未轉成買賣關係者，出典人隨時可用原典價依約贖回土地，不得用抽地換約的辦法。如已轉成買賣關係者，不得贖回。因紙幣跌價而在贖回典地時所生之爭議，由政府調處之。

(五) 凡抗戰後成立的借貸關係，因天災人禍及其他不可抗之原因，債務人無力履行償約時，得請求政府調處，酌量減息，或免息還本。

(六) 因紙幣跌價，債務人用紙幣還債而生之爭議，由政府適當調處之。

(三) 關於若干特殊土地的處理問題

(一) 凡罪大惡極之漢奸的土地，應予沒收，歸政府管理，租給農民耕種，以示懲罰。其家屬如未參加此種漢奸活動，或其情節較輕者，不在此例。

(二) 被迫漢奸的土地不應沒收，以示寬大，爭取其悔過自新。無人管理者，由政府代管，租給農民耕種，俟其回家抗日，即發還之。

(三) 凡逃亡地主，不論其逃至何處，其土地不得沒收。無人管理者，由政府代管，招人耕種，並保存其應得地租，代交田賦公糧。原主回家時，將其土地及應得地租一並發還之。

(四) 凡沒有稅過契或沒有納過稅的黑地，不許沒收，而限期責令業主稅契納糧。如逾期仍不稅契不納糧時，由政府給予相當的處理。

(五) 族地、社地，由本族本社人員組織管理委員會管理之，以其收入作為本族本社或本地公益事業之用。

(六) 學地留作教育經費，由政府或本地人員組織教育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之。

(七) 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變動。

(八) 公荒，由政府分配給抗屬、難民、貧農開墾，並歸其所有。在一定期限內，免除或減少其稅收。

(九) 私荒，不論生荒熟荒，應先儘業主開墾。如業主無力開墾任其荒蕪時，政府得招人開墾，並在一定期限內，免除或減少其租稅。土地所有權仍屬於原主，但開墾者有永佃權。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德華週報及中央副刊上發表——

一 農村革命

農民問題的嚴重

我這回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計二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及農運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頗為不少。許多農運的道理，與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全中國無論何省都有；所以，各種反對農運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的矯正；革命當局各種對農運的錯誤處置，必須迅速的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運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北部各奮起來，其勢如暴風

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的命運將強迫你迅速的選擇罷了。茲將我的考察和我的意見，逐段寫出，作為革命同志的參考。

組織起來

湖南農運，就湘中、湘南已發達各縣來說，大約分爲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爲第一時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爲秘密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趙爲公開時期。此時期農會會員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指揮的羣衆也不過百餘萬，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鬥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因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探，作挑夫，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爲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指揮的羣衆增加到一千萬（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上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羣衆便計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到了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指揮之下。農民既已

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有了組織，便行動起來。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爲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思想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他們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紳士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人在會場裏放個屁也是靈的。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停止了他們的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裏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噫！誰要你的臭錢！」農民的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了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的名字上進那農會的冊子去才放心。農會往往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的過日子，掛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總要話叫做「打零」卜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佛在紳士下的人，現在都拜佛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與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糟得很與好得很

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噩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就立刻跟着大譁。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大體，受了那班滿嘴風雨的「糟得很」派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情狀，也居然發酸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遲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頭所說，乃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完成他們歷史的使命，乃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這個打翻封建勢力，乃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民國十年，所要做而

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都做到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乃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腳。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來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佔七分。「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讓這種話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羣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應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運動，革命沒有這個基礎，難以失敗了；現在有了一個變動，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原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是反革命。

「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會在鄉裏頭有一點「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壓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出「有土必豪」

「劣紳」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也叫他劣紳。「把你們這些土豪劣紳開款捐款，打轎子。若是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裏，一舉人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去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爲所欲爲，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般人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件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壓迫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暴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是該打誰個稍次，誰個該辦要緊，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輕少。所以唐孟藩先生也說：「農民在鄉下捉土豪劣紳，十個有九個是對的。」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農民羣衆，形成這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農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大

權力，必須不准其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期都有革命的意義。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間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一派的議論，表面與前一派不同，但實質與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的反對。

革命先鋒

……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乃痞子運動，乃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與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運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的人，最沒有立足地位，完全發了瘋言癡語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

在那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那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頭上了。他們用繩子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着遊鄉（游潭、游鄉叫遊團，醜狀叫遊壇）。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鋒或革命元帥

一件事或一種說，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與「好得很」是一例，「痞子」與「革命先鋒」又是一例。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中國革命的主要工作，但這種革命大業，革命主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各不同，對於革命觀念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有錢餘，有穀剩的，叫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江西「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坐飛機回廣東了，吳佩孚重新佔了岳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與不趁，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那農民協會辦事人（多屬「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牌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的回答：「農民協會麼？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看見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什麼農民協

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說。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神士（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難以扁担鋤頭，浩浩蕩蕩的出隊示威，富農心裏才開始惶惑起來。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都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脚，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的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面。

「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麼？」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

「把你們入另冊！」

「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

在這樣的形勢與威嚇之下，富農才慢慢的進了農會，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託人說情才進了農會允許的。亦有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中農呢？（沒有餘錢剩米，也不欠賬，每年保得衣食住的，叫中農），中農的態度是游蕩的，他們想到革命與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

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着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能立得起來麼？」「三民主義果能興得起來麼？」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願不願呀？」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着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莫性急噫！」中農這樣回答。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雖比富農略好，但始終不能積極，仍然保存他們那種游移的態度。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只有一種人，就是貧農。從秘密時期起，一直到公開時期，都是他們在那裏奮鬥，組織也是他們在那裏組織，革命也是他們在那裏革命。只有他們與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的向土豪劣紳營壘打擊，一切破壞的工作都只有他們做得出。他們對着富農中農說：

「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爲什麼還遲疑？」

富農或中農帶着譏笑的聲調說道：

「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

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是農村中生活落伍或半落伍的，他們中間之一些，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富農佔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本，完全失去生活根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做工，或打流當乞丐，或爲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佔七十分之二十。半

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佔七十分之五十。（貧農數目，他縣或沒有長沙這多，但相差當不大遠）。這個貧農大羣衆，乃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特別是赤貧部分），因爲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協（即鄉協）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協職員，赤貧階級佔百分之五十，次貧階級佔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分子佔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過分」舉動，實在是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與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干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無意中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只要看拘捕了農協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痞子運動」、「憤農運動」的反革命口號，同時尤其要注意不做些幫助土豪劣紳（雖然是無意的）打擊貧農領袖的階級。事實上，貧農領袖

中，從前雖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但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匪患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嚴衛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他「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的罵「痞子」。對於這些「少數不良分子」，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他們的羣衆宣傳，對他們本人訓練，去把農會的紀律弄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失貧農階級的信仰，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論合作社

毛澤東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邊區高幹會講話)

今年邊區在發展生產上，又來了一個革命，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勞動力組織起來，發動了羣衆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大大發展了生產。

在過去，東縛邊區生產力使之不能發展的，是邊區的封建剝削關係，一半地區經過土地革命，把這種封建束縛打破了，一半地區經過減租減息之後，封建束縛減弱了，這樣合起來，整個邊區就破壞了封建剝削關係的一大半，這是第一個革命。

但是，如果不從個體勞動轉移到集體勞動的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建設在以個體經濟爲基礎不破壞個體的私有財產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這樣，生產力才可以大大提高。現在蘇甘寧邊區的經驗：一般的變工札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範的變工札工勞動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體農民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

互助勞動之中，那末，現有的全邊區的生產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這辦法，可以行之於各抗日根據地，將來可以行之於全國，這在中國經濟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生產的成果也不是歸公而是歸私的，但人與人的生產關係變化了，這就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這是第二個革命。

全邊區現有全勞動力三十五萬個，今年經常組織在集體勞動中的變工隊札工隊的已有三萬餘人，佔全勞動力總數十分之一，而臨時性的勞動互助，就延安縣說，有百分之七十，明年還可發展。如果各縣經常的集體勞動組織能由十分之一提高到百分之二三，可達十萬人左右，再加上臨時性的勞動互助組織能向延安看齊，還有半勞動力也參加組織，這將是一支很大的勞動軍。

我們的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也帶着合作社的性質。比如一個連，就是一個小合作社，一個旅就是一個大合作社。在各種部隊機關學校合作生產之中，楊家嶺運輸隊的經驗，是值得注意的。楊家嶺運輸隊在改組前，有大車八輛，馱騾十六頭，照普通情形，每月最低限度應運輸物品二十七萬斤，但實際運輸的只有十九萬斤。經費開支，則除照一般的供給標準外，每月還要貼六萬元。今年在公私兩利的原則下，把運輸隊改為運輸合作社，公家以大車八輛馱騾十六頭（後增為二十頭）及全部用具作爲八十股，運輸員二十名以身份股名義作爲二十股，共一百股，每月按股數二八分紅；一切人員、牲口、添置等費用開支，概由合作社自行解決；替公家運輸物品依照里程遠近

按斤給運費；運輸員的生活，由運輸合作社適當改善。這辦法，經過解釋後，全體運輸員一致贊成。執行結果，運輸量由每個月十九萬斤，增為三十八萬九千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超過了普通的運輸力百分之三十。同時，大大提高了運輸員對工作的責任心和積極性，節省了許多經費和工具，又更加愛護牲口。比方，過去裝粉的口袋破了碗大的洞無人管，現在運輸員隨身帶着針線，縫補口袋；過去貪污馬料是公開秘密，現在却沒有這種貪污了；過去車馬用具稍一損壞，就要求公家補充新的，現在只要能廢合着用，就對付着用下去；對牲口，過去是粗心大意的，現在也逐漸喂好了；運費開支，改組後比以前減少三分之一，過去除照供給標準外，每月還要貼六萬元，現在不用半文津貼，還每月獲利數萬元。

各機關採用這辦法後，也得到很大的效果。管理局運輸營一百頭牲口，二十輛大車，在未組織合作社之前，每月運輸量只有二百二十萬斤，改組為合作社後，每月運輸量提高到一百八十五萬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請大家考慮這種合作辦法，是否可以廣泛運用於我們的公營工廠及公營農場。

這一套辦法，資本主義國家及國民黨是不能做的，只有我們才能做。因為我們不以剝削人民為目的，我們貫徹公私兼顧的方針。

軍隊中如三五九旅戰士的紡毛線，用柳榆樹條編成各種用具，規定：凡動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勞動，以其結果五分之四歸公，五分之一歸私；凡不動用公家工具的，則

以三分之二歸公，三分之一歸私。這種辦法，一方面解決了公用品的需要，同時無異增加了戰士的津貼，也含有合作社因素。

合作社性質，就是爲羣衆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羣衆，爲羣衆打算，把羣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想問題從羣衆出發而又以羣衆爲歸宿，那就什麼都能好辦。因此，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隊的負責同志要替戰士着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太廟房着想，替雜務人員着想。這種羣衆觀點的生產學說，打發了過去各種不正確的「學說」，也只有這種爲羣衆的學說，才能把生產搞得好。

我國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產。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是一種合作社，農村的集體互助勞動又是一種合作社，此外還有包含各種業務在內的綜合性合作社，被稱爲運輸隊的運輸合作社，工人們集體互助的手工業合作社，把這許多樣式的合作社都發展起來，全體公私羣衆就會變爲富裕的了。在敵後各根據地的目前困難狀況，也就能夠克服了。

組織起來

毛澤東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招待

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會上的講話

今天共產黨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從農民羣衆中、工廠中、部隊中、機關學校中選舉出來的男女勞動英雄，以及在生產中的模範工作者，我代表中央來講幾句話。我想講的意思，拿幾個字來概括，就是「組織起來」。邊區的農民羣衆和部隊、機關、學校、工廠中的羣衆，根據去年冬天西北局所召集的高幹會的決議，今年進行了一年的生產運動，這一年的生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爲之一新。已經完全證明：高幹會的方針是正確的。高幹會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羣衆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支勞動大軍。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

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羣衆工作一項本領，那末，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打垮。如果邊區去年的成績還不夠大，還不夠顯著，還不足以完全證明這一點，那末今年的成績，就完全證明了這一點，這是大家親眼看見了的。

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每個戰士做到平均種地十八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每個戰士，一年中只需花三個月工夫從事生產，其餘九個月時間均可從事訓練及作戰。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一個創造，對於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呵！抗戰六年半中，敵人在各抗日根據地上實行燒殺搶的三光政策，陝甘寧邊區則遭受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財政上經濟上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我們的軍隊如果只會打仗，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現在我們邊區的軍隊已經學會了生產，前方的軍隊，一部分也學會了，其他正在開始學習，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奮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做羣衆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邁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佔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產解決的佔了絕大部分，去年還只自給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給了百分之一百；喂豬養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墾了許

多作坊解決日用品。部隊機關學校既然自己解決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質問題，用稅收方法從老百姓手中取給的部分就減少了，老百姓生產結果，歸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軍民兩方大家都發展生產，大家都做到豐衣足食，大家都歡喜。還有我們的工廠，發展了生產，消除了特務，生產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個邊區，產生了塞滿有一型的農業勞動英雄，趙占魁一型的工業勞動英雄，黃立德一型的機關學校勞動英雄，還有軍隊中出了許多勞動英雄，邊區的生產，可以說是走上了軌道。凡此，都是實行把羣衆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

把羣衆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還有什麼與此相反的方針沒有呢？有的，那就是沒有羣衆觀點，缺乏羣衆觀點，不依靠羣衆，不組織羣衆，不注意把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工廠的廣大羣衆組織起來，而只注意組織財政機關、供給機關、貿易機關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經濟工作看作是一個廣大的運動，一個廣大的戰綫，而只看作是一個用以補救財政不足的臨時手段。這就是另外一種方針，這就是錯誤的方針。陝甘寧邊區過去是存在過這種方針的，經過歷年的指正，特別是經過去年的高幹會和今年的羣衆運動，大概現在還作這樣錯誤想法的人是少了。華北華中各個根據地，因為戰爭緊張，也因為領導機關注意不夠，對於羣衆的生產運動還沒有廣大的開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一月一號的指示以後，各個地方也都在準備發動明年的生產運動了。前方的條件，比陝甘寧邊區更困難，不但有嚴重的戰爭，有些地方還有嚴重的災荒，但

是爲了支持戰爭，爲了對付敵人的三光政策，爲了救濟災荒，就不能不動員全體爲政軍民，一面打擊敵人，一面實行生產。前方的生產，過去幾年已經有了一些經驗，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物質準備，明年可能造成廣大的運動，並且必須造成廣大的運動。前方處於戰爭環境，這不能說到『豐衣足食』，但是『自己動手，克服困難』，則是完全可以做到，並且必須做到的。

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羣衆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們部隊機關學校的羣衆生產，雖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羣衆的這種在集中領導下用互相幫助共同勞動的方法來解決各部門各單位各個人物質需要的生產活動，是帶有合作社性質的。這是一種合作社。

在農民羣衆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這不是蘇聯式的被稱爲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這又有幾種樣式。一種是『變工隊』、『扎工隊』、『唐將班子』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從前江西蘇區叫『勞動互助社』，又叫耕田隊，現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無論叫什麼名稱，無論每一

單位的人數是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幾百個人的，又無論單是由全勞動力組成的，或有半勞動力參加的，又無論實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農忙時竟至集體吃飯住宿，也無論是臨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之，只要是羣衆自願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就是好的。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羣衆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羣衆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陝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高幹會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實行，就大爲條理化和普遍化。今年邊區有許多變工隊，實行集體的耕種、鋤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簡直是百分之二百，羣衆看見了這樣大的實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實行這個辦法。我們現在不希望在今年一年就把全邊區的幾十萬個全勞動力與半勞動力都組織到合作社裏去，但是在幾年之內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婦女羣衆也要全部動員參加一定分量的生產。所有二流子都要得到改造，參加生產，變成好人。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上，都應該廣泛組織這種集體互助的生產合作社。

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輸）、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運輸合作社（運輸隊）以及手工業合作社。

我們有了人民羣衆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全部羣衆的力量組織成爲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羣衆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

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羣衆的勞動。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也必須學會，只要有決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學好的，他們可以幫助羣衆組織生產，幫助羣衆總結經驗。以前，我們的許多同志也有孔夫子的缺點，孔夫子的學生問到如何種莊稼如何種蔬菜的事情時，孔夫子就答不上來，我們的同志也答不上來。但是我們的同志現在是學會了，他們答得上來了，他們就比孔夫子高明了。我們的同志學會了組織羣衆的勞動，學會了幫助農民做安家生產計劃，組織變工隊，組織運鹽隊，組織綜合性合作社，組織軍隊的生產，組織機關學校的生產，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羣衆的創造力與積極性，加上旁的各項本領，我們就一定可以把日本人打出去，一定可以協同全國人民，把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

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羣衆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裏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於中國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羣衆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羣衆鬥爭的大世面。『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羣衆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裏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羣衆中間去，向羣衆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爲更好的有條理的

道理與辦法，然後再告訴羣衆（宣傳），並號召羣衆實行起來，解決羣衆的問題，使羣衆得到解放與幸福。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羣衆，不了解羣衆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羣衆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羣衆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後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只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麼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地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乾淨。我覺得，在無論那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分缺乏羣衆觀點因而脫離羣衆的工作同志，因此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羣衆親密地結合起來。此外，在我們的軍隊工作中，則存在有『種軍閥主義作風』，這也是一種國民黨作風，因為國民黨軍隊是脫離羣衆的。我們的軍隊必須在軍民關係上、軍政關係上、軍黨關係上、官兵關係上、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關係上、幹部相互關係上，實行正確的原則，決不可犯軍閥主義的毛病。官長必須愛護士兵，不能漠不關心，不能採取肉刑。軍隊必須愛護人民，不能損害人民利益。軍隊必須尊重政府，尊重黨，不能鬧獨立性。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歷來是好的，現在也是好的，是全國軍隊中一支最好最純的軍隊。但是近年確實生長了一種軍閥主義的毛病，一部分軍隊工作的同志

成了一種驕氣，對士兵，對人民，對政府，對黨，橫蠻不講理，只責備地方，不責備自己，只看見成績，不看見缺點，只愛聽恭維話，不受聽批評話。例如陝甘寧邊區，就有這種現象。經過去年的高幹會與軍政幹部會，又經過今年正月的擁政愛民運動與擁軍運動，這個傾向是克服下去了，還有一些殘餘，也可以繼續去克服，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上，這種毛病都是有的，那裏的黨與軍隊必須注意克服這種毛病。無論在地方工作中，在軍隊工作中，無論是官僚主義傾向與軍閥主義傾向，其毛病的性質都是一樣，就是脫離羣衆。我們的同志，絕對大多數都是好同志。對於犯了毛病的入，一經展開批評，揭發錯誤，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須開展自我批評，正視錯誤傾向，認真實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評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不批評軍閥主義傾向，那就是願意保存國民黨作風，願意保存官僚主義灰塵與軍閥主義灰塵在自己純潔的臉上，那就不是一個好黨員。如果我們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去掉軍閥主義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會順利地開展，對於發展生產運動也是這樣。

我們邊區的生產，無論在農民羣衆方面、機關學校方面、軍隊方面、工廠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在軍民關係上也有了很大進步，邊區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同志對於羣衆觀點已經加深，對於結合羣衆大進一步的表現。但是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的生產也真

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青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管我們在地方的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勢力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刻刻批評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進了清潔，鑽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各位勞動英雄和模範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是很有成績的，我希望你們也不要自滿。我希望你們回到機關中去，回到離東去十箇到三邊去，回到綏德去，回到延屬各縣去，回到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去，領導人民，領導羣衆，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把羣衆都組織到合作社裏來，組織得更多，更好。列寧說，我們無產階級沒有旁的力量，唯一的力量就是組織。從前有個歌詞，說是「和氣，和氣，團結得緊」，完全正確，只要我們善於組織，只要我們團體結得緊，我們是什麼都不怕的，什麼人也不能奈何我們，也不敢欺負我們的。希望你們回去實行這一條，宣傳這一條，明年再開勞動英雄大會的時候，我們能夠得到更大的成績。

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毛澤東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在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大會上講演——

各位勞動英雄、各位模範工作者！

你們開了十幾天大會，總結了很多的與很好的經驗，大家歡迎你們，尊敬你們。你們有三種長處，起了三種作用。第一個，帶頭作用。這就是因為你們特別努力，有許多創造，你們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範，提高了工作標準，引起了大家學習你們，你們是生產運動和各項建設工作的帶頭人。第二個，骨幹作用。你們的大多數現在還不是幹部，但是你們已經是羣衆中的骨幹，羣衆中的核心，有了你們，工作就更好推動了。到了將來，你們可能成爲幹部，你們現在是幹部的後備軍。第三個，橋樑作用。你們是上面領導人員與下面廣大羣衆之間的橋樑，羣衆的意見經過你們傳到上面來，上面的意見經過你們傳下去。

你們有許多好處，有很大功勞，但是你們切記不可驕傲。你們被大家尊敬，是應當

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驕傲。如果你們驕傲起來，不虛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幹部，不尊重羣衆，你們就會當不成英雄與模範了。過去已有一些這樣的人，希望你們不要學他們。

你們的經驗，這次大會做了很好的總結。這個總結文件說得很好，不但這裏適用，各地也可以適用，我就不講這些了。我想講一點我們的經濟工作。

近幾年中，我們開始學會了經濟工作，我們在經濟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績。但這還只是開始。我們必須在兩三年內，使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解放區，做到糧食及工業品全部或大部自給，並有盈餘，使農業、工業、貿易三方面都比現在有更大成績。到了那時，才算學得更多，學得更好。如果那一個地方的軍民生活沒有改善，爲着反攻而準備的物質基礎還不穩固，農業、工業、貿易不是一年一年上漲，而是停滯不進，甚至下降，便證明那個地方的軍政黨工作人員還是沒有學會經濟工作，那個地方就會要遇到絕大的困難。

有一個問題必須再一次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我們的思想要適合於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是農村，這一點好像並沒有什麼問題，誰不知道我們是處在農村中呢？其實不然。我們有很多同志，雖然天天處在農村中，甚至自以爲了解農村，但是他們並沒有了解農村，其中有些人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們不從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擊戰爭的（在前方）農村環境這一點出發，他們

就在處理政治問題上，在處理軍事問題上，在處理經濟問題上，在處理文化問題上，在處理黨務問題上，在處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問題上，常常不適當，或不大適當。他們帶着城市觀點去處理農村，主觀地作出許多不適當的計劃，強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幾年來，由於整風，由於在工作中碰了釘子，使得我們的同志有了很多進步。但是還須注意，還須使我們的思想完全適合於我們所處的環境，然後才能使我們的工作樣樣見效，並迅速見效。如果我們真正了解了我們所處的環境，然後才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擊戰爭的農村，如果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看來收效很慢，並不轟轟烈烈，但是在實際上，比較那種不從這一點出發，而從別一點出發，例如說，從城市觀點出發，其工作效果會怎麼樣呢？那就決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為，如果我們從後一點出發，脫離今天的現實，做起來不是效率快慢的問題，而是老碰釘子，根本沒有效果的問題。

即如我們提倡採取現有樣式的軍民生產運動，發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

如果我們要從農村根據地上打退強大的日本侵略者，並且要準備攻入城市，收復一切失地，這就不是短期的事情，需要準備長期戰爭。抗戰已有八年了，農村的財富，被敵人摧殘，我方消耗，都是很大的。但是我們還要堅持戰爭，並且還要積蓄力量準備反攻，然後才能把日本人打出去。在這種堅持戰爭與準備反攻的工作中，除了軍事、政

治、文化等項以外，物質力量的準備，就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了。沒有這個條件，現在的堅持與將來的反攻，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們是處在個體經濟的被分割的游擊戰爭的農村環境中，怎樣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呢？我們不體學國民黨那樣，自己不動手專靠同盟國出力，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外國人幫助。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賴全體軍民的創造力。那末，有些什麼辦法呢？我們就用單民種方向時發動大規模生產運動這一種辦法。

由於是農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們的生產和供給就採取「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

由於是農村，農民都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使用着落後的生產工具，受着封建的地租剝削。爲了提高生產興趣與生產力，我們就採取減租減息與組織互助兩個方針。減租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興趣，互助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力。我已得了華北華中各地的材料，這些材料都說：減租之後，農民興趣大增，願意組織如同我們這裏的變工隊一樣的互助團體，三個人管成了四個人，如果是這樣，九千萬人就會成了一萬萬二千萬人。還有兩個人當成三個人的。如果不採取「強迫命令，欲速不達」的方針，而採取「耐心說服，典型示範」的方針，那末，幾年之內，就可能使大多數或全體農民都組織在農業生產的與手工業生產的互助團體裏面。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爲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

邊都出來了，政治也會提高，文化也會進步，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不要很久，生產工具也會改良，到了那時，我們的農村社會，就會建立在新的生產力上面了。

如果我們的工作人員用心地研究這項工作，用極大精力幫助農村人民展開生產運動，幾年之內，農村就會有豐富的糧食及日用品，不但可以堅持戰爭，不但可以對付荒年，而且可以貯備大批糧食及日用品，以爲反攻敵人之用。

不但要組織農民生產，而且要組織部隊機關一齊生產。

由於是農村，由於是被敵人經常摧殘的農村，由於是長期戰爭的農村，部隊機關就必須生產。由於是分散的游擊戰爭，部隊機關也可能生產。在我們陝甘寧邊區，則更由於部隊機關的人數和邊區人口比較，所佔比例數太大，如果不自己生產，則勢將餓飯。如果取之於民太多，則人民負擔不起，人民也勢將餓飯。因此，我們決定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拿我們邊區說，部隊機關每年需細糧（米）二十六萬担（每担三百斤），取之於民的佔十六萬担，自己生產的佔十萬担，如果不自己生產，則軍民兩方，勢必有要餓飯。由於展開了生產運動，現在我們不但不餓飯，而且軍民兩方都吃得很好。

我們邊區的機關，除糧食被服兩項之外，其他用費，大部自給，有些單位則全部自給。另有許多單位，並且自給一部分糧食，一部分被服。

邊區部隊的功勞更大。許多部隊，糧食被服及其他一切，全部自給，即自給百分之

一百，不顧政府一點東西。這是最高的標準，這是第一個標準，是從幾年之內逐漸達到的。

前方要作戰，不能採取這個標準。前方可以設立第二、第三兩個標準。第二個標準，是除糧食、被服兩項由政府供給之外，其他如油（每日五錢）、鹽（五錢）、菜（一斤至一斤半）、肉（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費、辦公費、雜支費、教育費、保健費、醫療費、早煙、鞋子、襪子、手套、手巾、牙刷等，一概生產自給，約佔全部用費百分之五十，可在兩年至三年內逐漸做到，現在已有做到了的。這個標準，在鞏固區內可以實行。

第三個標準，是在邊沿區及游擊區內實行的，他們不可能自給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給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夠這樣，也就很好。

總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隊、機關，於戰鬥、訓練與工作的間隙，一律參加生產。部隊及機關，除利用戰鬥、訓練及工作的間隙，集體參加生產之外，應組織專門從事生產的人員，創辦農場、菜園、牧場、作坊、小工廠、運輸隊、合作社，或與農民夥種糧、菜。任何機關、部隊，都應建立起自己的家務。不願建立家務的二流子習氣，那是可恥的。但須規定按質分等的個人分紅制度，使直接從事生產人員能夠分得紅利，藉以刺激生產的發展。又須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方能有效地推進生產工作。

有人說：部隊生產，就不能作戰與訓練了；機關生產，就不能工作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最近幾年，我們邊區部隊從事大量的生產，衣食豐足，同時又進行大练兵，又有政治與文化的學習，均比從前有更大的成績，軍隊內部的團結與軍民之間的團結，也比從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進行了大規模生產運動，可是去年一年作戰方面有很大的成績，並且普遍地開始了練兵運動。機關因為生產，生活改善了，使得工作人員更安心，更有工作效率，邊區和前方都是這樣。

由此可見，處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的機關、部隊，如果有了生產自給運動，他們的戰鬥、訓練與工作，就更加有助，更加活躍了。他們的紀律、他們的內部團結和外部團結，也就更穩了。這是我們中國長期戰爭的產物，這是我們的光榮。我們學會了這一條，我們就對一切困難都不怕了，我們將一年一年更有生氣，更有精力，愈戰愈強，只有我們去壓倒敵人，決不怕敵人來壓倒我們。

但是，有一點還須引起我們前方同志的注意。我們有些地方開關不久，還顯富足，但是那裏的工作人員自恃富足，不肯節省，也不肯生產。這樣就很不好，他們在將來一定要吃虧的。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物力，決不可只顧一時，濫用浪費。任何地方必須從開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來的很多年，計算到長期堅持戰爭。計算到反攻，計算到敵人走了之後的建設。一面決不濫用浪費，一面努力發展生產。過去有些地方既為長期打算，既未注意節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發展生產，吃了太虧。得了這個教

調，現在必須引起注意。

關於工業品，陝甘寧邊區決定於兩年內，做到花、紗、布、紙及其他很多類目的完全自給。原本根本沒有，或出產很少的，現在也一概自種自造自給，完全不靠外面。所有這些，由公營、私營與合作社經營三方面完成任務。一切產品，不但求數量多，而且求質量好，耐穿耐用。邊區政府、聯防司令部、西北局，對於這些抓得很緊，這是經常不斷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這樣做。有許多地方，他們已是這樣做了，希望他們得到成績。

我們邊區及整個解放區，還要有兩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完全學會全部經濟工作。我們到了無從應工業品全部或大部自種自造自給，並有盈餘的日子，就是我們完全學會在農村中如何做經濟工作的日子。將來從城市趕跑日本人，我們也會做新的經濟工作了。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

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

冒險主義

劉少奇

中國共產黨中央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發表於北方局的決議報上——

反黨反列寧主義的立三路線，在各種基本的重要問題上，都克服過癱了。但立三路線之帶的一個問題，至今還殘留在黨內，還沒有完全克服過來的，那就是實際工作中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因為這個錯誤長期殘留在黨內的緣故，因為在黨內揭發與反對這種錯誤之門等異常不夠的緣故，更因為這種錯誤是在實際工作與實際鬥爭中千百次重複表演的緣故，所以它給黨、給革命的影響也最大。如果從今天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來看之起來，這種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就成了黨的主要危險。今天的形勢，是中國本國從半殖民地的地位，進入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國社會的各階級、階層除開極少數願意甘心做亡國奴和漢奸的人之外，甚至從前是動搖的、反革命的，現在都開始或已經同情、贊助與參加抗日反漢奸的民族革命鬥爭了。黨的策略任務，就是要用極廣泛

將民族統一戰綫，去團結各階級、階層、派別，一切抗日反賣國賊的分子和力量，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綫，成爲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之路的中心問題和主要關鍵。這時如果我黨不能完全肅清團主義與冒險主義，那就談不上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綫，那廣大民衆的抗日反漢奸運動，就不會在我黨的領導之下開展起來，那就要障礙着我黨和革命不能前進。

團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過去若干年來所給予黨的損害之具體事實，差不多每一個黨較長的同志，尤其是領導和參加過羣衆鬥爭的同志，都可以說出很多來。如果簡單的說：那就是在嚴重的白色恐怖情況下，我們如在某些工廠學校創立了我們的組織和力量時，團門主義與冒險主義是一定要把它弄到場台的。我們如果在抗日或某種口號與綱領之下，創立了公開的比較有廣泛羣衆基礎的組織時，不把參加這種組織的羣衆和其他派別的同盟者完全驅逐出去，弄到完全不能公開，只剩下幾個「布爾塞維克」的地步，是不止的。自然，還有根本就不到羣衆中去，僅僅坐在房子內空叫的團門主義。總之在黨內鬥爭中對於這些事實採取什麼態度呢？那就是：把組織基礎和工作弄到場台的，把羣衆和同盟者趕跑了的同志有獎，可以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作更負責的工作；而那些在長期艱苦工作中謹慎將事的，把組織和工作創立起來的同志，倒少有不給他戴上一頂「和平發展與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受那打擊和撤銷工作的處分。這就造成黨內許多同志害怕犯右傾錯誤，故意表示「左」一些的現象。結果是助長了團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在黨

內的鞏固和發展。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表示在完全不懂得組織戰鬥的戰略戰術。六次大會的決議說：『準備暴動』。最近中央政務局兩決議案：『當工人階級雄厚力量』，以準備決定廣仇勝戰鬥。但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在大城市中所做的，恰是與這些決議相反。當我們的工作僅僅在一個或幾個工廠學校做好了，就要指揮這一個或幾個工廠學校去和敵人決鬥，要這些工廠學校單獨的舉行政治的罷工、示威遊行（如紀念節），給予超過他們當時力量所能勝任的鬥爭任務，黨內許多同志勸導這些工廠學校去，在報紙上宣佈這些工廠學校為黨所領導等。結果就沒有不被敵人各個擊破的，我們開始創立一點基礎和力量，就這樣消耗和浪費掉，這就自然不能蓄積工人階級雄厚的力量和準備暴動！所以每到一個偉大事變來臨（如「九一八」「一二八」）廣大羣衆自發起來鬥爭時，我常常是感覺自己在羣衆中缺少基礎和力量，而無從施展當時所提出的任務之痛苦。我們不知道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鬥，不知道只有那些已有工作、組織和力量保存與鞏固起來，才能在這些基礎上去擴大與加強我們的力量，以準備和敵人進行勝利的決鬥。我們同志常是急性的、不顧勝敗的、不顧事後結果與影響如何，而是盲目的莽撞。結果不能不使得我們的工作環境與條件更加困難。

如果我們在紅軍中，要保存與愛惜我們的力量，要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避免在不利條件下和敵人作戰，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打擊敵人較弱的一點，以取得勝利，那末，

我們在白色城市中指導羣衆鬥爭，就完全是違反這種戰略戰術原則的。已有的力量，尤其是羣衆中的領袖與幹部，不設法保存與愛惜，不管在什麼條件下，只要是紀念節就和敵人作戰，不從爭取勝利的觀點出發而盲目的爆發鬥爭。結果我們在紅軍的鬥爭中，得到許多偉大的勝利，而在白區中心城市的鬥爭，則與此相反。

「紀念節」在過去幾乎成了我黨冒險主義教徒的「禮拜日」。在這一天照例要發宣言、發傳單、出特刊、開車、罷工、到馬路上示威、叫口號、開會等。但問題是在嚴重白色恐怖下不管當時的條件和環境，不管自己的力量、羣衆的情緒與敵人的戒備和陰謀如何，我們是照例要做這些事的。甚至完全沒有羣衆，僅僅只有我們的幹部，也要拿到馬路上去叫口號、發傳單、打石頭——示威。爲什麼在形勢與條件不好的時候，眼看著要受到敵人嚴重的打擊不可停止這些事呢？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不承認形勢與條件也可能對示威有不好的時候，他們認爲這是禮拜日，不管天晴落雨是要作禮拜的。結果過去在這些紀念節的損失，是很難以計算。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甚至在這完全不獲得領導羣衆的藝術，不懂得領導黨和領導羣衆的不同，不懂得如何使黨的基本日號和基衆團體與目前的行動日號之聯繫。我們的同志常常不懂得根據當時當地環境與條件，根據羣衆覺悟的程度，提出羣衆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號、要求與鬥爭的方式，去發動羣衆的鬥爭，並根據鬥爭過程中的各種條件的變

他，把羣衆的鬥爭逐漸提到更高的階段，或者「適可而止」的暫時結束戰鬥，以準備下
 一次更高階段和更大範圍的戰鬥。而常常是在羣衆中去背誦我們的基本綱領和基本口
 號，或是提出今天羣衆還不了解還不能爲羣衆所接受的口號、要求和鬥爭方式，去強迫
 羣衆接受，強迫羣衆鬥爭。甚至不經過羣衆的同意，用羣衆團體的名義發表如黨一樣
 的，在當時環境下不能允許的宣言、傳單和文件。對於任何一次羣衆鬥爭，不管條件怎
 樣，都是要機械的「堅持到底」（即堅持到任何力量都耗費盡了才止）。在形勢極不利
 於戰鬥繼續延長的情況下，他們都認爲「在相當條件下結束戰鬥、復工、暫時退守、保
 存力量」的提議，都是機會主義。這樣就使得羣衆鬥爭不能發動，或者在鬥爭發動後羣
 衆離開我們，不接受我們的領導，或者放棄了某些勝利的條件、機會，使鬥爭受到打
 擊，直到最後的失敗。領導羣衆的方式與領導黨的方式一樣，羣衆團體的工作方式重復
 黨的工作方式，結果在偵探嚴密監視下，就沒有法子不使羣衆團體的組織也縮小到和黨
 一樣。

當着羣衆或者某些派別起來鬥爭，反對日本，反對現政府時，只要他們的口號綱領
 不完全和我黨一樣，我們的同志常常是不積極去參加與援助這些鬥爭，達到他們的目
 的，並努力使鬥爭擴大，以實現更大要求。而我們的同志常常是站在旁觀的地位，忙於
 去批評這些鬥爭、口號和綱領如何不徹底？如何成爲反革命的欺騙羣衆的東西？咒罵這
 些鬥爭的領導者，甚至號召羣衆脫離這些鬥爭，去侮辱毆打他們的領袖。結果，把這些

羣衆的團體完全關在門外。羣衆或某些人要起來抵制日貨，我們同志是忙於批評抵制日貨是有產階級的口號，而不去參加，贊助這些人抵制日貨，使之變爲廣大的羣衆運動。蔡廷楷、馬占山起來和日本打，我們同志忙於批評這是反革命欺騙羣衆的口號，而不積極去參加、援助他們，使當時反日戰爭勝利。某某大拿出錢來援助反日罷工工人，我們同志硬要在羣衆中宣佈他們是反革命，企圖來收買工人；某某派提出工農商學兵大聯合抗日，我們硬要把「商」字去掉。「九一八」日本武裝佔領了整個滿洲，我們提出來的第一個口號，首先是「擁護蘇聯」，把拯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口號放到第二健去。這樣怎能使我黨和同志走到廣大羣衆中去？

當着我個在某種部分的綱領和白號之下，團結了比較大的羣衆和各種派別的人在我們周圍，建立真正的羣衆組織時，我們同志是又一個綱領之後再加上一個綱領，「共軍陣門爭之後再加上一大冒險，把這些組織中的羣衆和同盟者完全驅逐出去，使我與我爲們同志幾個人。上海工聯、反帝同盟、民衆抗日會、左聯、社聯以至許多工會，開始時都是有廣大羣衆基礎的，我們的同志總不會把這些組織的羣衆基礎更加擴大，而且會把它縮小到完全沒有羣衆。在這些組織的領導機關，我們總不能容許其他派別有一個人和我們共事，而必須是「清一色」。我們奪取了黃色工會的羣衆和領導機關，我們是忙於把它「轉變」成赤色工會，以至弄到消滅。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似乎是不許黨外再有羣衆

續編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完全不體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推動這些矛盾爆發，和敵人營壘中可能和我們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以削弱敵人反對我們總的力量，破壞敵人反對我們的聯盟。而我們同志常常是自以为「最革命，是徹底」的要打倒一切敵人，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一切軍閥，打倒一切豪紳、地主、資本家、富農，以至打倒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派別和黃色工會。我們是一概不妥協，「絕不讓步」，什麼都要打倒。但實際上是什麼都不打倒。結果是拒絕了今天還可能與我們合作的同盟者，把他們推到反動營壘中去，鞏固了敵人反對我們的聯盟，加強了敵人反對我們總的力量。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完全不懂得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聯系。在嚴重白色恐怖下，公開工作的範圍應儘可能使之擴大，一切可能公開與半公開進行的工作，都應公開去進行。而秘密工作的範圍，應儘可能使之縮小，僅僅只有不能公開進行的工作，才應該秘密來進行。但我們所做的恰與此相反。許多可以公開的工作，要拿到秘密機關來做，許多可以公開發表的主張、論文和刊物，我們要拿到秘密刊物上來發表，或是發行秘密的傳單等等。我們忽視與放棄公開工作的可能，而把秘密機關無限制的擴大起來；秘密的刊物文件是特別長、特別多，一切文件的機械化、「八股化」。這樣就使羣衆工作極端縮小，而使秘密機關到處膨脹，結果是便利了敵人的偵探。公開工作與秘密

工作，應在形式上與方法上使監督嚴格時期，在內容上與政治上使敵人感到聯繫；但我們所做的是在形式上與方法上使監督嚴格時期，在內容上與政治上使敵人感到聯繫；但公開工作。甚至在秘密的刊物上宣佈某些羣衆行動，某些羣衆團體，某些工廠學校爲黨所領導，在某些地方開了某些秘密會議，在會議上決定了某些事項，以便敵人來監視我們。在某些地方或工廠，敵人還沒有發現我們組織時，我們的活動還可以避免敵人的耳目，但我們在這些地方可以完全無必要的散發黨的祕密傳單，寫出黨的口號，使敵人好從這些地方來找我們。公開的羣衆團體，不是設法使它更公開些，範圍更廣泛些，而是要使任何公開的範圍都逐漸縮小，直到完全不能公開，甚至要把工人中一切灰色的公開的附屬組織，都要轉變成爲赤色工會，叫什麼「赤色工會的中心作用」。結果就是取消一切公開工作，使一切附屬組織都秘密起來。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不了解羣衆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聯系。輕視經濟鬥爭，輕視經濟鬥爭的重要性，和意義估計不足，不了解「每一個羣衆的經濟鬥爭同時就是政治鬥爭」，要機械的在羣衆經濟要求上加上政治口號和政治要求。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不知道向那些願意和我們合作的同盟者作暫時的讓步，吸引他們與我們聯合，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層的羣衆。而我們硬是一成不變的，這多銅領這多口號，少了一條也不行，結果是拒絕了這些同盟者。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也在黨內組織問題上嚴重表現出來。反對小資產階級與知識

分子，等節外資產，等知識份子加入進黨內來，尤其害怕某些軍官及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加入進黨內來。在黨內鬥爭上許多是過火的、機械的，對於那些在思想上、理論上沒有準備的同志，在工作中偶然犯到的錯誤，鬥鬥主義者硬要依照他直線的「理論」，說這是「系統的機會主義」，替他造出系統來。下層同志的自動性、創造性、自我批評，是被抑制着，在黨內造成了害怕犯錯誤，害怕犯右傾，害怕說話，不敢放手工作，故意要表示「左」一些的現象。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在那裏？負責者是誰呢？自然我們不能怪那些幼稚的同志，而是領導機關在黨內鬥爭中犯了錯誤。不採取同志的、誠懇的、愛惜同志和幹部的教育態度，而許多是過分的打擊同志與幹部。把打擊下層組織、打擊幹部的黨內鬥爭方式，認為是「推動工作」的唯一方法。不採取教育與說服的方法去推動下級和幹部的工作。我們沒有在黨內造成同志不怕犯錯誤，不怕批評並且歡迎批評，放手工作的現象。但這種現象是發展下層同志自動性與創造性的必要條件。

以上這些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在黨內長期繼續與重複的結果，是使黨脫離羣衆，使黨「孤立」，使同盟者離開我們，使某些部分的羣衆和同情者對黨表示某些疑慮，使許多企業中的很好的同志和羣衆離開我們，不願見我們的面。使許多的工作和組織塌台，使許多的同志和幹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與屠殺，而在另外一方面，就幫助了取消派、右派向黨進攻的資料，幫助了右傾機會主義的發展，幫助了敵人的偵探和奸細消滅黨的企圖之實施。過去我們用力量最多、工作最多的地方——如上海、漢口、廣州、

香港、天津、北京這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受這種錯誤的損害也最大，在這些中心城市我們現在的基础也最弱。原因在那裏？自然白色恐怖與叛徒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
因，還是主觀上這種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的結果。

關門主義的根源，因為他們害怕那些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派別，所以不敢和他們暫時建立鬥爭的聯合戰綫，甚至不敢和他們來往談話，因為他們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派別會要動搖自己，影響自己，所以自己關門。因為他們對目前新的形勢估計不足，不相信在目前許多中間階層、社會的上層分子有參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他們不要統一戰綫。這些完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基础，形式上「左」的關門主義，在實質上與右傾機會主義是同一根源。

「左」傾關門主義通常作一種空洞的對目前形式誇大的估計，在上海、天津這樣的中心城市，帝國主義與中國反革命力量最集中地方，他們有時可以估計在這些地方似乎明天就要成為蘇維埃區域的樣子。所以他們敢於冒險，不必要作長期艱苦工作，聚集最雄厚的革命力量去和敵人決鬥。一個工廠的罷工，他們可以從世界革命如何有利於我們的形勢分析起，要這個工廠和敵人立即進行決鬥，似乎世界革命在當天就可以與這個工廠的罷工直接配合推翻一切的敵人，不必根據這個工廠革命與反革命實際力量的對比來決定鬥爭的策略。當着他們在上海舉行一次沒有成功的示威，甚至受到很大損失的示威，他們一樣可以估計到這次示威，如何是「成功的」，有如何深遠的意義（！）

如何影響了多少人（？）如何推動了革命、加速了反動統治的死亡（？）如何成爲革命的信號……以及還有什麼一些缺點，如何要反對對這次示威意義估計不足的機會主義等。但在示威中被捕的大批幹部，以及在組織上的許多損失，他們是看不見，不願意看見。似乎這不算什麼，不要緊，明天革命勝利，這些損失馬上就可以恢復起來。這種空洞的誇大的對於形勢的估計，常常成爲冒險主義的基礎。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和瘋狂性，是一種拚命主義，他們是沒有想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到現在，是有九年了，爲什麼上海、漢口、天津這些地方還沒有變成蘇維埃？倘若他們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們準備以九年的艱苦工作來聚集他們所需要的力量，那他們也許不會那樣浪費他們的力量，而有積蓄力量和保存幹部的必要了。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以後，就在黨內滋長起來，到立三路線時代發展到了最高的程度，在四中全會以後，是有了許多的改正，但在基本上沒有轉變過來。直到現在黨內還是殘留着，而這些錯誤的惡劣影響也還是殘留着。過去我們揭發與反對這種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鬥爭，是不夠的，有些同志還沒有認識這種錯誤給予黨的損害，有這樣嚴重。在以前我們沒有給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以應有的打擊，更說不上致命的打擊。有些同志把工作和組織弄塌台，我們沒有拿住每一個這些事實來研究，開展鬥爭，給這些同志以應有的必要的處罰，以教育同志。這就是關門

主義與冒險主義爲什麼能在黨內嚴重的長期存留的緣故。

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現在必須徹底揭發這些錯誤，必須給這種錯誤以致命的打擊，徹底從黨內肅清出去。教育我們同志領導羣衆的藝術，學會策略的運用，大胆放手的讓我們的黨、同志和幹部跑到廣大的羣衆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賣國賊的統一戰綫建立起來！把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組織起來！雖然我們一些同志和幹部在這裏可能犯到各種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我們有久經鍛鍊的、經驗豐富的黨，有無數忠實於革命和黨的幹部與同志，提高我們的革命警惕性，我們完全能夠克服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我們完全應該害怕這些錯誤以致裹足不前，我們要率領無數千萬的革命羣衆走上民族革命的戰場上去，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走狗們。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毛澤東

——論新階段之一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一 問題的性質

同志們！我們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中國必須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也能夠戰勝他。但由現在到達那個光明前途的中間，存在着一段艱難的路程。爲着一個光明的中國而鬥爭的我們與全民族，必須有步驟地同日寇這個黑暗勢力作戰，而要戰勝他，只有經過長期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共產黨員處於何種地位呢？他們要怎麼樣做才算克盡其最善的努力呢？抗戰以來的經驗，我們也總結了；當前的形勢，我們也估計了；全民族的緊急任務，我們也提出了；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的理論與方法，我們也說明了。國際形勢，我們也分析了。那末，還有什麼呢？同志們！還有一點，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處於何種地位的問題，這就是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算在民族戰爭中盡了自己最大責任的問題。

二 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可以的，應該的，看什麼歷史條件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與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於日本侵略者與希特勒，共產黨員是堅決反對所謂愛國主義的，日本共產黨與德國共產黨他們都是戰爭失敗主義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與希特勒的戰爭失敗，越失敗得徹底越好。日本共產黨與德國共產黨都應該這樣幹，也正在這樣幹。理由是：日本侵略者與希特勒的戰爭，是侵害世界人民也侵害其本國人民的。對於我們，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密切結合着，我們的口號是爲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對於我們，失敗主義是罪惡，全力援助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是天職，是責無旁貸，在這裏，不能有一點消極性。理由是：只有爲着保衛祖國而戰才能出全民族於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解放，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爲此理由，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發揮其全部的積極性，英勇堅決地走上民族革命戰爭的戰場，拿每一槍口瞄準日本侵略者，不容有任何的消極。必用全力援助友黨友軍，不容有任何坐觀成敗的心理。爲此理由，我們的黨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口號；後來又提出了與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命令紅軍改編爲抗日聯軍

民革命軍開赴前綫作戰，命令自己的黨員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綫，爲保衛祖國流最後一滴血。這些做法，這些愛國主義，一切都是正當的，應該的，必須的，正是國際主義在中國的發揮，一點也沒有違背國際主義。只有政治上糊塗或別有用心的人，才會閉着眼睛瞎說我們的做法不對，瞎說我們拋棄了國際主義。

三 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範作用

根據上述理由，共產黨員應在民族戰爭中表現其高度的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應使之具體表現於各方面，即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與模範的作用。我們這個戰爭，是在困難環境之中進行的。這種困難環境的形成，在於我們民族的廣大生靈力量至今還只在開始發動之中，大多數民衆的民族覺悟、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之不足，大多數民衆的無組織、軍力的不堅強，經濟的落後，政治的不民主化，腐敗現象與悲觀情緒的存在，統一戰綫內部團結鞏固之不足，這些都是形成困難環境的主要原因。爲此原故，共產黨員應先鋒作用與模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八路軍與新四軍，應該成爲英勇作戰的模範，執行命令的模範，紀律的模範，政治工作的模範與內部團結統一的模範。共產黨員在與友黨友軍發生關係中，應該堅持統一團結的立場，堅持統一戰綫的綱領，成爲實行抗戰任務的模範。

應該言必信，行必果，不要傲慢態度，誠心誠意地同友黨友軍商量問題，協同工作，成爲統一戰綫中各黨相互關係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民衆運動中，應該是民衆的朋友，而不是民衆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與羣衆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幹等等精神，才是值得尊敬的模範。共產黨員應與黨外一切先進分子協同一致，爲着團結全民提高落後而努力。必須懂得，共產黨員不過是全民族中一小部分，黨外存在着廣大先進分子與積極分子，我們必須和他們協同工作。那種「只有自己好，別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對的。共產黨員對於落後人們的態度，不是輕視他們，看不起他們，而是尊重他們，親近他們，團結他們，說服他們，鼓勵他們前進。共產黨員對於在工作中犯過錯誤的人們，除了不可救藥者外，不是採取排斥態度，而是採取規勸態度，使之翻然改進，棄舊圖新。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因爲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因此，共產黨員又應成爲學習的模範，他們每天都是民衆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衆的學生，只有向民衆學習，向環境學習，向友黨友軍學習，了解了它們，才能對於工農實事求是，對於前途有遠見卓識。長期戰爭與艱難環境中，只有共產黨員協同友黨友軍與

人民大眾中一切先進分子，高度地發揮其先鋒的與模範的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提高覺悟，克服困難，為戰勝敵人、創造新中國而奮鬥。

四 團結全民族與反對民族陣綫中的奸細

克服困難戰勝敵人的中心任務，是團結全民族，鞏固擴大統一戰綫，發動全民族各個階層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唯一無二的方針。但同時，民族統一戰綫中已經存在着並且還要混進來起其破壞作用的奸細，這就是暗藏的、外表上以抗日面貌出現的那些漢奸、托派、親日派分子。共產黨員應該隨時注意這些奸細，並以具體實據為基礎，按照具體情況，揭發這些奸細們的罪惡，同時勸告友黨友軍與人民大眾不要上他們的當。提高對於民族奸細們的政治警覺性，共產黨員負了重要的責任。揭發與清除奸細，是與擴大鞏固民族統一戰綫不能分離的。

五 擴大共產黨與防止奸細混入

為了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共產黨必須擴大其組織，向着真誠革命，而又信仰黨的主義，擁護黨的政策，並願意服從紀律，努力工作的廣大工人農民與青年積極分子開門，

使黨變為偉大的帶羣性的黨。在這裏，關門主義傾向是不能容許的。但同時，對於奸細混入的警覺性也決不可少。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機關，時刻企圖破壞我們的黨，時刻企圖利用暗藏的漢奸、托派、親日派、腐化分子、投機分子，裝扮積極面目，混入我們黨裏。對於這些分子的警惕與嚴防，是一刻也不應該放鬆的。不可因為怕奸細而把自己的黨關起門來，大膽的發展黨是我們確定了的方針。但同時，又不可因為大膽發展而疏忽對於奸細與投機分子乘機侵入的警戒。「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這就是我們發展黨的總方針。

大 堅持統一戰線與堅持黨的獨立性

如果中國只有一個階級，一個黨派，那就再不要什麼統一戰線。所謂統一戰線，就是拿兩個以上的階級與黨派之存在作前提的。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勝敵，並須是長期的堅持，這是確定了的方針。但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一樣。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是什麼呢？在黨派問題上說來，就是容許聯合統一，同時又容許其獨立共存。否認獨立性，只談統一性，這是背棄民權主義的思想。不但我們共產黨不能同意，任何黨派也是不能同意的。還有問題，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

性，而是服從統一性，統一戰綫中的獨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對的東西。不這樣做，就不算堅持統一戰綫，就要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但同時，決不能抹殺這種相對的獨立性，無論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組織上也好，各黨必須有相對的自由權。如果被人家抹殺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獨立性或自由權，那同樣將破壞團結對敵，破壞統一戰綫。這是每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每個友黨黨員，應該明白的。

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關係也是一樣。抗日戰爭中，一切服從抗日利益是總原則，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於民族鬥爭的利益與要求，而決不應是相違背。但同時，在階級社會存在的條件下，階級鬥爭不能消滅，也無法消滅，企圖根本否認階級鬥爭存在的理論是歪曲的理論。我們不是否認它，而是調節它，我們提倡的互助互讓政策，不但適用於黨派關係，基本的也適用於階級關係。爲了團結抗日，應實行一種調節各階級相互關係的恰當的政策，不應使勞苦大眾毫無政治上與生活上的保證，同時也應顧到富有者的利益，這樣去適合團結對敵的總要求。

七 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來幹

共產黨員在領導羣衆，參加統一戰綫，並和敵人奮鬥時，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幹的精神，是不可忽視的。共產黨員應該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之

必要。在局部情形看來認為可行，而在全局看來認為不可行時，應以局部服從全局。反之也是一樣，在局部情形看來認為不可行，而在全局看來認為可行時，也應以局部服從全局。這就是照顧全局的觀點。共產黨員決不可脫離羣衆的多數。置多數人的情況於不顧，而率領少數先進隊伍單獨冒進，這是不能成功的。隨時注意組織先進分子與廣大羣衆之間的密切聯系，這就是照顧多數的觀點。在一切有同盟者存在的地方，遇事應和同盟者協同去幹，獨斷專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這些，都是共產黨員領導藝術與工作精神方面不可忽視的地方。一個好的共產黨員，應該是善於照顧全局，善於照顧多數，並善於與同盟者協同工作的，違背了這些，就不是一個好黨員。

八 幹部政策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幹兼備的領導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十七年來，我們黨已經培養了不少的領導人才，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各方面，都有了我們的骨幹，這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但同時，現有的骨幹還不足以支撐鬥爭的大廈，還須擴大地培養人才。偉大的民族革命鬥爭中，已經湧出並還在繼續湧出無數的天才家、領導者。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並善於使用他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後，

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是不正確的這個真理。在這裏，使原有幹部的基礎但不自滿於這個基礎，是必須的。因此，堅持而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應是我們的戰鬥任務。

不但關心黨的幹部，還要關心非黨幹部。黨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共產黨不能把他們置之度外。去掉孤傲習氣，善於同非黨幹部共事，真心誠意地團結他們，同時善意地給以幫助，對待他們以熱烈的同志的態度，把他們的積極性與天才組織到抗戰建國的偉大事業中去，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畫己自封、目無餘子的態度，是不對的。

必須善於識別幹部。對於幹部長短優劣的識別，不但看他的表現，而且看他的本質，不但看他的一時一事，而且看他的全歷史與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正確方法。在這裏，粗心大意，任情選性，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必須善於使用幹部。領導者的責任與工作，歸結起來，只有兩件事：「出主意，用幹部」。一切計劃、決議、命令、指示、報告、著述、講演等等，都屬於「出主意」一類。使這一切「主意」見之實行，必須團結幹部，推動他們去做，都屬於「用幹部」一類。這兩件事，在中國習慣上，就是所謂「用人行政」。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歷來有兩個表現邪正兩派互相對立的路綫，一個是「任人唯賢」，一個是「任人唯親」。前者是明君賢臣用人的方針，後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針。我們今天來說使用幹部問題，是站在革命立場上的，根本與古代有區別，但也離不開「任人唯賢」這

曾讓幹部以專務為受情，阿諛逢迎者獎，骨硬正直者罰，在右時要不得。我們黨也要不
得。列寧、斯大林對幹部政策，在黨以堅決執行黨的路線、嚴肅黨的紀律、與黨未有密
切關係、有獨立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為私利等等為標準，而不是其他。在這裏，過
去張國燾的幹部政策正是相反。在張國燾，正是阿諛者獎，正直者罰，拉攏私黨，別有
企圖，他的小組織擁護活動，是有了深長歷史的。然而也正是他這種以個人為中心而不
以黨的政治原則為中心的幹部政策，走到了他的目的之反面，一切幹部都脫離了他，結
果剩下了「愛國黨匪人」一名，叛黨而去，這是一個大教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政治經
濟的落後性，反映到黨內，就是自由主義、個人風頭主義與派別活動等惡劣傾向的根
源。估計到這種根源的存在，堅持列寧斯大林的組織路線與幹部政策，反對不正派不公
道的惡劣傾向，鞏固黨在正確路線上的統一團結，這是中央以至全黨同志的責任。

必須善於愛護幹部。在黨的培養與艱苦鬥爭中創造出來的幹部，是民族的珍寶，全
黨的榮譽，應為全黨同志所尊重所愛護，各級領導機關則負有實際辦法達到愛護目的
之責任。有些什麼辦法呢？第一，指導他們。這就是機關們放手工作，使他們敢於負
責，不怕犯錯誤；但同時，又適時地與恰當地給以關於工作環境、工作方針與工作方法
的指示，使他們能在黨的政治路線下發揮其創造性。第二，提高他們。這就是給以學習
理論與方法的機會，教育他們，使之在思想上在領導能力上較之過去提高一步。第三，
檢查他們的工作。不是每天檢查，而是適時檢查，幫助他們總結經驗，糾正缺點，擴張

成果。這是必要的，有委託而無檢查，及重犯可嚴重錯誤，方才加以注意，不是愛護幹部的辦法。第四，改造他們。這就是對於有缺點的、犯錯誤的、有不正確思想的幹部，用主要的說服方法，不得已時則用鬥爭方法，使他們改變過來。在這裏，耐心是必要的。在並非大的原則錯誤又非說而不服的情況下，不適當的輕易地給人戴上一「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意識」等等大帽子的方法，不適當的輕易地採用「開展鬥爭」的方法，都是不對的。第五，照顧他們的困難。幹部的疾病問題、生活問題、家庭問題等，黨的領導機關應給以熱忱的親切的同志的關心，漠然置之冷談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疾病必須醫治調養，生活求其切合工作需要，家庭問題在可能範圍內也須助其解決。一切這些，在物質與環境許可的限度內給以照顧，對於激勵幹部的工作精神，團結全黨為一體的目的上，是有重要意義的。

九 黨的紀律

十七年來，尤其是五中全會以後的黨內鬥爭經驗，證明了有在黨內八路軍與新四軍內，嚴肅堅持黨的紀律的必要。紀律是執行黨的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領導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日戰爭的順利執行。在今後，又必須堅持這種紀律，才能團結全

黨，克服新的困難，爭取新的勝利。在這裏，幾個基本原則是不容忽視的：（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這些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實施，誰破壞了它們，誰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誰就破坏了黨的統一團結與黨的革命鬥爭以極大損害。爲此原故，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應該根據上述那幾基本原則，給全黨尤其是新黨員以必要的紀律教育。過去經驗證明：有些破壞紀律的人，由於他們不懂得什麼是黨的紀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張國燾一類，則利用一部分黨員的無知以售其奸。所以紀律教育，不但在養成一般黨員服從紀律的良好作風上，是重要的；而且在監督黨的領袖使之服從紀律，也有其必要。黨的紀律是帶着強制性的；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建立在黨員與幹部的自覺性上面，決不是片面的命令主義。爲此原故，從中央以至地方的領導機關，應制定一種黨規，把它當作黨的法紀之一部分。一經制定之後，就應不折不扣地實行起來，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並使之成爲全黨的模範。

十 黨的民主

處在偉大鬥爭面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與幹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引導鬥爭的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不能只是一句空話，必須

具體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與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與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於領導機關與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等等上面。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於黨內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沒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達到發揮積極性之目的的。大批能幹人才的創造，也只有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由於我們國家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反映到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這種現象，實在妨礙着全黨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同時，也就影響到統一戰綫中，民衆運動中，民主化之不足。爲此原故，必須在黨內施行民主教育，使黨員懂得什麼叫做民主生活，民主制與集中制的聯系，並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確實擴大了黨內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於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自由放任主義。

在軍隊中的黨，也須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提高黨員的積極性，增進軍隊的戰鬥力。但同時，軍隊黨的民主應少於地方黨的民主，應是爲着鞏固軍隊紀律與增強戰鬥力的，而不是削弱紀律與戰鬥力。在地方黨，也應是有助於鞏固黨的紀律與增強黨的戰鬥力，而不是相反的。

擴大黨內民主，是鞏固黨與發展黨的必要步驟，是使黨在偉大鬥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有用的與重要的武器。

十一 我們黨已經從兩條戰綫鬥爭中鞏固與壯大起來

十七年來，我們的黨，一般地，已經學會了使用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武器——思想上及工作上的兩條戰綫鬥爭的方法，一方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一方面反對「左」傾機會主義。

五中全會以前，我們黨反對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與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由於這兩次黨內鬥爭的勝利，使黨獲得了偉大的進步。五中全會以後，又有過兩次有歷史意義的黨內鬥爭，這就是選義會議與開除張國燾。

由於選義會議糾正了反五次圍剿鬥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團結了黨與紅軍，使得中央與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轉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新政策。由於巴西會議與延安會議（反張國燾路線錯誤是從巴西開始而在延安完成的）反對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使得全部紅軍會合一處，全黨更加團結起來，進行了英勇的抗日鬥爭。這兩種機會主義錯誤都是在國內戰爭中產生的，它們的特點是戰爭中的錯誤。

這兩次黨內鬥爭所得的教訓在什麼地方呢？在於：（一）由於不認識中國革命戰爭中的特點而產生的，表現在反五次圍剿鬥爭中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包含着不顧主客觀條

件的「左」的參性傾向，這種傾向極端不利於革命戰爭，同時也不利於任何革命運動。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原則錯誤。（二）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却路線、軍閥主義與反黨行爲的綜合。只有克服了它，才能使本質很好而且作了長期英勇鬥爭的紅軍第四方面軍尤其是它的廣大的幹部與黨員，從張國燾的機會主義統制之下解放出來，轉到中央的正確路線之下。（三）中央蘇區時期的偉大的組織工作，不論軍事建設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衆工作也好，黨的建設也好，是有大的成績的，沒有這種組織工作與前線的英勇戰鬥相配合，要支持當時殘酷的鬥爭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當時黨的幹部政策與組織原則方面，是犯了嚴重原則錯誤的，這表現在宗派傾向，懲辦主義，與思想鬥爭中的過火政策。這是過去李立三路線的殘餘未能肅清的結果，也是當時政治上原則錯誤的結果。這些錯誤，也因遵義會議得到了糾正，使黨轉到了全般正確的政策與組織原則之下來了。在張國燾的組織路線方面，則是完全離開了黨的一切原則，破壞了黨的紀律，從小組織活動一直發展到反黨反中央反國際的行爲。中央對於張國燾的罪惡的路線錯誤與反黨行爲，曾經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並圖挽救張國燾本人。但到了張國燾不但堅持不變，採取了兩面派的行爲，而且最後實行叛黨，就不得不堅決開除他的黨籍。這一開除，不但獲得了全黨的擁護，而且獲得了一切忠實於民族解放事業的人們的擁護。共產國際已經批准了這一開

陳，並指出：張國燾是一個逃兵與叛徒。

以上這些教訓與成功，給了我們在今後團結全黨，鞏固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的
一致，勝利地執行抗日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必要的前提。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戰
線鬥爭中鞏固與壯大起來了。

十二 當前的兩條戰線鬥爭

在今後新的抗戰形勢中，政治上反對右的悲觀主義，將是頭等重要的。但同時，應
對「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黨的組織與民衆組織問題上，
尚須繼續反對「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以便實現長期合作，發展黨，與發展民衆運動。
但同時，無條件的合作，無條件的發展，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傾向也要注意，否則也就會
妨礙合作，妨礙發展，而變爲投降主義的合作與無原則的發展了。

兩條戰線鬥爭必須切合具體對象的實際情況，決不能抽象地看問題，一般的指出
與具體的應用，是有區別的。所謂「亂戴帽子」的壞習慣，也就是說的那種抽象地應用
這個方法之不對。

在反傾向鬥爭中，反對兩面派的行爲，是值得嚴重注意的。因爲兩面派行爲的最大
危險性，在於它可能發展到小組織行動，張國燾的歷史就是證據。陽奉陰違，口是心

非，當面說得好聽，背後又在搗鬼，這就是兩面派行爲的實質。提高幹部與黨員對於兩面派行爲的注意力，是鞏固黨的紀律之重要的要求。

十三 學習

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太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幹部應該着重地研究這些東西，中央委員會與高級幹部尤其應該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之向着勝利，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實際運動的了解，就不能有勝利。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太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只有這個行動指南，只有這個立場與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學。才是引導我們認識革命對象與指導革命運動的唯一正確的方針。中國黨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現已較前大有進步，但還說不到普遍與深入。在這方面，我們較之若干外國的兄弟黨，未免遜色。而我們的任務，是在領導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着空前的歷史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

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着重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們努力罷，從我們這次黨的六中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再好一點。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但如果不加進一步地學習理論，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們的勝利。因此，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在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中國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那將是等於打倒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同志們，我們一定要學習馬克思主義。

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個，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割斷歷史。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着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或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性去應用它，成爲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涉入股必須廢止，空頭抽象的國運必須少唱，執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開導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

當前運動的特點是什麼？它有什麼規律性，如何指導這個運動？這些都是最實際不過的問題。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懂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後面，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部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光起眼睛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過是一個西班牙的唐·吉珂德，再加一個中國的阿Q，而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的工具——唯物辯證法。向誰研究？我們的先生多得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同時又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或多或少學到一點東西。

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須從不自滿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

十四 團結全黨到團結全民族

偉大的鬥爭需要偉大的力量，團結全民族，發動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進入這個鬥爭中去，是我們確定了的方針。而要達此目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是有重大作用的，是最基本的條件。遵義會議與克服張國燾錯誤之後，我們的黨是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最團結最統一的時期了。現在我們黨內，無論在政治路線上，戰略方針上，時局估計與任務提出上，中央委員會與全黨，意見都是一致的。這種政治原則的一致，是團結的基本條件。黨員與黨員，幹部與幹部，領導者與領導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習慣上所講的人事關係，我們也學會了許多正確的恰當的方法，造成了在正確政治原則下的和衷共濟的空氣，有了更好的相互關係。由於地區的廣大，情況的複雜，工作部門的不同，不同的意見是難免的，應該的，黨內民主的實際，就是容許任何不同意見的提出與討論。也正是由於民主方法，保證着交換意見，並使之概括起來作出結論，形成全黨一致的方向。在這裏，客觀地與全面地看問題的態度，不帶主觀成見與意氣，不要片面地看問題，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我們也逐漸地學會了，這又保證着黨的團結。我們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爲是的成見與意氣用事的作風，是無用的長物。經過了十七年艱苦的中國共產黨及它的領導人員，已經有了老練的作風了。原有這些，就保證着中央與

至全黨的團結一致，就能在全民族中形成一個團結一致的核心與重心，推動抗戰進到勝利。同志們！全黨團結起來，全民族團結起來，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中國共產黨黨章

——中共六大大會通過，一九二八年七月——

第一章 名稱

(一) 定名：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

第二章 黨員

(二) 入黨資格：凡承認共產國際和本黨綱及黨章，加入黨的組織之一，在其中積極工作，服從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且經常繳納黨費者，均得為本黨黨員。

(三) 入黨手續：新黨員入黨時由黨支部通過，並須經過本縣委或等於縣委組織的區委之批准。入黨的條件分下列數種：

(1) 工廠工人黨部黨員一人介紹，由生產支部通過。

(2) 農民手工業者，知識分子及各機關下級服務人員，須有黨員二人之介紹。

(3) 各機關高級服務人員，須有黨員二人之介紹。

附註：(一) 介紹人應對被介紹者負責，如遇有介紹者不確實時，應受黨紀之制裁，以至於開除黨籍。(二) 在黨員未批准為正式黨員時，各相黨支部，得擔任該新黨員為某種工作，借以考查其程度及其對黨之了解。(三) 少共團員入黨時，由少共委會介紹，亦須經上級相當之手續，由支部黨員大會通過，或上級黨部之批准。(四) 在每種特殊情形之下，黨的各級委員會均有直接徵收或通過新黨員之權。

(4) 脫離其他政黨（如國民黨等）而加入本黨的，須經有黨籍一年以上之黨員三人介紹。若從前為其他政黨之普通黨員者，則經省委之批准；若從前為其他政黨之負責大員者，則須經中央之批准。

(四) 組織之改變：其他部分的政治組織或整個的政治集體，以及黨的整個組織，加入或轉入共產黨時，必須經中央的決議。

(五) 黨員的遷移：黨員由這一個組織，遷至別一個組織的工作範圍內（區域內）時，應轉入其所在地之組織中，作為這一個組織之中一員。黨員由這一組織轉入別一組織及一國移至他國的一切手續，須按照中央所頒佈的規例。

(六) 開除問題：開除黨員須由黨支部黨員大會通過，經黨的上級委員會批准方發

生效力，同時在開除決議未盡上級機關批准以前，應即停止被開除者在黨內一切工作，不服從開除決議者，可以上訴至最高黨的機關。黨的各級委員會，在黨員有反黨行為時，有直接開除或黨籍權。不過此開除的決議，應通知被開除者所加入的下級黨部的組織。

第三章 黨的組織系統

(七)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其他支部一樣，其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則如下：

- (1) 下級黨部到高級黨部由黨員大會代表會議及全國大會選舉之。
- (2) 各級黨部對選舉自己的黨員，應作定期的報告。
- (3) 下級黨部一定要承認上級黨部的決議，遵守黨紀，迅速且切實的執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黨的指導機關之決議。管轄某一區域的組織，對該區域各部分的組織為上級機關。黨員對黨內某一問題，只有在極端機密對此問題的決議未通過以前可以舉行爭論。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或本黨代表大會，或黨內指導機關所提出的某種決議，應無條件的執行，即或某一部分的黨員，或幾個地方組織，不同意於該項決議時，亦應無條件的執行。

(八) 指定指導機關：在秘密環境之下，於必要時，黨的下級機關，得由上級機關指定，並經上級機關之批准，得指定新委員加入黨部委員會。

(九) 黨的地域區分：黨以地域原則劃分為單位管轄某一區域的組織，對於該區域內各部分的組織，為上級機關。所有黨員無民族國界之分，都應加入共產黨地方黨部組織，成為中共的黨員。

(十) 各級機關執行權：黨的組織在共產國際和黨的決議範圍內，對於地方黨部有自由處決權。

(十一) 各級黨部的高級機關：各級黨部的高級機關為黨員大會，代表會議或全體大會。

(十二) 各級執委：黨員大會、代表大會或全國大會選舉其各級黨部執行委員會。此執行委員會，在前後兩大會期間，為指導機關，指導各級相當組織之一切經常工作。

(十三) 批准問題：一切新成立黨的組織（支部縣委等等）必須經過其隸屬的上級機關批准。

(十四) 本黨組織系統如下：

(1) 在每個工廠、作坊、商店、街道、小市鎮、軍隊等中：支部黨員大會——支部幹事會。

(2) 城區或鄉區內：區黨員大會或區代表會議——區委員會。

(3) 縣城市的範圍內：縣或市代表會

(4) 特別區（包括幾縣或省之一部分

特別區的組織如必要時，得由省委決議成

(5) 省：省代表大會——省委員會。

(6) 全國：全國大會——中央委員會

(7) 黨易於指導各黨部工作起見，中

內，設立中央執行局，或中央特派員。中

黨之，並只對中央委員會負責。

(十五) 黨部機關：為應決黨的各種特殊任務起見，各級黨部委員會之下得成立各

部或各委員會，如組織部，宣傳部，職工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等等。各部或各

委員會隸屬於黨部委員會，受其指導而工作，並經過黨委員會而實行自己的決議。黨部

委員會下各部之組織，由中央決定之。

附註：為在其他民族工農分子中用其民族語言以便於工作起見，於當地黨委員會之
下，設立少數民族工作部。少數民族工作部，應在當地黨部指導和監督下工作。

——縣或市委員會。

特別區代表會議——特別區委員會。

第四章 支部

(十六)基本組織：黨的基本組織是黨的支部（工廠、礦山、作坊、商店、街道、農村、軍隊等），所有在該地工作之黨員，應一律加入支部，如有黨員三人以上的地方得成立新的黨支部組織，但須由縣委或等於縣委組織的區委批准之。

(十七)支部特別組織：在有黨員一人或二人工作的企業中，這些黨員得加入與該企業最接近的生產支部，或與該企業最接近的黨員，共同組織支部。在任何企業中工作的黨員，如手工業者，個別工人，家庭工作的工人，知識分子等等，按住處的地方為標準組織街道支部，如在農村支部中，有農村經濟企業，如小的礦山，或某種農業工人，得按生產關係組織支部。

(十八)支部任務：支部為便與工農聯系起來的組織。支部的任務：(甲)用有計劃的共產主義的宣傳和鼓動，在無黨的工程的羣中，實行黨的口號與決議，使工農站對黨方面來。(乙)以黨組織的力量積極參加一切政治和經濟鬥爭，以革命的階級鬥爭觀點討論他們的要求，組織羣衆革命的鬥爭，為取得工農一切革命行動的領導而鬥爭，努力工作以吸收工農參加中國的與國際的鬥爭，努力工作以吸收工農參加中國的與國際的鬥爭，努力教育新黨員，散佈黨的出版物，在黨員及無黨

(十九)支部幹事會：以黨員人數多寡為標準，支部選舉三人或五人組織幹事會，以進行日常黨務，該幹事會進行支部的工作，印刷品，在工會中及羣衆組織中進行黨團工作，支部中黨員的工作。如宣傳，分發印工作，與少共支部發生聯系等。支部

幹事會選舉支部書記一人，執行黨員大會或支部會議的決議，及上級黨部的指示。

第五章 城鄉區的組織

(二一〇) 區代表會議：在城或鄉的分區範圍內，黨的上級機關為全體黨員大會或該城鄉區中各支部之代表大會。城鄉區的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接收和批准區委之報告，並選舉區委員會或出席縣、市委或特別區域及省代表大會之代表。

(二一一) 區委：城鄉區委員會於前後全體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期間內，指導區範圍內一切黨務。城鄉區委員會之常會，應該在秘密條件所許的範圍內經常召集，每半月至少一次。區委員會前後會議期間內工作，由區委員會之常務委員會指導之，常務委員會由區委員會自身委員中選舉之。

第六章 縣或市的組織

(二一二) 縣代表會：一縣範圍內黨的上級機關為縣代表大會，每三月召集一次，臨時縣代表大會，或經該縣半数以上之組織的要求，或根據省委員會（或特別區委員會）的決議由縣委員會召集之。縣代表大會，接受縣委員會和黨審查委員會之報告，並選舉縣

委員會及縣審查委員會，以及選舉出席縣黨代表大會或出席縣黨代表大會之代表。

(二五) 縣委：縣委員會由縣代表大會選舉之，於前次縣代表大會閉會時，係該縣黨的最高機關。縣委員中除應由縣黨的代表加入外，該縣區或各重要鄉村黨的支部代表亦同樣須加入縣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時間，可由縣委員會自己決定，但至少須每月開會一次。縣委員會推舉常務委員會以進行日常工作。縣委員會選舉書記一人，以處理日常工作，縣委員會之書記須得上級黨部之批准。

(二四) 縣委機關：縣委員會應執行縣代表大會、省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並應盡可能的成立各部或各委員會（如組織、宣傳、鼓動、婦女運動、農民運動等）以進行指導的工作。縣委員會在出版黨報時，應指定該黨報的編輯。縣委員會執行該縣範圍內的黨務。在前後縣代表大會期間內，對上級黨部負責，並對上級黨部經常的報告自己的工作。

(二五) 縣委員會所在的城市，不設市委員會，其工作直接由縣委員會指導。城市的組織可分為城區，領導城區工作者為城區委員會。

(二六) 市委：市委的組織如縣委，除得分城區外，並得管轄近郊鄉區或近郊直屬支部，在省委或特別區委、區委所在的城市，不另設市委，而工作直接由省委或特別區委指導。

(二七) 特別區委：在特別區委已經成立的總方，特別區按照一切黨部組織條例而

工作，若沒有省委的總方，特別區直接與中央發生聯繫，無如一切省委組織的黨工作。

第七章 省之組織

(二八) 省代表會：在省範圍內省之代表大會是最高機關。省代表大會的經常大會，每半年召集一次，臨時的省代表大會或經該省半數以上組織之要求或根據中央的提議，由省委員會召集之。省代表大會聽省委員會及省審查委員會報告，討論該省黨務和社會工作問題，選舉省委員會和省審查委員會及出席全國大會之代表。

(二九) 省委：省委員會由省代表大會選出，在前設省代表大會期間內，省委員會是省內黨的最高機關、省之中心(省委)組織的代表及省內其他重要地方黨部的代表，均應參加省委員會。省委員會決定自己開會的時期，在一個半月最少須開會一次。在省委員會前後會議期間，為工作便利起見，省委員會得從省委員會委員中推選一黨務委員會，並為執行日常工作起見選舉書記一人。

(三〇) 省委組織及其機關：省委員會執行省代表大會及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省委員會在省內組織黨的各種機關，指定該省黨報的編輯。省委員會在省之範圍內支配黨的力量和經費，管轄黨部的會計處，指導省內非黨組織中的黨團工作。省委員會經常的與中央作工作報告，並經常的把黨部的活動通知下級黨部。省委員會為研究各種重要問題

題，而設置各部或各委員會，如組織部、宣傳鼓動部、職工運動委員會等，每部的主任按照一般通例應由省委員會之正式委員或候補委員充任之，並在委員會之當務委員會直接指導之下工作。

(三一) 省委選籌地區委員會在其所在地之城市共同進行工作，因此在省委員會所在地，所設縣委員會僅得在其本縣地區內進行工作。

第八章 黨的全國會議

(三二) 黨的全國會議按通常規例一年召集兩次，全國會議的處分及選舉事（每若干人選舉一代表）由中央委員會決定。

(三三) 黨的全國會議決議案，經過中央委員會審定後，才發生效力。

(三四) 黨的全國會議開會時，如恰當共產國際世界大會之前，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之同意，可以選舉參加共產國際世界大會之代表。

第九章 黨的全國大會

(三五) 黨的全國大會，是黨的最高機關，按通常規例，每年開會一次，由中央委

員會得共產國際同意後召集之。黨的全國大會臨時大會，或由中央委員會自動決定，或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創議，或由出席最後一次全國大會的代表，代表黨員半數以上的組織之要求，由中央委員會召集之。但黨全國大會的臨時大會的召集，必須經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之批准。黨的全國大會，只有出席代表能夠代表過半數以上之黨員時，始能通過決議案。

黨全國大會的選舉率，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議，或由中央委員會決定，或由全國大會之前開會的黨的會議決定。

(三六) 黨的全國大會：

(1) 接受並發表中央委員會及中央審查委員會的報告。

(2) 決定黨綱上的問題。

(3) 決定一切政治策略及組織等問題的決議案。

(4) 選舉中央委員會，中央審查委員會等。

(三七) 黨的全國大會應由黨的省代表大會選舉之。但在秘密工作條件之下，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之同意，則代表可由省委員會派遺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如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同意，可以黨的臨時全國大會代替。

第十章 中央委員會

(三八) 中央委員會委員之數量，由全國大會規定之。

(三九) 中央委員會在黨的全國大會期間內，是黨的最高機關，代表黨與其他政黨發生關係，設立黨各種機關，指導黨的一切政治的組織的工作，指定在黨的指導和監督之下的黨中央機關報的編輯，按黨之需要可派中央特派員於各省黨的組織並設立中央執行局，進行含有全黨意義的印刷局等事業，分佈黨的財政和力量，並管理中央會計處等等。

中央委員會應該按期召集全體委員會之會議——至少每三月一次。

(四〇) 中央委員會由其本身委員選出政治局，以指導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前後期間內黨的政治工作，並選舉常務委員會以進行日常工作。

(四一) 中央委員會按照各種工作部門而設立各部或各委員會，例如：組織部，宣傳鼓動部，職工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農民運動委員會等等。各部或各委員會的任務，是由各該工作部門中依照中央所指示的進行各項工作，中央委員會指定各部及委員會主任，這些主任應盡可能的由中央委員會中委員充任之。

(四二) 中央委員會以經濟政治之條件為標準，而規定各地黨部組織活動之範圍，

以全國之行政區域而劃分各種地域的單位。

第十一章 審查委員會

(四三) 爲監督各級黨部之財政會計及各機關之工作起見，黨的全國大會，省縣市代表大會，選舉中央或省縣市審查委員會。

第十二章 黨的紀律

(四四) 嚴格的遵守黨的紀律，爲所有黨員及各級黨部之最高責任。

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全國大會、中央委員會及其他上級機關的決議應當迅速而且正確的執行，同時在未經決議以前黨內的一切爭論問題，可以自由討論。

(四五) 不執行上級黨部的決議和犯了黨內認爲有錯誤的其他過失，應由相當的黨部予以紀律上的處分。黨部執行紀律的方法，對於團體的是：指責，指定臨時委員會解散組織和黨員從新登記；對於黨員個人的是：各種形式上的指責警告，公開的指責，臨時取消其黨的重要工作，開除黨籍或予以相當時間的察看。關於犯紀律的問題，由黨員大會或各級黨部審定之。各級委員會得成立特別委員會以調查關於違犯黨紀的問題。

題，此種特別委員會之決議，經該黨黨部批准後發生效力。開除黨籍的問題，由本黨第六條所規定之手續決定之。

第十三章 黨的財政

(四六) 黨部用費由黨員、特別捐、黨的印刷機關及上級黨部之津貼等充之。

(四七) 入黨者黨費的多少，由中央委員會規定，失業和極貧苦的黨員，可完全免繳黨費，無充分理由連續三月不繳黨費者，以自願脫黨論，並將其宣佈於黨員大會。

第十四章 黨團

(四八) 在非黨組織(如職工會、農會、社會團體及文化組織等)之各種代表大會和會議上及各機關中，凡有黨員三人以上者均成立黨團，其任務是在非黨組織中加強黨的影響，實行黨的政策，並監督黨員在非黨組織中之工作。黨團得選舉幹事及書記進行日常工作。黨團在處理自身內務問題及日常工作有自由權。在黨部委員會和黨團中發生不同意見時，黨部委員會應協同黨團代表重新考查問題，並通過決議，該決議黨團應即執行；如黨團有不同意見而上訴時，問題由最近之高級黨部解決，但在上訴時，仍應

執行黨委之決議。

(四九) 黨委員會在討論與黨團有關係的問題時，應使該黨團的代表出席黨部委員會之相當會議，有發言權。

(五〇) 黨團選舉黨團幹事會，此幹事會應得其所屬黨部之批准。黨團幹事會在黨團工作上，應對於該級黨部負責，黨部得派自己的委員為代表加入黨團幹事會組織，並有權召回任何委員，但同時將召回的原因通知黨團。

(五一) 在黨團工作各組織中，各種職務人員的名單，得當地黨部之同意，由黨團提出。關於調遣黨員由這一黨團至別個黨團的問題亦同樣決定。

(五二) 黨團所在組織中，各項要解決的問題應該先經過黨團會議或黨團幹事會之討論。凡黨團對於每問題之決議，加入該黨團的黨員應在該組織大會上，一致維護和表決，凡破壞此條之黨員，應由黨部撤職並給以黨紀上之制裁。

第十五章 與共產青年團的互相關係

(五三) 在黨與青年團的各指導機關中（從支部至中央）均應互相派代表交換發言權同表決權，應使青年團得以自己職員的數量為比例選派代表出席黨團的一切代表大會。

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

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

抗戰以來，各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一般的是統一的，黨政軍民（民衆團體）各組織間的關係，基本上是團結的，因而支持了幾年來艱苦鬥爭的局面，配合了全國的抗戰。然而由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遺毒，由於對某些政治觀點與組織關係還缺乏明確的瞭解與恰當的解決，黨政軍民關係中（實際上是黨政軍民系統中黨員幹部的關係），在某些地區，還存在着一些不協調的現象。例如：統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齊，各自爲政，軍隊尊重地方黨、地方政權的精神不夠，黨政不分，政權中黨員幹部對於黨的領導鬧獨立性，黨員包辦民衆團體，本位主義，門戶之見等等。這些不協調的現象，妨害抗日根據地的堅持與建設；妨害我黨進一步的布爾塞維克化。根據地的建設與民主制度的實行，要求每個根據地的領導一元化。加以日寇「掃蕩」的殘酷，封鎖綏與據點的增設，上下

聯繫系的困難，抗戰的地區性與游擊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統上下級關係更加靈活，每一地區（軍區、分區）活動的獨立性以及活動各方面的領導統一性更加擴大（增強），要求各地區的各種組織，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給敵人以任何可利用的縫隙。為此目的，中央特作如下之決定：

（一）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衆團體。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因此，確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取捨過去各地黨政軍委員會（黨政軍委員會的設立，在根據地創立時期是必要的、正確的）。各級黨委的性質與成分必須改變，各級黨委不應當僅僅是領導地方工作的黨委，而應當是該地區的黨政軍民的統一的領導機關（但不是聯席會議），因此它的成分，必須包括黨務、政府、軍隊中主要負責的黨員幹部（黨委之常委亦應包括黨務、政府及軍隊三方面的負責幹部），而不應全部或絕大多數委員都是黨務工作者。各級黨委的工作應當是總圖各方面，討論與檢查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應僅僅局限於地方工作。

（二）中央代表機關及區黨委應遵從中央的決議、決定或指示，下級黨委及同級政府黨委，軍隊軍政委員會，軍隊政治部及民衆團體黨委及黨費，均須無條件的執行。政府、

軍隊、民衆團體的系統與上下級關係。軍隊與民衆團體的系統，應由上級軍事領導的命令、訓令，上級民衆團體的決定，以上條件之實施者，應由黨員負責人交同級黨委批准，或事先商得黨委負責人同意，然後執行，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如下級黨部、軍隊、民衆團體，應由黨委負責無條件執行，下級黨委對上級黨部、軍隊、民衆團體之決定如有不同意見，可報告上級黨委。在邊際各組織上級的決議解決具體問題而黨委內部發生爭執時，以少數服多數的原則解決之，政府、軍隊、民衆團體應尊重少數不同意見，亦必尊重同級黨委的決定，但可將自己的意見報告上級有關機關。

(三) 中央局與中央分局爲中央代表機關，由中央指定之。區黨委、地委，由黨委與地方的黨組織的統一的代表大會選出，經上級批准之。區黨委、地委，應由各地方的組織，軍隊黨的幹事與政府黨部的負責人。主力軍應參加區委，由各地黨員與地方決定之。縣委（無主力軍參加之縣委）及區委，只包含地方黨、地方軍及政府時黨部負責人。各級黨委書記，應選擇能掌握黨政軍民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擔任之。因此，黨委書記不僅須懂得黨務，還必須懂得戰爭和政權工作。區黨委書記人選，由中央局分局議定，經中央批准之。地委書記人選，由區黨委議定，經分局中央局批准之。爲統一地方黨與軍隊黨的領導，分局、區黨委、地委書記，兼任軍區、分區（師或旅）政委，另設副書記，管理黨務工作。如軍區、分區政委兼選爲分局、區黨委、地委書記，則可設

區黨委，專管軍隊工作。分局、區黨委、地委書記應照顧各方面工作，除黨政委外，還不宜兼任其他具體工作。如有個別特殊情況黨委書記不必兼政務或黨委不必兼黨委書記時，無得上級黨委或中央批准。軍隊中軍政委員會及政治部，成爲國庫黨委（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的一個部門，與其他部門（如組織部、宣傳部等）有平等權利和義務，不隸屬其他部門或委員會，但與其他委員會和其他部門不同，仍保持其直接接領導和隸屬關係。軍事政策（如擴充建軍原則、政治工作等等）與軍事行動的天壤方針（如反「掃蕩」的戰略戰役計劃及總結等），須交黨委會討論，但具體軍事行動由司令員政治委員（即黨委書記）決定之（司令員與政委對軍事行動之最後決定權仍屬政治工作條例），無條件的民主討論員會引導軍事行動的失敗。軍隊主要人員的任免，必須經過軍事機關依照已定規則進行之。

（四）主力軍是黨領導下的武裝部隊，是建設根據地與支持戰爭的主要力量。主力軍應以鞏固和堅持各所根據地爲其第一等任務。主力軍固在全國性，但同時具有地方性。過去有些根據地領導不統一，主要的是由於該地主力軍某些領導同志對於該地之建立與堅持缺乏正確的統一的認識，因而其所實行的高舉政策（如軍事建國之地方武裝問題，擴兵問題，時局經濟政策問題中之統籌兼顧等等）只適合于主力軍，而忽視了根據地整個工作的配合，因而與地方黨政府發生爭執。同時有些增兵，黨政領導機關對於一切服從戰爭的認識不深，黨主力軍之人員補充，糧食及物資保證，優待及反

迷亡鬥爭，未能盡其應有的責任，因而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損失。今後應正其管理權地領一元化，除實現以黨委為各地統一領導的領導機關外，還應糾正某些地方主力軍，某些地方黨政機關領導人思想上政策上的一些錯誤。實行中央關於權地地的各種政策，實行軍委關於軍事建設的幾號指示。今後主力軍必須執行各級黨委的決議，決定與各級政府的法令。主力軍對於駐紮所在地的下級黨委與下級政府（如縣區、鄉）的決定，亦必須執行。如有不同意見，可報告上級黨委與上級政府。並應在執行時彼此聯系，彼此補助。主力軍的軍事措施，如軍事行動、佈置及戒嚴等等，地方黨政機關必須遵照實行。主力軍應負有保護黨政機關的責任，凡因軍隊之疏忽與不關心因而使黨政機關受到不應有的損失時，軍隊負責人應當受到處分。今後，如有爭執，首先應當就地協同解決，並將爭論及解決經過報告上級，反對各個組織員是向上告狀，而不本地當面商談解決問題的辦法。

（五）政權系統（參議會及政府）是權力機關，他們的法令帶有強制的性質。黨委與政權系統的關係，必須明確規定。黨委包辦政權系統工作，黨政不分的現象與政權系統中黨員幹部不遵守黨委決定、違反黨紀的行為，都必須糾正。為了實行三三制，黨對政權系統的領導，應該是原則的、政策的、大政方針的領導，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辦。下級黨委無權改變或不執行上級參議會及政府的決定與法令，黨的機關及黨員應該成為執行參議會及政府法令的模範。就應當進行政務工作以提高參議會及政府的威信。

黨的幹部與黨員違反參議會及政府法令時，黨的組織應給以嚴厲的處分。黨對參議會及政府工作的領導，只能經過自己的黨員和黨團，黨委及黨的機關無權直接命令參議會及政府機關。黨團必須服從同級黨委；但黨團的工作作風必須刷新，不是強制黨外人士服從，而是經過自己的說服與政治工作。在黨團萬一沒有說服參議會及政府的大多數因而黨團意見未被參議會及政府通過時，必須少數服從多數，不得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但是假如黨團同志因為自己的意見與同級黨委有分歧而不堅決執行黨委的決定，這是黨團同志違反黨紀的行為，應當受到指斥與處分。黨必須派遣得力的幹部到參議會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視政權工作，把幹部堆在黨的機關中的現象，必須糾正。在實行三三制時，黨員在政權系統中的數量減少，但在政權系統中工作的黨員質量必須大大提高。在政權系統中工作的黨員和幹部，必須服從黨委與黨團的決議、決定與紀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動。在這裏，應特別提出，黨委三三制政權之領導的實現，有賴於政權系統中黨員幹部之言論行動的一致及其對黨的決定的絕對服從，所以嚴整政權系統中黨員及黨員幹部的黨紀是有嚴重意義的。黨委在領導政權系統中的黨員時要慎重，還必須經過黨員實行向政權機關辭職的手續。政府與軍隊的關係必須改善。軍隊中應進行抗黨政府的教育；政府應保障軍隊的給養及運輸；軍隊的首長應是政府委員及參議員。軍隊應成爲尊重政權執行法令的機關，軍人的違法行動，軍事機關必須嚴加處分。軍人除以公民及政府委員、參議員資格對參議會及政府發表意見外，一般軍人及軍事機

關係干涉參議會及政府的內部工作。但軍隊政治機關，必須儘可能的協助政府工作。

(六) 民衆團體是民衆自己的自願組織的團體，黨、政府、軍隊不應直接干涉民衆團體內部的生活。黨對民衆團體的領導，經過自己的黨員及黨團。但黨員不分、包辦、清一色的現象，必須糾正。民衆團體的各級委員會委員須儘可能有半數以上的非黨員。民衆團體中的黨團問題與政府中黨團同。政府應尊重民衆團體的獨立性；給民衆團體以必要的補助，要求民衆團體執行政府的法令。民衆團體應依法向政府請求登記，取得合法地位。如民衆團體違反政府法令時，政府可加以處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民衆團體的生活與工作。民衆團體應號召民衆，擁護政府新軍隊、協助抗戰軍員工作。但民衆團體並非政權機關，不得代替政府行政及對人民執行逮捕、審訊、判決等事宜。軍隊與民衆團體應相互補助，但不應相互干涉。

(七) 在游擊區因為它的特殊性，領導的一元化不僅是在相互關係上應予確定，而且在黨政軍民的機構上在必要時亦須一元化。黨委、政府、民衆團體的機關，可與軍隊指揮機關政治機關合併，黨政民幹部在軍隊或游擊隊中，擔任一定的職務（如正副軍事指揮員、政委及政治部各種工作），戰時參加軍隊與游擊隊工作，戰鬥空隙時則仍執行其原來的黨政民的職務（如黨委書記、縣長、工會主席）。

(八) 黨的領導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係上，又一方面則表現在上下級關係上。在這裏，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之嚴格執行，

對於黨的唯一領導，是有決定意義的。各根據地領導機關在實行政策及制度時，必須依照中央的指示。在決定含有全國全黨全軍普遍性的新問題時，必須請示中央，不得標新立異，自作決定，危害全黨領導的統一（凡帶地方性質的不違反上級及中央決定的不在此例）。下級黨政軍民組織對上級及中央之決議、決定、命令、指示，不堅決執行，陽奉陰違，或延緩解決的原則問題及按其性質不應獨斷的問題時，不向上級和中央請示，都是黨性不純與破壞統一的表現。

在這裏，應當再一次的提醒各根據地黨政軍民領導同志的注意，各級黨委及政府軍隊民衆團體中的黨員負責同志，不得中央許可，不得發表帶有全國意義和全黨全軍意義的宣言、談話及廣播，各級領導同志的文章應經過同級黨委或黨團適當人員的審閱。分局委員以上、師以上負責人的文章，凡帶有全國及全黨意義的，應事先將主要內容報告或電告中央。各地不應再直接對外廣播，應統一於延安新華社。應當深刻認識，一個黨的負責高級幹部，不經過同級或上級一定組織的同意，而擅自發表政見，是何等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何等妨礙黨的統一的惡劣行爲！

（九）爲統一根據地的領導，爲改進黨政軍民關係，必須在黨政軍民各系統黨員幹部中進行思想教育，整頓三風，肅清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遺毒。在幹部會議上，根據中央決定與毛澤東同志報告，教育幹部擴大體，顧全局，號召幹部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幹部懂得全局，不陷於局部和本位的偏向，而獲得全體與局部、上級與下級、統一與

部與那一局部門的正確關係。要加強黨政軍民各組織中的教育工作，使全體同志認識這一元化及根據地革命秩序與革命法令的重要性。在這裏，應特別警惕軍隊幹部：黨政軍民關係不協調，在一般情況之下，軍隊幹部應負較大的責任，軍隊手中有槍，容易獨斷獨行，輕視黨政，不守紀律，自由行動，破壞羣衆利益。因此，軍隊中軍政幹部必須特別約束部下，檢點自己。必須號召自己的部下，擁護黨的領導，擁護政府，堅決執行黨的決定與政府的法令。同時，又應糾正某些黨員和幹部中的不合事實的觀點；認爲只有在黨委及黨的機關中工作才叫黨的工作，其實一切黨員和黨的幹部不管其執行的是政府工作、軍事工作、羣衆工作、經濟工作、技術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黨的工作，在黨的機關中的工作，只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黨務工作）。黨員服從黨的領導，是服從黨的路綫、政策、決議、決定、指示與紀律。某些黨員空喊或曲解服從黨的領導，而對於黨的路綫、政策、決議、決定、指示與紀律，則不認真研究，不認真執行，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

（十）加強各抗日根據地領導的統一，是爲了更順利的進行反對日寇的戰爭，一切服從戰爭是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要在全黨中說明，假若軍隊削弱，假若戰爭失敗，則根據地無法存在，黨政軍民都會塌台，因此，黨委、政府、民衆團體以及全體人民，都有鞏固軍隊、加強其戰鬥力的義務。軍隊的人員補充，糧食、服裝、彈藥的供給與運輸，營舍的讓予，傷病殘廢人員的輸送、看護與保養，抗日軍人家屬的優待等等。

總要及政務、民衆團體，都有隨時加以解決的責任。這弱不關心的現象，都是極端錯誤的有害的。在軍隊本身，則應深謀遠慮，沒有黨派政府、民衆團體的配合，光桿軍隊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戰的，因此，必須加強部隊中的教育，做到能愛惜根據地，愛惜人力物力，尊重黨政，加強軍紀，給黨政民以必要的補助。軍隊的人員與物質補充、運輸、靈抗等等，必須依照政府的法令、規章去做。亂來一頓，只會損害抗戰，於軍隊本身也是不利的。

(十一) 各根據地領導機關根據本決定原則，根據各地具體情況，擬定與此有關的各種細則，以政府法令、軍隊條例、黨團規則、民衆團體章程等方式規定之，以解決統一領導的許多具體問題。擬定後須報告中央。

中央關於統一領導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中央黨部會議通過

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通過——

(一) 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的與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二) 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羣衆行動起來。但如只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單位將號召者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此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則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便有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採用此種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風，各中央部、中央分局、區黨委及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年整風計劃）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及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了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

位的發展過程，詳細了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典型的具體幹部之歷史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勤惰與工作優劣，並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具體的解決各該單位的實際問題，藉以取得經驗。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亦有若干單位，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領導人員亦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與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向下級具體單位的具體人員、具體事件學習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幹部都能學會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具體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行政首長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幹，並使這一領導骨幹與參加學習的大羣衆密切結合，才能使羣衆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羣衆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變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羣衆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組織羣衆的積極性，則羣衆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又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與提到高級的程度。任何有羣衆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與比較落後的三部分人，而這三部分人的比例，又大致都是兩頭小，中間大。故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幹，並選擇這批骨幹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後分子。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系羣衆的領導骨幹，必須是從羣衆鬥爭中（例如整風學習）逐漸形成，而不是脫離羣衆鬥爭所能形成的。任何一個偉大的鬥爭過程，其開始階段、中間階段與最後階段的領導骨幹，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向一的，必須不斷地提

據在鬥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英雄）來替換原有骨幹中相形見绌的分子，或腐化了分子。許多地方及許多機關工作推不動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缺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聯系羣衆的經常健全的領導骨幹。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自然形成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比較地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幹，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第九條中所說建立領導核心問題，我們應該應用到一切大小機關學校部隊中去。這種領導骨幹的標準，應是李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中所舉的四條幹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系羣衆，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無論是執行戰爭、生產、教育（包括整風）等中心任務，無論是執行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其他任何工作，除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以外，均須採取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相結合的方法。

（四）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向羣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羣衆的意見，並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於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再向羣衆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列主義的認識論，或方法論。

（五）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在組織中在鬥爭行動中發生正確關係的思想，正確的領

導意見只能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又向羣衆中堅持下去的思想，在領導意見之實行時，要將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互相結合的思想，均必須在此次整風中普遍地加以宣傳，藉以糾正幹部中在此問題上存在着的錯誤觀點。許多同志不注重與不善於團結積極分子組成領導核心，不注重與不善於使這種領導核心與廣大羣衆密切地結合起來，因而使自己的領導變成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許多同志不注重與不善於總結羣衆鬥爭的經驗，而歡喜主觀主義地自作聰明地發表許多意見，因而使自己的意見變成不切實際的空論。許多同志滿足於工作任務的一般號召，不注重與不善於在作了一般號召之後，緊緊地接着從事於個別的具體的指導，因而使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爲官僚主義的領導。此次整風，必須糾正這些缺點，在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中學會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方法，並在以後應用此種方法於一切工作。

(六) 正確的領導意見是從羣衆中集中起來的又向羣衆中堅持下去的意見，這是基本的理論。在集中與堅持過程中，必須採取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第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叫別人也是這樣做），然後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作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羣衆。同志們在這次整風中應該這樣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應該這樣去做。比較好的領導，就是從比較善於這樣去做而得到的。

(七)任何工作(戰爭、生產、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防奸工作等等)上級領導機關都應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只是由上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只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只找下級的宣傳部，上級總務部只找下級的總務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應該使總負責人與分負責人都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一件工作可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幹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備，可以解決各單個部門幹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自己工作的幹部。這也是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一種形式。例如審查幹部，如果僅僅由組織部導個領導機關的少數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過某一機關或某一學校的行政首長，推動該機關該學校的許多人、許多學生，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全體學生都參加審查，面上組織總部的領導人員則正確地指導這種審查，實行領導與羣衆相結合的原則，審查幹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滿地達到。

(八)在任何一個地區、一個機關、一個學校、或一個部隊，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個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最中心的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這在該地區、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鬥爭歷史與鬥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盤計劃，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

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及凌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亦不要不分輕重緩急的沒有中心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凌亂，而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與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與工作秩序，並把這一秩序堅持地貫徹下去，而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這也是在運用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這些原則時，必須注意解決的領導方法問題。

（九）領導方法問題上的各個細節問題，這裏不予一一說到，由各地同志根據本決定所說的原則方針自己去用心思索，發揚自己的創造力。鬥爭愈是艱苦，就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領導與廣大羣衆的要求密切地相結合，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密切地相結合，而徹底粉碎主觀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和主觀主義的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後者。主觀主義者與官僚主義者不知道領導與羣衆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的原則，極大地妨礙黨的工作的發展，故爲了反對主觀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科學的領導方法。

一九四五年的任務

毛澤東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邊區參議會演說——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結了，我們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務是什麼呢？我們有些什麼工作在明年要特別注意去做呢？整個反法西斯戰爭有很大的勝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實現。我們唯一的任務是配合同盟國打倒日本侵略者。現在美國已打獨萊特島，並可能在中國登陸。同時，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東京到新加坡的大陸交通綫，中國的淪陷區更加擴大了。敵人是否會停止它的進攻呢？我看還不會停止，它還有可能再向我國西南部及西北部進攻。在此期間，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詭計，企圖通過中國的投降主義者，引誘中國政府投降。中國內部的狀態仍然是不團結，國共談判毫無結果，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國

反動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戰場的戰事，節節失敗，國民黨當局仍然固執其爲全國人民所不滿意的「黨專政」及其失敗主義的政策，拒絕一切有利於抗戰、團結與民主的建議。只有艱難締造的廣大的中國解放區，執行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民主主義，團結各階級人民，建立了英勇的軍隊，粉碎了「敵人的進攻，並能發動攻勢，收復了失去的失地。在此種情形下，我們應該做點什麼呢？

必須使全國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國民黨、共產黨、其他抗戰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在民主基礎上召集國事會議，組織聯合政府，才能統一中國一切抗日力量，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並配合同盟國，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我們經過林祖涵同志曾經向國民參政會提出了這個問題，後來又向國民黨當局用書面提出了，最近周恩來同志又專爲此事去重慶談判一次，但是依然沒有結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單是談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國人民一致起來，大聲疾呼，要求國民黨當局改變現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這是全國人民的總任務，中國人民不論在大後方、在淪陷區、在解放區，

都要爲此目標而奮鬥。只要中國有一個真正實行民主政策的能夠動員與統一中國一切抗日力量的聯合的中央政府出現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國人民的解放，就會很快了。爲了這個目的，大家應該想許多辦法來。

在大後方，我們必須援助被反動當局壓迫的民主愛國運動，必須動員一切力量抵抗敵人的進攻，必須警惕投降主義者背叛民族投降敵人的陰謀活動。青年們及其他各界，應該有許多人到敵大佔領的地方去打游擊，廣大羣衆則應當準備在一切敵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時，解放區則以自己的力量來維持行動及發動新地區的游擊戰爭，有力地援助大後方。大後方的工人、人民、一切愛國黨派，都有責任爲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努力。大後方已經有許多黨派、許多工業家、教授們、學生們、甚至許多國民黨人，發表聯共政府的主張，認爲這是目前抗日救國的唯一正確道路。但是現在的力量還不夠，應該號召廣大人民起來爲此而奮鬥。

在淪陷區，廣大人民遭受敵人的殘酷壓迫，渴望解放。我們必須幫助他們組織起來，準備在時機成熟時，舉行武裝起義，配合軍隊的進攻，準備外合地

願逐本侵略者，解放我們的兄弟姊妹們。這一任務，現在必須提到和解放區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難都要去做。在這個工作中，法國共產黨與法國人民有了光榮的榜樣，我們應該學習法國的經驗。在淪陷區人民中，應解釋民主的聯合政府之必要，使他們知道只有這個政府才能解放淪陷區人民的解放就快了，號召他們起來為這個目標而奮鬥。

在解放區，現在已經成了抗戰救國的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這裏有了六十五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抗日軍隊，有了二百多萬民兵，有了九千萬被解放的入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們不論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那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們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麼工作值得特別指出的呢？

我認爲，一九四五年，我國解放區應該注意如下各項：

(一) 擴大解放區。無論那一個解放區的附近，或其較遠之處，都還有許多頑敵佔領，而又守備薄弱的地方，我們的軍隊應該進攻這些地方，消滅敵偽，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我們必須把一切守備薄弱、應我現存條件下

敵對攻克的薄弱區，全部化為解放區，迫使敵人處於極端狹仄的城市與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們包圍得緊要的，等到各方面的條件成熟了，就將敵人完全驅逐出去。這種進攻，是完全必要的與可能的，我們的軍隊已經舉行了很多這樣的攻勢，特別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績，明年應該繼續這樣做。在一切新被敵人佔領尚未建立解放區的地方，例如：河南等處，必須號召人民組織武裝隊伍，反對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區。幾年的經驗證明，組織衆多的經過訓練善於執行軍事政治各方面任務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後之敵後去襲擊敵僑，組織人民可以配合解放區更積極的作戰，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應該這樣做。

(二) 敵人的進攻(「掃蕩」)是不會停止的，我們應該經常警惕，隨時準備用反「掃蕩」粉碎敵人的進攻，沒有這種警惕是不對的。不要以為我們強了，敵人弱了，敵我力量對比形勢現在已經改變了。須知敵人還是強的，它決不會忘記向我們進攻。我們還是比敵人弱，我們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並執行鞏固軍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變這種形勢。只有到了我們佔優勢的時候，敵人的進攻才會成為不可能了。

我們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並執行鞏固軍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變這種形勢。只有到了我們佔優勢的時候，敵人的進攻才會成為不可能了。

(三) 整訓現有的自衛軍與民兵，增強他們的戰鬥力。自衛軍與民兵數目

還不夠，各地除某幾個地方不能再擴大者外，均應儘量地擴大。九千萬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應組織在自衛軍中，在不脫離生產原則下，輪流担任保衛家鄉與協助軍隊的任務。從自衛軍中挑選精幹分子組織民兵，或基幹自衛軍，在「戰鬥與生產結合」的原則下，協同軍隊作戰，或者獨立自主的作戰。九千萬人民中，至少應該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萬人民兵，即是說，比現有民兵數目擴大一倍。有些地方，還沒有十分重視這個工作。在這些地方，民兵的數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訓，質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將改變此種情況。自衛軍與民兵，均必須不違農時，減少誤工，不妨礙生產。在這裏，變工的方法是必要的，戰鬥的民兵組織與生產的變工組織，往往可以互相結合。自衛軍與民兵的領導機關，必須是民主選舉的。只有這樣，自衛軍與民兵才能擴大，也才能提高戰鬥力。民兵的重要戰鬥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雷運動應使之普及於一般鄉村中。普通集造各式地雷，並訓練爆炸技術，成爲十分必要。

(四) 整訓正規軍與游擊隊。一九四五年，應將全部軍隊輪番整訓一次。按照新方法進行整訓，舉行專業性的練兵運動。

(五) 在老區域，補充原有軍隊的補充訓練；在新發展區域，在經濟條件許可下，應該擴大軍隊。不論補充軍隊與擴大軍隊，均以不加重人民財政負擔為條件，這一點必須謹記。如果違背了這一點，我們就會要失敗的。

(六) 軍隊內部的團結，非常之重要。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歷來依靠官兵一致，獲得了光榮的勝利。但是，中國軍閥軍隊的軍閥主義習氣在我們軍隊裏的影響，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隊，這種習氣還是很嚴重。一九四五年，應該進行廣大的工作，將軍隊官兵關係中的一切不良現象，例如：打罵、罵人、不關心士兵的給養、疾病及其他困難，對於士兵的錯誤缺點不耐心教育說服、輕易處罰、以及侮辱或槍斃逃兵，等等惡劣習慣及錯誤方針，從根本上去掉。許多部隊，現在還未重視這一工作，由於不明白這一工作是軍隊戰鬥力的極其重要的政治基礎。目前開始的一年整訓計劃，軍事整訓與政治整訓應該並重，並使二者互相結合。整訓開始時，還應着重政治方面，着重於改善官兵關係，增

強內部團結，發動幹部與戰士羣衆的高度積極性，軍事訓練才具於實施與更有效果。這一工作的實行，應在每一部隊內都舉行無間斷的運動，號召幹部愛護士兵，同時號召士兵擁護幹部，彼此的缺點錯誤，公開講明，迅速糾正，這樣就能達到很好地團結內部之目的。

(七) 加強擁政愛民與擁軍優抗兩項工作，進一步地改善軍民關係。我們八路軍新四軍和我們解放區人民之間的關係，歷來是好的，因此我們能夠戰勝敵人，鞏固與發展解放區。但是，舊軍隊的習氣，同樣會傳染給我們的，軍民關係中的不良現象，例如軍隊態度蠻橫，損害人民利益，紀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時常發生。同時，地方對軍隊補助不夠，優待抗屬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現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們曾經指出了這些工作的重要性的，但是許多地方還未重視。一九四五年舊曆正月，一切解放區，應普遍舉行擁政愛民運動與擁軍優抗運動，一定要做出顯著成績來。已經有了成績的，必須繼續做，必須檢查此兩項工作的結果。如果我們的全部軍隊，官兵上下團結一致，從政治上鞏一般的鞏固起來了，加上軍事技術與戰術的訓練，又加上人民

的補救，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事業，就有了堅強的保障了。

(八) 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根柢路線，在解放區，首先表現在各階級各黨派合作的三三制政府工作中。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應總結經驗。共產黨人必須和其他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談、多開會，務使打通隔閡、去掉誤會，改正相互關係上的不良現象，以便協同進行政府工作與各項社會事業。凡參加人民代表會議（參議會）工作、政府工作及社會工作的一切人員，不問屬何黨派，或無黨無派，應該一律被尊重，應該一律有職有權。

(九) 減租，各地均有成績。但是有些地方成績少些，明減暗不減更應賜觀點，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減得太多，或在減租之後不注意交租等現象。這兩種偏向，都應糾正。減租之後，租約滿期的，除在照顧雙方利益原則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種者外，應該重訂新約，使農民有地可種。老區域減租未徹底的，應該查租；新區域尚未減租的，應該發動減租。租不減是不對的，減得太過火也是不對的。凡地主因被敵人摧殘或他原因斷生活困難的，政府應

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給以從事農工商業或參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這件事當做政府工作之一，藉以團結他們反對共同敵人。我們現在是處在農村中，土地問題的正確解決，是支持長期戰爭的重大關節，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 今年絕大多數地方都進行了生產運動，有了顯著的成績，這是非尋常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還未着手進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績不大，再有一部分地方軍隊方面有成績，人民方面缺乏成績。一九四五年，必須絕無例外地普遍舉行大規模的生產運動。一切軍隊，於作戰、訓練之外，必須從事生產自給，機關學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許減少或免除生產。必須動員人民，在自願原則下，組織生產互助團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等。我們的地方工作人員，必須用絕大精力去幫助人民，組織這種互助團體，以便大規模地恢復生產與發展生產，不但應該使人民夠穿夠吃，而且應該使人民逐漸地有盈餘。「耕三餘一」的口號，除被敵人摧殘厲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敵後解放區，也是可能實現的。我們解放區的工業品，必須力求自給，必須爭取於數年內達到全部或大部自給之目的。由公營私營與合作社經

營，這樣三方面的努力，達到這個目的是可能的。和生產相輔的是節約，必須儘可能地減少浪費。「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確定不移的財政方針。如果我們不去從根本上發展經濟，而去枝枝節節地解決財政問題，就是錯誤的方針。如果我們努力地發展了公私經濟，我們就能支持不論時間多久的戰爭，而使精力不至於枯竭。這一點非常重要，必須使一切工作人員及全體軍民清楚地認識清楚，以便組織他們從事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在公營經濟中，按質分等的私人分紅制度，是在很多部門內可以實行，並應該實行的。「軍民愛國」，「公私愛國」兩個原則，必須注意不要違背。

(十一) 爲着戰勝日本侵略者，於充分注意軍事、政治、經濟之外，還要注意文教工作。我們解放區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好人，他們的缺點甚至錯誤，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們是人民事業的可貴資本，他們應該被重視。他們中有許多人從事軍事、政治、經濟工作；另有許多人從事文化、教育、藝術、衛生工作。所有這些人員，都應該被重視。今年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會議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適用。專制主義者利於人民愚昧，我們則利於人民

聰明，我們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漸地離開愚昧狀態與不衛生的狀態。各地教育與黨組織，均應將報紙、學校、藝術、衛生四項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裏面。

(十二) 從軍隊中、農村中、工廠中及政府等機關中，用羣衆民主選舉的方法，選出優秀分子，充當戰鬥英雄、勞動英雄及模範工作者，給予獎勵與教育，經過他們去鼓勵與團結廣大的羣衆，這種制度，對於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提高農業及工業的生產力，提高政府機關及一切其他機關的工作能力，數年來的經驗，已經證明是極有效果的，各地應普遍地推廣這一運動。

(十三) 爲着戰勝日本侵略者，需要廣大的有能力的幹部。我們現有的幹部，比較從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幹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夠。特別是下級與初級幹部，不論是軍隊的或地方的，他們的文化程度，他們對於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們工作技術的掌握，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則是很低的。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他們忙於工作，領受教育的機會太少。(九) 五年，各地幹部教育，應該着重於訓練軍隊的(連重班)與地方的(區鄉)干

假及初級幹部。在黨的用輪訓辦法，不在黨的相學校辦法，有計劃地將他們提高一步。

（十風）

我們工作作風中的一项極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員習慣於獨斷專行，而不善於聽取人們的批評討論，不善於運用民主作風。當然，這是拿我們解放區的這種作風與那種作風作比較，而不是拿我們解放區與國民黨區域作比較。我們解放區是民主的地方，國民黨那裏是封建的地方。這兩個地方是原則上區別的。但是，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人均未學會運用民主作風，舊社會傳染來的官僚主義作風，依然存在。別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見，提了就不高興。只愛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爲怕碰釘子，受打擊，遭報復，人們不敢大擺意見。這是一種很不好的作風，這種作風阻礙着我們事業的進步，也阻礙着工作人員的進步。我提議各地對此點進行教育，在黨內，在黨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風。不論什麼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不是惡意攻擊，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各級領導人員，有責任聽別人的話。實行兩條原則：（1）知無不言，言無不盡；（2）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如果沒有一言者無

界」一儉，並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效果。自從整風以來，我們的工作作風有了很大的進步，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稱讚的，這是很光榮的。但是我們仍有嚴重缺點，我們許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風，我們一定要改正這個缺點。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麼不好的東西捨不得丟掉呢？如果我們改正了這個缺點，那我們就能團結更廣大的人民，我們的事業就能獲得更大的與更快的發展。

(十五) 除了上述種種以外，擺在解放區人民面前的極其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想出種種能夠促成聯合政府的辦法來。繼續和國民黨及其他黨派談判是一種辦法，全體人民起來呼籲要求是一種辦法，還可能有其他的辦法。總之，我們一定要多方努力，辦這個適合民族抗戰要求的民主的聯合政府，儘可能迅速地建立起來。

我們解放區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當然還有許多，但我以為目前特別值得提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項。其他就從略了。各個解放區的情況與工作步驟，在

許多點上互不相同，各地應根據自己的特點佈置工作，以便適當地完成各項任務。

一九四五年應該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更大發展的一年。全國人民都希望我們解放區能夠救中國，我們也有這樣的決心與勇氣。我希望我們解放區的全體軍民一齊努力，不論是共產黨人與非共產黨人，都要團結一致，為加強解放區抗日工作而奮鬥，為組織淪陷區人民而奮鬥，為援助大後方人民而奮鬥，為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奮鬥。

毛主席在接見中外記者團席上的談話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於六月十二日下午五時接見中外記者西北參戰團，首先由毛主席致辭，對記者團來延極表歡迎，並對國內外形勢作簡要之說明。繼由中外記者斯坦因先生等提出若干問題，毛主席逐一答覆（毛主席致辭及問題與答覆見下）。會見畢，毛主席極表歡迎記者團。是晚並有平劇晚會助興。

在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戰團席上，毛主席致辭，各記者所提問題及毛主席的答覆，全文如下：

毛主席致辭

我十分歡迎各位記者團到來。我們的目的最簡單的，就是指導人民與打倒一切法西斯黨，全中國，全世界，都在這共同基礎上團結起來。

各位到延安時，正遇着敵寇開始了第二戰場，我們要求敵人的覆滅，並正戰場的

開關，其影響不僅在歐洲，而且及於太平洋與中國。中國要前進，世界要前進，我們必須取得最後勝利。

第二戰場的開關，是經過長期發展的結果，是經過莫斯科、德黑蘭會議發展而來的，在這些會議上，決定了從東、西、南三面打擊敵人。第二戰場是實現了，三面打擊希特勒的計劃是實現了，我們慶祝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斯大林元帥的健康！全中國所有抗戰的人們，應該集中目標，努力工作，配合歐洲的決戰，打倒日本軍閥。現在時機是很好的。

關於中國國內情況，諸位先生是十分關心的，我在這裏必須談幾句。關於國共關係，中國共產黨對此問題的態度，早已見於中共中央歷次文告及其報紙。今乘諸先生來廷之便，特再申明如下：護護蔣委員長，堅持國共與全國人民的合作，爲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民主的中國而奮鬥，中國共產黨此種政策始終不變，抗戰前期是如此，抗戰中期是如此，今天還是如此，因爲這是全中國人民所希望的。

但是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爲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虛虛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問與答

問

斯退因先生問：毛主席能否談一談，林伯渠先生在重慶談判的情形？

夏爾遜神父問：上述問題爲大家所關心，可否儘先答覆？

斯退因先生問：爲使問題明確起見，我請毛主席將一九三六年國共談判情形與今日談判情形作一比較。

夏卜斯遜先生問：第二戰場的開闢是否引起了一個新階段？中共中央對此是否準備發表宣言，以闡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謝爽秋先生問：爲着加強團結，中國共產黨希望於各方面的是什麼？

趙新順先生問：爲使問題明確起見，我增加問，中國共產黨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其他各黨各派做些什麼？中國共產黨本身又準備做什麼？

毛主席答

諸位的問題可綜合爲三個：

第一個問題，關於國共談判。談判已進行了許久，但是今天還在談判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其他今天還無可奉告。

第二個問題，關於第二戰場。日前解放日報社論已說明是一個新階段，我們不準備再發表宣言。第二戰場的開闢是同盟國戰爭合作的發展，其總的性質，現在與過去比較，是沒有變化的。但是第二戰場開闢有與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種相同的意義。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前，是法西斯侵略高漲，反法西斯力量被打壓的時期，賴有蘇聯的進攻結束了過去的階段，開闢了新的階段。接着，北非與太平洋相繼有了進攻。這是同盟國防禦到進攻的一個大轉變。第二戰場開闢，在進攻中又前進了一大步，如馬德拉斯，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現在歐洲已進到了決戰階段了，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個新階段，特別在軍事方面。我已說過，第二戰場開闢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將來亦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就目前來說，對中國的影響似乎不會很大。你們可以看見，外面情況雖然甚好，但是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第三個問題，關於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爲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爲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個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爲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

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份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係上，與各黨的相互關係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並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的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複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然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我們贊成大西洋憲章及莫斯科、德黑蘭會議的決議，就是基於這個觀點的。我們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主要的就是這些，中國共產黨所

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這些。先生們來到邊區已有十幾天，今後還將有若干時日留在邊區。你們可以看到，我們共產黨爲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做的一切工作。

文教統一戰綫方針

毛澤東

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邊區文教大會的千餘聽衆面前，宣佈了解放區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綫方針。在他的演說中，他解決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的問題，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社會基礎，文化統一戰綫的必要，知識份子與工農羣衆互相結合的必要，羣衆的需要與自願，應該是工作中的兩個基本原則等問題。

毛主席首稱：我們的一切工作的總目標，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和希特勒一樣，是快要滅亡了，但是它還有力量，中國人民，尤其是解放區，必當繼續努力，才能達到最後消滅敵人的目的。這個努力，首先是戰爭，其次是生產，然後便是文化。沒有生產的軍隊，是飢餓的軍隊，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日寇、解放人民和建設工業化的新中國的。所以我們必需有文化。有部份同志，曾經輕視文教工作，這是錯誤的，在這次會後，大家都應該對文教工作予以應有的重視。

關於我們的文化性質，毛主席指出：它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眾，反日、反漢奸、反黑暗封建傳統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政治經濟基礎，就是民選政府，就是減租減息，就是以各種規模的工廠，各種形式的合作社，爲領導的個體經

濟。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方面是在這社會形體的反映，一方面又推動這社會形體的繼續前進。

毛主席說：中國的工業，現在還很弱小，解放區的工業，更是弱小，但它們是無限前途的，中國必須以此為基礎，克服自己的落後。解放區的經濟，有其進步的方面與落後的方面，解放區的文化，也有其進步的方面與落後的方面。解放區有幾千萬的方面，人民大眾的新文化，但也有極大的落後的封建遺毒，如教育事業就有一百多萬文盲，兩千個巫神，封建迷信的思想，還在統治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影響着邊區的羣衆，反對羣衆腦子裏的這個敵人，甚至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困難。邊區文藝界鬥爭的狂熱，無論教育衛生藝術報紙那一項，就都是要告訴邊區幾千萬萬人民，自己起來和自己的封建、迷信、文盲、不衛生等舊習慣作鬥爭。爲了進行這種鬥爭的鬥爭，就不能不有廣泛的統一戰線。如在教育方面，即不但要有比較集中、比較正規的中小學，而且要有普遍分散、比較不正規的私塾、讀報識字組。不但要有新開辦的民辦學校，而且要利用和改造舊的村塾。在藝術方面，不但要有戲劇，而且要有秦腔、秧歌，不但要有樂器、秧歌，而且要利用和改造舊戲班，特別是在百分之九十的舊戲班在醫藥衛生方面，尤其如此。秧歌等邊區現在嬰兒死亡率，高至百分之六十，成人死亡率高至百分之三十，去年共死一千八百個，死種四千個，死羊二十萬隻，死牛三千三百隻，人民相當普遍的相信巫神，在這種情形下，僅僅依靠少數機關學校的

器，是不可能的，爲機關部隊服務，是很重要，而書比中醫是更得學，但西書如在這種情形下，不關心人民，不爲邊區人民訓練更多的西書，不聯合和改造邊區一千個中醫和舊式的醫館，就是實際幫助巫神，幫助邊區人畜的死亡，所以新形式與舊形式的統一戰綫，是完全必要的。統一戰綫的兩原則，於此完全適用：第一是團結；第二是批評或教育改造。投降舊形式是錯誤的，排斥、鄙棄也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利用的舊形式，舊人，而助、感化與改造他們。爲了改造他們就首先要團結他們，只要我們做得恰當，他們是會歡迎我們的幫助與改造的。

我們的文化，是人民大眾的文化，因此，任何方面的文化工作者，必須具有爲人民大眾服務的高度熱誠。在這一點上，毛主席諄諄囑咐一切知識分子，一定要拋棄脫離羣衆的惡習，以勤躬盡瘁的精神，獻身人民，與工農兵密切結合，而工農幹部更應重視和擔任這種革命知識份子。關於聯繫羣衆的工作作風，毛主席在結束他的講演時，特別指出兩個基本原則：第一是聯繫羣衆的實事和自願。一定要從羣衆的實際需要出發，而不從任何自願的個人願望，或紙上談兵出發。要因時因地制宜，譬如讀者專送區，與各解放區的組織原則是相同的，但是在讀者專送區組織的各項具體辦法，如果不用於其他各解放區的直接聯繫等環境，或人口較稠密，文化較進步等條件，即不應照搬應用，而應採取適合當地條件的辦法。如果羣衆在事實上，雖有某種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尚無某種需要，則不應與羣衆工人人員，進行耐心的教育，其側重應

己的工作，使羣衆有了覺悟，因而會認真行之時，才去實行，決不聽黨自道命令。凡是須羣衆參加的工作，沒有羣衆的自覺與自願，就只會流於形式主義而失敗。一切速則不達，一切工作都是如此。對於改造羣衆思想的文化工作，尤其是如此。

毛主席在這個講演中，指出文教工作的統一戰線，必須重視文教工作，如鴉片與工農兵羣衆的互相結合，文教工作中的需要與自願原則，因為恰當地解決了邊區文教工作中的幾個要害問題，所以引起了社會代變，尤其幹部的大注意。邊區文教統一戰線的進一步開展，和文化工作中正確作風的養成，將是這個講演的重要。

周恩來同志對國共談判的聲明

一月二十四日，由延安飛赴重慶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同志，在重慶留了三個星期，和國民黨政府方面，舉行了多次商談。由於國民黨當局依然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聯合政府，反對人民與民主，並企圖吞併八路軍、新四軍，以致仍如過去談判一樣，未能成立任何協議，周恩來同志乃於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二時，飛返延安。談判內容，周恩來同志於十五日發表之聲明內，有明確之敘述，此聲明登載於十六日重慶新華日報，並將譯文交付外國報紙駐重慶之記者。該聲明全文如下：

國民政府王世杰博士，本星期三日，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因為他只說了在國共談判中，政府方面提出的所謂讓步，而並沒有說明在什麼條件或前提下，才有這些所謂的讓步。第一、國民政府在談判中，要求中國共產黨將其所領導的一切軍隊，移交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即是說移交於國民黨領導，國民政府，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第二、在談判中，國民黨堅持其一黨專政不能結束。由於這種種條件或前提，使一切所謂的讓步，不是真空，便沒有任何意義，甚至不是讓步，而是束縛，或破壞抗戰的力量。具體說來，第一、不把軍隊移交國民

政府，便沒有中共的合法。第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從來就不開會，也沒有任何權力。第三、在黨清下的共產黨內，設置所謂臨時內閣，這是最後決定政策之權。第四、不取消黨清和不改變排除吳己的軍事政策，三人委員會或與中共軍隊，仍等於將中共軍隊移交於國民政府。而且原封敵人的虛構資本，應予取消的，不是中共軍隊，而是國民黨軍隊。說明了這些，便懂得我代表中共中央，爲甚麼拒絕了國民政府整編的提議，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甚焉的原因是國民政府在黨清後，曾於建立聯合政府、聯合統帥部，以統一中國一舉軍事力量，以改革政治軍事經濟其他各方面政策的建議。我個人曾向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中國民主同盟提議：由國民政府召開黨派會議，討論和決定如何結束黨清，如何改組政府，使之成爲民主的聯合政府，並起草共同的施政綱領，以便在取得多數同意後，好實現聯合政府的方針。國民政府的答覆，是一種諷刺性質的會議，而會議中預定的主要內容，是繼續維持一黨專政反對民主的聯合政府。因此，我必須回擊，向我黨中央報告。至於我們希望國民政府，首先釋放愛國護法領袖，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種活動，撤還一切包圍陝甘寧邊區，和進攻及圍剿新區軍事等項，政府當局並未接受。這就是數月來兩黨談判的主要內容。數月來兩黨談判，承美國大使赫爾科將軍熱誠相助，不斷努力，吾人在此表示感謝。

(以下係外國記者，對於國民政府王世杰博士二月十四日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所講的記錄譯文，再供參攷：

半個月以來，政府代表(我是其中之一)曾與美蘇黨代表團團長先生(在重慶會談。政府方面，曾提出若干重要的讓步，下列各項，亦在其內)：(一)承認共產黨為合法的政黨；(二)在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容納共產黨高級人員；(三)為構成一個臨時內閣起見，在行政院內容納共產黨及其他政黨代表；(四)組織一個三人的聯合委員會，以考慮改組共產軍及他們給養的問題——在該委員會內，政府及共產黨代表有同等地位，而可能由美軍官任主席。但共產黨覺得這些建議，並不是他們所能接受的，他們拒絕了。共產黨提出召開一個各黨派的會議。政府之所以允許再次召開一個國共代表及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儲備會議，以考慮國民大會召開以前，關於政治及軍事問題的過渡辦法，就是接受這個建議的一種誠意。周先生已帶了這個建議遞送，徵求他的黨的意見，至於結果如何，則非我所能預料了。過去數月中，美國大使將繼續與兩黨談判，努力相助，吾表表示感謝。)

